

炎黄春秋

第 **1** 期
2013年

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
《顾准文集》出版的曲折
读曾希圣给中央的检查
万州二月镇反和六三事件
档案记载的苏联饥荒

目 录

新年献词

- 1 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 本刊编辑部

一家言

- 2 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 周瑞金

亲历记

- 9 万州的“二月镇反”和“六三事件” 刘国平
14 一个生产队的四清 于俊沂
16 我亲历的造神运动 裴毅
18 江青八次到天津 王辉

沉思录

- 22 读曾希圣给中央的检查 尹曙生
28 我反对神化和特权的代价 戴煌
33 《顾准文集》出版的曲折 卢惠龙

春秋笔

- 36 1950, 晏阳初在去留之间 宋恩荣 张睦楚
42 “二流堂”那些人和事 马林

人物志

- 48 张玺一生的几件大事 刘洪声 张林南
54 王缙绪辞官抗日 王宇知

求实篇

- 59 子虚乌有的“寻找伍豪启事” 马雨农

怀人篇

- 64 中原突围：四位女性的人生 乔海燕 傅苓
35 冯雪峰两首遗诗 季音

往事录

- 70 八十年代关于《资本论》的学术风波 王思重
72 元宝山牧场的“挖肃”灾难 原志久 刘凤歧

争鸣篇

- 77 海打战役流产的历史真相 夏宇立
82 对柯瓦廖夫报告与访谈录的不同评价 李维民

海外事

- 88 档案记载的苏联饥荒(1929-1934) 李玉贞

编读窗

- 94 读者来信摘登 张仙权 许岳林

顾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锐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实 王俊义 冯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方 吴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陈敏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胡德华 赵德润
保育钧 钟沛璋 郭道晖 资中筠 凌云
展江 徐小岩 秦晖 袁鹰 袁伟时
高放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韩钢 董健 曾彦修 鲁璋
雷颐 魏久明

社委会 杜导正(主任) 吴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晨 徐庆全 胡竟成 张晓鸥

社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 常务社长 吴思
副社长 杨继绳 李晨
社长助理 胡竟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编辑 吴思
副总编辑 徐庆全 黄钟
执行主编 洪振快

总经理 李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 张晓鸥
财务总监 胡竟成
发行部 孔屏(主任)
办公室 王海印(主任)

理事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莊其環 李琼
秘书长 吴思
副秘书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阔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
电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部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8元 全年定价 96元

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

○ 本刊编辑部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造成的弊端日益显露,社会不安定因素逐渐累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但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进行,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共识。古语云:谋定而后动。没有共识,何以定谋?所以,我们当今的政治改革“稳妥”有余,“积极”不足。

其实,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已经存在。这个共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现行宪法并非十全十美,但只要把它落到实处,我国政治体制就会前进一大步。

《宪法》第5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第62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15项职权;第63条有罢免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宪法》还规定了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国家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没有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宪法》的这些规定没有落实。

《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如果这一条落实了,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侵犯私有财产的恶性事件。

《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如果这一条落实了,“暴力执法”、“暴力截访”等恶劣行径不会如此猖獗。

《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等多项自由。如果这一条落实了,对传媒的种种非法限制就不会存在,更不会“以言治罪”。有了言论、出版自由,对权力腐败也就有了必要的舆论遏制。

《宪法》第37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这一条如果真正落实,就不会有重庆式的“黑打”和北京安元鼎式的迫害访民的黑监狱。

《宪法》第126条规定,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如果这一条落实了,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受理、不立案,就不会有那么多冤假错案。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一套对权力制衡的制度体系,就是要切实保证公民权利。《宪法》中有很丰富的

保障人权、限制国家权力的内容。将《宪法》和现实对照,就会发现现行的制度、政策、法令和很多政府行为,和宪法的差距十分遥远。我们的宪法基本上被虚置。

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在政治体制的设计上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将宪法虚置,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失信,也是对国际社会的失信。国无信不立,宪法失信的状况必须改变。十二大以来的党章都有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在法下”。“党在法下”是重要的宪法原则和政治原则。做到了“党在法下”,就能避免宪法层面的名义制度和运行层面的实际制度相悖而产生的种种弊端。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权威至高无上,依照宪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会有、也不应当有争议。

既然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我们就应当行动起来,将虚置的宪法变成现实的制度体系、法律体系,就应当将现行一切违反宪法的制度、法令、政策改变过来,使其与宪法一致。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是一场“维宪行动”。

徒法不足以自行。落实宪法,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保证,例如建立宪法审查制度:或者建立宪法法院,或者在人大设立专门的委员会,或者将宪法司法化。建立落实宪法的制度,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尽管现行宪法并不一定完美,但是,只要我们将这部宪法落实了,政治体制就会前进一步。在政治进步的基础上,将来修订宪法,再将新的宪法修订条款落实到政治制度中。如此这般,就是渐进式改革。这种渐进式改革,就是通过宪法途径不断改善政治制度。

多年将宪法虚置不仅给少数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还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维宪行动”必将遇到重重阻力。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广东视察时表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只要有这种精神和魄力,全民努力,上下互动,“维宪行动”一定会成功。

新的一年,新的领导集体,新领导人一些新的作风令人高兴。在新的一年里,千头万绪中我们最为期盼的是,在落实宪法上有切实的行动。■

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

○ 周瑞金

作为从业党报60年、入党47年的老报人、老党员,我参加过或关心过党的九大到十八大十次全国党代会的宣传报道,很想从历史视角谈谈十八大。

一、十八大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十八大胜利闭幕,新一届党的最高领导人产生了。党的政治局常委由九人减为七人,换了五人,政治局委员25人换了15人,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全换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换了六成以上,军委委员换了七成以上。所以,十八大最大的热点、亮点、关注点是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以总书记、军委主席胡锦涛裸退、习近平同志一步到位,全面执掌总书记与军委主席为特征的时代,我称之为开启了我国常人政治的时代。

回顾新中国成立,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来,一共召开过十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抗战胜利后1945年党在延安召开的七大,到建国后第七年1956年召开执政后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八大,相隔了11年时间。从八大到文革中1969年召开的九大,中间又相隔了13年。中共作为大国的执政党,全国党代会不按党章规定召开,反映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而党的九大到十大(1973年)只相隔四年,党的十大到十一大(1977年)也是四年,都是因为重大政治事件(林彪摔死了,“四人帮”被抓起来了)而提前召开的。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后,我们党才按党章规定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走上正轨。从1982年召开十二大,到今年召开的十八大,基本都是五年一届全国党代表大会。

纵观我们党执政以来召开的十一次党的全

国代表大会,其中以八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八大,这五次党代会具有比较重要的特点而确立它的鲜明历史地位。

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一直沿用到今天),提出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为主的正确路线,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方针,在党章中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发扬党内民主,开启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良好开端。但好景不长,受1956年底国际形势尤其是“波匈事件”的影响,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思想起了变化,错误判断国际国内形势,背离了八大的路线方针。1957年由党的整风转入反右派斗争,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就开始了二十年“左”的统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折腾到经济崩溃的边缘。这都是在毛泽东主席主政的伟人政治时代发生的。

党的十二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基础上,正确总结了从八大以来正反两方面重大历史经验,首次明确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目标,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从十二大以后六次党代会政治报告的题目都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一以贯之,坚定不移,主调不变。这就开启了邓小平同志主政的强人政治时代。

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专章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党政分开、信息公开、民主对话等具体改革要求,提出“政府主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改革方向,就是市场化改革方向。十三大还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行中央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成员差额选举(邓力群与朱厚泽被差额落选),应当说是发扬党内民主比较好的一次党代会。

党的十四大,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引下,

全国兴起第二次解放思想热潮,突破“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在重要历史关头把改革开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下召开的。这次党代会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开启了老一代领导集体向新一代领导集体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交接班的先例。这两件大事确立了十四大的重要历史地位。从此,开启了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相继主政的后强人政治时代

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转型期陷阱”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的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此时,机遇与挑战交织,改革与发展难度加大,利益博弈错综复杂,如何重聚改革共识,重造改革动力,攻坚克难重启改革,迫在眉睫。同时,又要开创新老交替新规范,所以引起全世界瞩目。

我们党从八大到十八大,经历了伟人政治时代、强人政治时代、后强人政治时代到常人政治时代的转变过程。大体可以说,毛泽东主政的27年(1949-1976)是领袖终身制的伟人政治时代,邓小平主政的11年(1978-1989)是双峰制约的强人政治时代,江泽民主政的13年(1989-2002)和胡锦涛主政的10年(2002-2012),进入了老人制约的后强人政治时代。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习近平主政的常人政治时代。

在伟人政治时代,搞一言堂,搞个人崇拜,搞阶级斗争为纲,党的一个个接班人被清除掉了。党的八大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被伟人一句话就改变了;八大确立的接班人刘少奇到九大就被打倒了。而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到十大就被打倒了。而十大确立的接班人王洪文,到十一大就被抓起来了。华国锋主席短期主政属后伟人政治时代,邓小平同志评价他没有提出自己的东西,基本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也搞一点个人崇拜,党的十一大会场挂双领袖像(十一大前党代会会场只挂毛主席像,十一大以后就都不挂领袖像了)。

到强人政治时代,党内有了一定制约,出现上世纪80年代逢单反自由化、逢双反“左”的现象。由此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政治局常委会很少开。有次陈云同志在赵紫阳面前抱怨为什么不开会时,赵说我只是大秘书长一个,你与小平

同志什么时候定下开会就什么时候开。总书记变成大秘书长一个,这就是强人政治时代的特有现象。因此我们看到,在强人政治时代,党内斗争是一个个党的最高领导人被拉下来了。对这样一种现象,邓小平同志提出一个“领导核心”的说法,说毛主席是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他是第二代领导核心,而江泽民同志是第三代领导核心。那么,有没有第四代领导核心?他没有说,邓过世后,胡锦涛同志就不便再称自己是“领导核心”了。“领导核心”成为党的特定专用名词,这个说法没有形成党的专门决议,也没有写入党章。这样,就出现一个难题,难道说中共历史就只有三代领导核心吗?而领导核心,与党章规定的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什么不同的权力?我看谁也说不清楚这个问题,只有等待党的以后历史决议解释了。

进入后强人政治时代,党的主要领导人和接班人稳定下来了,不会走马灯一样变换了。胡锦涛同志作为党的接班人,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个能够顺利接班的。但后强人时代党的领导人,都受到政治老人的制约。有的制约是正确的,如20年前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有些制约不利于新领导集体的主动担当,如军委主席延期交班。这个时期党内斗争出现什么动向?转向了政治局成员:党的十五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问题;党的十七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陈良宇问题;党的十八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薄熙来问题。而且,他们都是以刑事犯罪被处理的。

如此看来,党执政以来63年时间里,不论在什么时期,党内都充满着斗争。这种现象对执政党的科学化建设究竟有何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党对伟人政治时代的路线斗争历史经验,初步进行了总结(1981年通过了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而对强人政治时代和后强人政治时代这种斗争现象,却没有作出过总结。而十八大前发生的震惊国内外的薄熙来事件,十八大上却没有一个代表发出声音,为什么会产生薄熙来案件?有什么值得吸取的主要经验教训?反映了执政党建设中什么样的制度性、体制性的问题?中央应当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些根本性问题,恰是党代表大会应当讨论、应当解决的问题,怎么能回避呢?

二、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新特点、新思维

十八大开启了我们党进入常人政治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有哪些主要特点？

(一)党的最高领导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成员不是哪个人指定或由哪个人事安排小组安排出来的。而是通过党内高层一定民主程序推选出来，并经过反复协商产生的。在2007年酝酿党的十七届中央领导集体时，胡锦涛总书记就采用了民主的办法，由中共高级干部第一次自由提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预备人选。中央当时在63周岁以下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大军区正职干部中，按姓氏笔画排列的近200人符合条件的名单。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民主推荐会，当场一人一票投票，按票数多少排列，推出了十七届政治局成员预选名单，实际上也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人选提供了参考，这就是习近平、李克强同志进常委会的背景，为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积累了重要实践经验。作为这种民主选举倡导者之一的曾庆红同志，为这次党内民主选举的成功，感到特别高兴和鼓舞，坚决表示自己在十七大上从政治局常委位置上退下来，从而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交替带了一个好头，立了一个好规矩，就是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七上八下”的标准（六十八岁的退下，六十七岁以上）。今年5月7日，胡锦涛总书记又一次主持党内高级干部推选十八大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预备人选。规定政治局推选10人，常委推选5人。这次不像十七大那么简单，中间经过多次反复，这也是进入常人政治时代的一个特点。

(二)集体领导体制、民主工作作风、依法依规办事，将搞得更好。习近平同志不仅当选党的总书记，同时当选党的中央军委主席，在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交接班中，第一次同时接受党与军队的最高权力。这就结束了老人干政的历史。这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高度评价，使常人政治时代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新领导人独立主政，显示执政新风。十八大刚闭幕不久，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变化。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后，带领新政治局常委班子会见中外记者时的讲话，平实，清新，少说大话空话，不回避现实问题，多讲老百姓关心

的事，显示出个性特点。此外，习近平同志就任中央军委主席不久，就决定单独为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委委员、二炮司令魏凤和一个人，举行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显示他的军委主席的魄力，不循规蹈矩的硬朗作风。近日，政治局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带头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告别。

(四)新一届领导人以习近平、李克强为主导，常委会成员的出身与背景、生长时代、知识条件、开放态度、工作阅历与经验等，都与以前领导人有较大差别。他们参加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亲身体验了社会最底层农村民众的疾苦与现实，也在与底层农民生活与工作的融合中开始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同时，与军事强人出身和以理工科、工程师背景的前领导不同，他们所读的专业多数是经济学、法律、历史及其他社会人文科学，他们治理国家的思维模式、观念及方式将会与以往有较大差别。此外，他们访问过很多国家，他们的世界眼光比较宽广。开放的心态更为强烈。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从基层一步一步往上走过来的。不仅工作上得到磨炼，积累经验，更与改革开放结下不解之缘。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他们的今天。他们的改革开放理想色彩更强烈，更懂得中国这台国家机器未来的改革重点与改革应该从哪里入手。

我们也可以看到习近平时代的一些新思维，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是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十七届中央作的，主要总结十七届中央的工作。而主持起草的小组组长却是习近平同志。我们也可以从政治报告中品味出新领导人不同于以前领导人的一些新思维。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做了更完整的、又有切割性的表述。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毛泽东思想不能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近年来有些理论家起劲鼓吹毛泽东早就已经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实毛是一直在探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发展道路，晚年犯下严重错误，与邓小平以改革开放为动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本是两回事，十七大报告把“毛泽东思想”含糊地放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一起阐述,这就混淆了两者的关系。这次定位比较明确,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放在一起,作为指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来源之一。十八大报告把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的成就也做出了不同的评价。“革命”和“改造”时期的成就,是“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建设”时期的成就表述为,“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所谓的“宝贵经验”,其实就是惨痛的教训,是沉重的代价。所以,十八大报告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明确的区分,是十分必要的。

(二)变“四个坚持”为“八个坚持”,是十八大报告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点。以前我们都只强调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虽然这次报告提到党的基本路线时也提到四个坚持,但更重要的这次是强调八个坚持:“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对如何理解这八个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为题着重加以阐述,指出八个坚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体现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东西”。

(三)第一次提出了鲜明肯定普世价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报告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原来引起激烈争论的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等等,在十七届七中全会讨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是被排斥在外的,虽然通过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却概括不出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成为遗憾。这次在习近平同志担任大会文件起草组组长的带领下,排除干扰,冲破阻力,终于将普世价值列

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范畴。明确提出“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以及“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针和理念,“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四)根据形势的发展,把原来“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改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目标”。并对新四化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经验性的科学规范。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把改变城乡二元化,推进城镇化,纳入了实现现代化国家的重要部署,同时把城镇化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转变了粗放型的城镇化道路。

(五)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建设和发展总布局的高度。由过去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变成现在的“五位一体”,将生态文明列入其中。

(六)自十三大以来,第一次单列一章论述政治体制改革。这表明了全党攻坚克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也为新领导集体预留了较大的政改空间和回旋余地。报告突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问题,提出党派协商、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基层民主协商,等等。报告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这里值得注意

的是,强调要“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

(七)第一次鲜明提出“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问题。把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十八大报告在社会建设中突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强调“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就鲜明提出解决当前民众意见最大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要按“两个同步”“两个比重”“两个公平”的理念和原则切实加以解决。对社会体制改革,明确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这里除了社会管理体制增加了“法治保障”的内容外,还进一步细分了加快形成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社会管理机制的问题。这都很具现实针对性,把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了。

(八)十八大报告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对以“一国两制”处理港台关系,对促进和平发展处理国际关系等方面,也都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新观点。

(九)十八大对依法治国进一步强调了。报告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十)十八大报告更加突出强调腐败问题的严重危害性,提出“亡党亡国”的警示。重申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党内组织纪律。“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了反腐败问题。他指出:“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十八大后,第一个部级干部严重违纪遭中纪委调查的,是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表现了中央反腐的决心。

三、十八大报告给习近平时代预留了哪些施展空间?

有些专家解读十八大报告,指出一些不足。这也正是为新领导集体施展拳脚留下的空间。比如,对形势和问题的判断,危机意识和反省能力比较欠缺。十八大报告对我国国情的判断,认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一判断仍沿袭1956年中共八大的提法,就没有依据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变化与时俱进,加以更准确的表述。目前理论界较为普遍认同的、也是有实证调查佐证的,应当突出对权利保障和政治参与的不断增长需求;对民生社会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平衡发展的需求,而不能以现代化建设初期一般的物质文化需要所能表达。社会建设领域“民生需要”的满足,和政治建设领域“权力腐败”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期待和基本共识。对这样已经形成基本共识的问题,照说应该

纳入到十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表述之中。这个缺陷,习近平同志在会见中外记者的讲话和在新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中加以适当弥补了。

再如,十八大报告把目前存在的问题看作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认为通过深化科学发展,就可以解决,而没有从体制性的内在冲突和矛盾以及基于大众的切身体验来思考和认识。其实,“发展中问题”与“体制性问题”的根本区别,是体制性问题不能仅仅依赖发展本身来解决,体制性问题带有内在结构性矛盾,必须靠整体全局的体制性改革和结构性调整来解决。经过30年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区域发展的差距拉大已经形成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这就提出“两个能否相适应”的问题,一是共产党领导与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能否相适应的问题;一是地方发展的多元化、不平衡与一元化中央集权体制能否相适应的问题。“一把手集权体制”导致政治腐败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放大,以及“一元化大一统集权体制”导致的对地方、下级多元化创新发展的遏制,这两大问题所造成的政治经济体制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实现。这就必须更加重视把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和民主法治原则,贯彻到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中去。只有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和科学民主法治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资本创新竞争机制的有机结合,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发展目标和价值追求等根本问题上消除这些已经显性化的体制性弊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性问题。

总的说,对体制性问题认识不足,是主要问题所在。我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不是一般经济领域的腐败,而是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教育腐败,这是体制性的腐败,不从体制着手,反腐败也只能是揭发一个,清除一个,又长一个,循环往复,不能除本。近日,河南省交通厅厅长贪腐二千多万元被判无期徒刑,是近年来河南省交通厅第四任前赴后继的腐败厅长了。这很典型地反映了体制性腐败的顽固性,和治标不治本的复发性。所以,我们要非常重视体制性问

题,大力推进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体制改革。应当看到,党政不分的体制,两套系统公务员膨胀,行政财政挤占民生财政太多的问题;城乡二元体制造成农民工与市民矛盾,城乡之间矛盾,贫富差距拉大矛盾问题;一把手专权失去监督,造成公权私用、公务员家丁化、官员家属财产集聚化的问题,等等,这些体制性问题造成的危险,我认为要比精神懈怠、能力不足的危险更加危险得多。

四、怎么看“胡温新政”和薄熙来事件给习近平时代留下的财富?

2003年底2004年初,“胡温新政”传遍国内外。当时依据的是:组织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学宪法,有依宪治国新理念;废除领导人出访送往迎来的仪式,取消北戴河夏季办公,有平民政治家风度;非典事件中当机立断撤销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有政治权威的果断;造访各民主党派,有民主政治之风;带领新常委参访西柏坡,有继承革命传统意愿;向中央全会报告政治局工作,有遵守、规范党章新作风;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有思想理论新建树。因此,“胡温新政”一时影响广泛。

综观这十年,胡锦涛作为第四代领导人的政绩,以下五是客观存在的:

一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社会和谐论。胡锦涛执政之初,就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强调建设和谐社会,以此来指导近十年的实践。这样,我国就从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向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转变,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扭转了多年来片面追求生产总值增长的局面,把社会建设、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创新提到议事日程的重要地位,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加快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变革。尤其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保护人权、财产权入宪,是意义重大的贡献。2002年,中国已正式加入WTO,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日益融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经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2012年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2002年的4倍。中国超过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的人口城镇化率从38%上升到51%，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跃居世界第二，高铁里程从无到全球最长，中国企业开始不断的海外并购，中国居民成了海外旅游和奢侈品购买的主力，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

二是为中共建立党与国家领导人规范化的退休制度，为了让新一代放开手脚，减少老一代人的干政，胡锦涛毅然决然裸退，开创了领导人到站下车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先河。

三是促进了大陆和台湾和平发展新局面的发展。把两岸关系纳入到和平发展的轨道，两岸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胡锦涛做到了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以“四个绝不”开篇，展现了对台原则问题不妥协，不让步；同时积极促进国共两党高层交往，推进两岸经济合作。近期民进党领导登陆，说明了胡锦涛的对台政策和思路是成功的。对台工作的成效，是两岸同胞公认的。

四是求真务实关注民生，多元化思潮社会形成。这十年，从废除农业税，和普及义务教育免学费，到农民的医疗保险，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普通老百姓感受实惠最多的时期。同时，随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以及互联网的发展，开创了网络监督新形式，推动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刻变革。互联网、微博等开创了民主监督的新形式，从一定层面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引发了人民思潮的巨变。

五是切实强化了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发展军事科技成果显著。

诚然，这十年也留下遗憾和不足：一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过分强调循序渐进和顶层设计，造成政治体制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滞后。二是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进一步深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没有理顺，改革成了口号，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扰乱了经济秩序，滋生了腐败。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绊脚石。三是腐败愈演愈烈，群体事件越来越多，政府的公信度降低。

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创立科学发展观，提倡包容性发展，这些理论有待进一步实施和落实。这正是为习近平时代施展拳脚预留了前进的空间。

今年2月突发王立军事件，令党内外国内外

目瞪口呆。接着牵出薄谷开来毒杀外国人的凶杀案，像一部离奇的电影片。最后薄熙来被宣布“双开”，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个非常具有悬念和挑战性的案件，显然与“两陈案件”（陈希同、陈良宇）不同。人们自然而然会提出两个“如果”来：薄熙来如果进入十八届政治局常委怎么办？今后政治局常委中如果出现李熙来张熙来怎么办？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薄熙来事件让我们更有远见地思考，在常人政治时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交接班后，怎样加强最高领导层的团结和集中，以行使坚强的领导力，正确应对内部的干扰与挑战；同时又要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政见的问题，允许不同政见的存在与实践。这是现代执政党面临的两大问题。必须从党纪法规角度，一方面给总书记必要的集中权力，比如具有对常委会决定的特殊否定权；另一方面又要允许党内有派，允许常委会内有不同政见之争。这是常人政治时代政治局常委会建设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

此外，吸取薄熙来事件教训，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说，必须从法制上改变地方党委书记独揽大权不受制约的状况；可用保障和扩大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方式加强对地方党委书记的监督；可以独立的司法来改变各地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书记个人的情况。要保证办理刑事案件的三方主体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门，按法律规定相互制约，严禁任何形式的合署办公；有必要压缩和分散公安部门权力，提升法院地位，防止公安部门主导法院、检察院行使职权。同时改革司法体制，实现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为此进行配套的改革。法院审理案件必须完全公开；被告人有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必须予以保障，不得变相剥夺。■

（作者为《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本刊声明

最近，有人冒用《炎黄春秋》杂志编辑人员名义进行采访并搜集资料。为此，本刊郑重声明：《炎黄春秋》杂志编辑部成员均刊登在杂志的版权页上，本刊目前没有外聘和实习采编人员。

炎黄春秋杂志社

万州的“二月镇反”和“六三事件”

○ 刘国平

(一)

1966年初春,我正在四川省万县市(现重庆市万州区)一所中学念高三,再过几个月就要高考了,我们已进入复习迎考的冲刺阶段。当时,全社会已经并继续在发生巨大变化。神州大地,雷鸣电闪,但我和班上的绝大多数同学一样,缺乏政治敏感,全然没有理会社会上的巨大变化,仍然一门心思地想着高考。时间到了5月,高考进入倒计时。就在过两天就要填报高考志愿的一天上午(那时是先填报志愿,后进行高考),班主任走进教室,宣读了一则国务院关于高考延期半年的消息。延考的决定一公布,学生们来不及细想,便纷纷扔下书本,积极响应号召,投入到那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去。

万州的形势和全国一样,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造反的学生在红司令和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下,势力迅速壮大。我所参加的“赤旗”战团,已经在学生组织中占有半壁江山,足以在万州城呼风唤雨。而和“赤旗”对立的学生组织“东方红”却节节败退,奋力挣扎。人心已经大变,造反成为时髦。

那时,一个人即使没有参加某个组织,但思想上总有某个组织的观点,几乎没有逍遥派。为证明各自组织的正确性,为捍卫心目中的革命路线,为表白自己才是伟大领袖最忠实的信徒和卫士,人人走火入魔,拼命地呼号呐喊。有派就有观点,观点相同,就是同志朋友,观点不同,就会反目成仇。因为每个人参加的组织各不相同,一家之中分成几派,夫妻之间各为其派而观点对立,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一时间,似乎天大地大,不如派别大,爹亲娘亲,不如观点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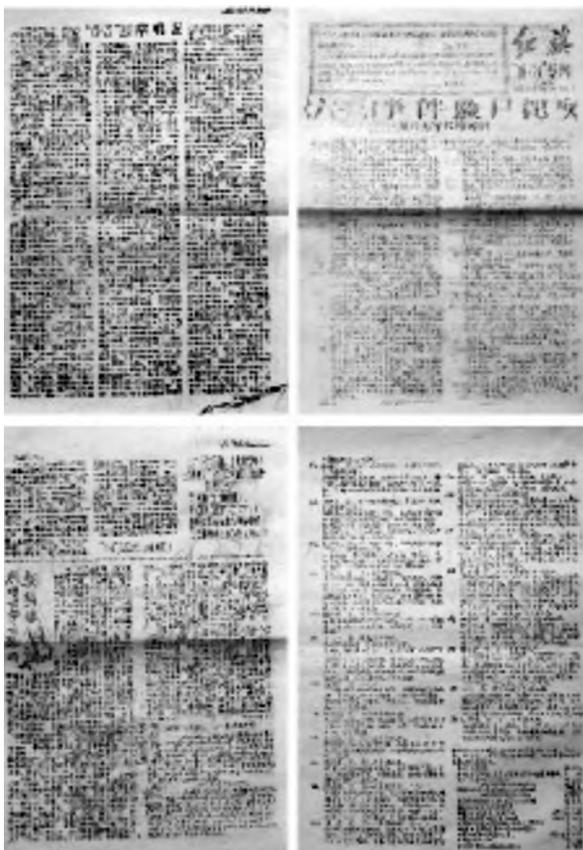
万州和全国一样,这一时期也迅速形成了两大派群众组织,比较有名气的是“赤旗”、“主力

军”、“工人造反军”,他们是运动初期自发成立的群众组织,其斗争矛头直指党内当权派,被称为造反派。与之对立的是“东方红”和“红色造反兵团”,他们成立于运动之初,多多少少有些官方背景,因而被说成保守派。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两派都是万州文革舞台上的主角。在文革发动者和运作者们的编导下,这两派组织势不两立,攻斗不息,在万州这块不大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活生生的连台闹剧。其中较为著名的当数“二月镇反”和“六三事件”。

(二)

1967年初,在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的那一阵子,万州的“赤旗”、“主力军”等组织不断发展,而“东方红”和“红色造反兵团”等组织却在城里声名狼藉。于是,他们开始把主要阵地转移到农村,意欲利用农民朴素的阶级感情和比较保守的观念,扎稳阵脚,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和对立的“赤旗”、“主力军”等组织一决高下。在这样的背景下,1967年1月中旬,万州发生了有名的“落函事件”。落函公社是万州远郊的一个乡场,“东方红”和“红色造反兵团”等组织在当地势力强大。当时,盛传那里的“赤旗”派受到残酷迫害,不仅遭到捆打,有的甚至还丧了命。一时间,“落函事件”扑朔迷离,在万州城闹得沸沸扬扬。于是,万州两大群众组织“主力军”和“赤旗”就组织人员,要对“落函事件”展开调查。不过名曰调查,实则是想把两派斗争的战火燃到农村。

我们队里的何同学,是“赤旗”战团的调查人员。何同学拉上我,要我和他一道,去附近农村调查两派消长的情况。而在“赤旗”战团任头头的汪同学,这时又推荐我去当时万州有名的群众组织小报《江城战报》工作。我则打算先与何同学一道,作作农村调查后,再去编辑部报到。后



文革期间记述万州“6·3事件”概况和验尸纪实的小报来庆幸，幸好没去及时报到，否则，或许早成为枪下冤鬼了。

全国夺权斗争的深入开展，更加突显了文革新贵与旧宠要员间的矛盾。权力是斗争的根本，一方要攫取新权力，一方要保护既得权益，双方的尖锐斗争就必不可免。2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堂，围绕党政军大权的争夺，就发生了所谓的“二月逆流”。所谓的“二月逆流”，在北京是会议室里对中央文革的怒斥，在外地就是对造反派的镇压。

1967年2月22日，万州发生了令人震惊的“2·22镇反”。那时，我们战队的同学都住在学校，而学校就在万县军分区下面。那天凌晨，我们还未起床，就被军分区的高音喇叭声吵醒。喇叭里传来宣布“主力军”是反革命组织，“赤旗”是反革命帮凶的刺耳声音，还反复广播在一些地段实行戒严的通告。学生们一听，大为震惊和不解，马上开动学校的高音喇叭，向着军分区方向抗议，说这是镇压革命群众组织的反革命行动，并号召学生们不要理会戒严令，立即上街游行抗议。

早上，由各路学生、工人、干部和市民参加的游行队伍汇集一起，开始了声势壮观的大游行。这时，传来“真元堂”里有群众被打死的消息。“真元堂”原是一座教堂，文革期间成了群众组织“主力军”的总部驻地，我原先准备去报到的《江城战报》编辑部也设在那里。

“主力军”是当时万州最知名的群众组织。运动初期，他们的斗争矛头直指党内当权派，因而成为万州地区“二月镇反”的首选对象。之前不久，当权者们已对这个群众组织恨之入骨，并罗织了许多罪状，甚至编造了他们要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的骇人听闻。镇压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组织”，自然得到了上面的首肯。

听说，那天凌晨宣布戒严令后，军人冲进“真元堂”抓人时，不由分说，首先对着里面就是一阵扫射，当场打死5人。死者中，有一名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子弹打穿了他的肚皮，肠子流了出来，但没有立即咽气。他挣扎着用手指蘸上从自己创口流出的鲜红血液，在墙壁上歪歪斜斜地写下了“我是革命的”几个字，然后颓然倒地。就在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之际，他还念念不忘“革命”，这便是那时的红卫兵。一个远离家乡的青年大学生，积极响应伟大号召，踊跃投身文革运动，顷刻之间，却成了永不归乡的孤魂野鬼。

设在“真元堂”里的《江城战报》编辑部，自然也不能幸免，它和“主力军”总部一样，遭到了查封，主要成员也被抓捕。

“真元堂”里有群众被打死的消息，激起了游行队伍的极大义愤。他们来到“真元堂”大门外的马路上，面对持枪戒严的军人，毫不畏惧，想冲进大门去抢出已被枪杀的战友尸体。岂料在场长官下令，士兵断然开枪，赤手空拳的民众被无情的枪弹射杀，当场又有近20人倒在血泊中，其中多数是参加“赤旗”战团的学生。

1967年2月22日，在万州的“真元堂”内外，分别有5人和18人被射杀，加上军方宣布戒严令时，在马路误伤致死的1人，共有24人在枪口下丧生。这就是文革中发生在万州的“2·22镇反”事件。

后来，事实表明，遭到镇压的“主力军”并不是反革命组织，因而这次镇反是明白无误的冤案。可是，一次射杀20多名无辜民众，竟然没人

对此承担责任,更没有对主要责任者追查惩处。

目睹自己的战友遇难,人们无不义愤填膺。用木板抬着在“真元堂”门外被射杀的18具尸体,开始了全城大游行。几个尚未被抓的群众组织头头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后面是望不到头的游行队伍。大家光着头,任雨水淋湿了衣衫,浸湿了身体,仍然迈着沉重的脚步,在万州的主要街道游行。人们不停地呼喊口号,呼唤着死去的战友,唱着《国际歌》。整个万州上空,弥漫着悲愤和抗争的气氛。

全城大游行并没有改变被镇压的群众组织的命运,紧接而来的几天,万州城恐怖笼罩,几乎各单位都在抓人。我校的汪同学和向同学,因为都是“赤旗”的头头,也很快被抓入狱。隔不多久,还分别把他们押回学校,接受另一派组织的批斗。批斗会上,汪同学面色苍白,精神不振,不时用手提提裤子。而向同学则不以为然,在批斗会上,一脸不屑一顾的反叛神情。后来听说,一进监狱,就会将被抓人员的皮带、腰带一类东西收缴,以防自杀,还对他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折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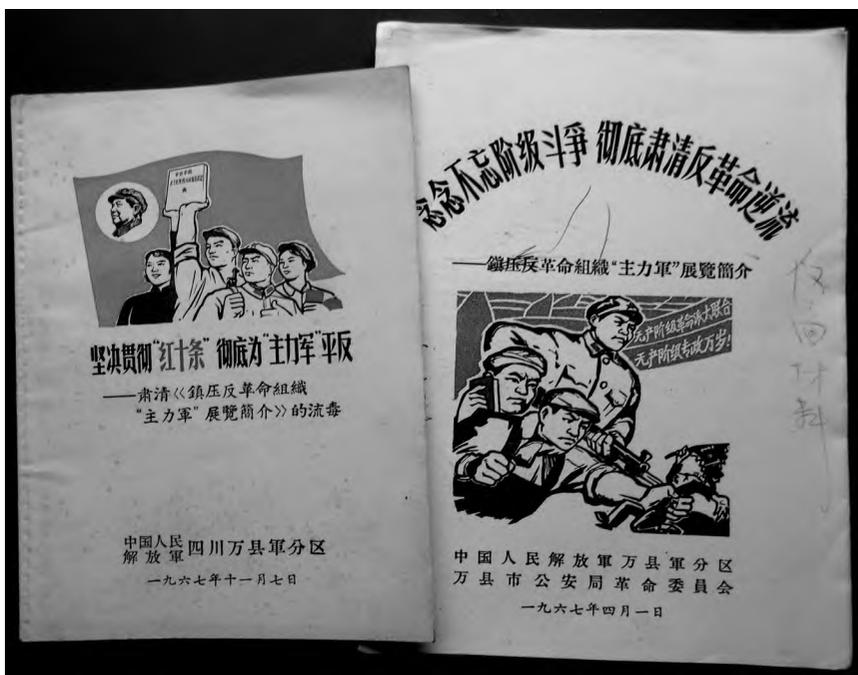
为了扩大镇反影响,把被镇压的组织搞垮搞臭,军分区和公安局还编印了镇反的小册子广为散发。小册子中,除了罗织“主力军”和“赤旗”等群众组织的大量罪状外,还刊印了这些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熊某某、钟某某等20多名头头的照片,简述了他们的反革命罪状。为了增强宣传效果,还抓捕了与这些群众组织毫不相干的国民党旧军官姚某某,指控其充当“主力军”的幕后指挥。姚某某曾任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副师长,在万州是一条难得逮到的“大鱼”,因而被判刑劳改。出狱后,尽管这位国军高官和众多被定义的阶级敌人一样,谨遵“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训示,成天谨小慎为,惶恐度日,但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仍然在劫难逃。“2·22镇反”中,祸从天降,这位昔日国军的少将副师长,又被抓捕入狱,其被剃了光头的照片,被赫然列在仅次于“主力军”头头、“匪首”熊某某的第二位。那个时代,欲置对手于死地,把他与国民党之类的阶级敌人挂钩,是一个惯常使用的有效办法。

虽然宣布取缔了“主力军”等群众组织,抓了

这些组织的头头,并把他们押回原单位批斗,但其多数成员的暗中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一些人想法跑到北京,去找红司令和中央文革告状;一些人在秘密串联,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我们战队的主要人员都没回家,仍然住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议论文革的形势,交流打听到的小道消息,刻印和散发传单。传单的主要内容,是最高统帅和中央文革关于革命造反的论述、指示和讲话,还有著名群众组织的活动情况。此外,还刻印了一些歌曲,以表达那时受压学生的心情。多是《抬头望见北斗星》、《远飞的大雁》一类心情沉重,企盼救星的歌曲。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中央文革为首的文革新贵占了上风,全国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记得1967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好像是《在大风大浪里成长》。就是这篇文章,吹响了全国范围内反击“二月逆流”的号角。当时见到这篇文章,我们激动不已,互相传看,高呼我们就要翻身了!同学们还从多种渠道收集传单,获取各地被镇压组织不屈不挠的斗争信息,催生希望,鼓舞斗志。记得当时有份传单,综述了青海、四川等地群众组织抗击“二月逆流”的情况。文章劈头两句便是:湟河两岸烽烟起,巴山蜀水杀声急。那时,我觉得文章开头用这诗一样的语句,很有感染力和号召力,所以至今难忘。不久,从北京又传回告状学生的信息: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毛主席支持造反派!本来偃旗息鼓的群众组织,就像被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一下子复苏了。被镇压的群众组织又纷纷竖起自己的旗帜,拉开架势,要与另一派组织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迫于形势和上面的高压,军分区不得不宣布为被取缔的反革命组织“主力军”和帮凶“赤旗”等群众组织平反,被抓的群众组织头头和骨干全部被无罪释放。此外,为了消除此前广为散发的镇反小册子的影响,有关部门又不得不特地制作了相应的平反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上仍然刊登了20多名群众组织头头的照片,但与上本小册子不同,他们个个精神焕发,面貌一新,而且还被夸为忠诚的革命战士、坚定的革命造反派。反革命和革命的转换,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实在令人叹绝。



1967年万州“2·22镇反”时印发的镇反宣传册和随后印发的平反小册子

“二月逆流”匆匆而过。在失去了一个多月的自由后，被镇压的群众组织的头头和骨干们又全部出狱了。

(三)

复苏后的群众组织，和另一派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辩论言辞之尖锐，已超乎寻常。一些场合的辩论还指指划划，互吐唾沫，甚至手脚并用。文斗的文化大革命，开始露出武斗的端倪。这当儿，万州发生了震惊世人的“6·3事件”。

“赤旗”战团等学生组织为了显示其造反精神，不但要砸烂公检法，还要揪斗公安局长。为此，策划了到公安局示威的大游行。1967年6月3日上午，以“赤旗”战团为主的学生，聚集了上千余人，在其主要头头的带领下，开始了这次行动。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口号，来到了万州有名的“252”（门牌号码），那里是万县市公安局的大门。学生们想在那里揪出公安局长，开一个现场批斗会。

队伍出发前，汪同学找到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交给我们一项任务。说是在首都红卫兵赴万联络处那里，有个什么“百丑图”，让我们去看一看，看今后万州能不能搞个类似的东西。就这

样，阴差阳错，我没能参加那天的大游行，又躲过了一劫。

我们战队的同学，几乎都参加了这次大游行。其中几个和我个头差不多的，还走在了游行队伍的前头。“6·3事件”发生的当天中午，他们回到学校，一个个脸青面黑，惊魂未定，给我讲述了事件的大致经过，因此，至今我印象犹深。

学生们的游行大队伍来到公安局门前，先是高呼口号，随后开始进入公安局院内。那时公安局的大门并不宽敞，门前还有一段青石台阶，大队伍要想迅速进出是很困难的。我队的谷同学、刘同学走

在队伍最前头，紧接着是蜂拥而入的学生大队伍。学生们冲进公安局大院，里面不很大的天井，密密麻麻地拥挤着好几百学生，而大门外的学生，还想拼命地挤入门内。冲进大院的学生，高呼要揪斗公安局长的口号，和守候在那里的公安人员发生了冲突。学生们赤手空拳，而对方在局长的指挥下，早有准备，纷纷用砖头、石块、瓦片等打向学生队伍。一些学生被飞来的砖石击中，血流满面。正在双方激烈冲突之际，忽听一声哨响，从公安局后院冲出一队头戴钢盔，手执钩镰枪的消防官兵。他们杀气腾腾，咄咄逼人地冲向学生。学生们何曾见过这种阵势，霎时间乱了阵脚，前面的学生纷纷夺路逃命，躲进大院两边的小屋，情急之下，一些人慌不择路，从小屋的窗户跳下，下面是离窗3米左右的小路，可从那儿侥幸逃生。而大多数进入大院的学生，惶急之下，急急忙忙地向门口撤退躲避。可是大门窄小，后面游行的大队伍又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情况。就这样，前面的人员惊慌的往外撤，后面的人员继续往里涌。结果，在窄小的大门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拥堵、踩踏。

我有一位陈同学，现已成为川渝知名的画家、雕塑家，曾在事后不久对我讲，6月3日那天，他也随大队伍进到公安局大院内，在众多学生惊

恐地向外涌逃时,他被压在了底层,上面人压人,压了好几层,他根本无法动弹。幸好他没被压在场中间,两只胳膊又支在胸前,死命抵住,才使胸部免受致命重压,幸运地捡得了一条小命。但是,另外一些同学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被压在底层,经不住重压,当场窒息而亡的学生竟有30人之多,最小者竟是一名年仅14岁的小学生。另有79名学生受伤,其中一名重伤者后来被送到重庆,也没有抢救过来。

遇难学生的尸体很快被送到专区医院。30具尸体在医院大门前停放了一长排,个个面呈紫黑色,惨不忍睹,那是窒息身亡的明显特征。紧接着,在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对遇难学生验尸。参加验尸的,是军队、公安局、医院、本地及外地学校等15个单位派出的十几名人员。在随后公布的验尸纪实中,遇难学生多有“焦痂”、“鼻孔口腔有血性分泌物”之类的记述。后来有人说,是公安局施放了毒气弹,遇难学生的尸体才呈现那种紫黑色。不过我想,一个县级公安局,恐怕还没有施放毒气弹的胆量。

在不幸遇难的几十名学生中,有我班的张同学。张同学家庭条件好,性格温和,长相帅气,能歌善舞,是“赤旗”战团宣传队的活跃人物,谁知竟不幸在事件中罹难。我现在尚存一份载有验尸纪实的传单,其中第十八位就是他。文中是这么记录的:“张某某(记录中是实名,我在这里姑隐其名),男,万三中赤旗战团。口腔有血性分泌物,左肩部有6×1.5公分、4.5×2.3公分两个焦痂,相距1公分,左膝外侧1.5×0.5公分焦痂”。从验尸纪实看,他大约是受到踩踏重压后窒息而亡的。噩耗传来,同学们无不震惊,其家人更是悲痛欲绝。

随后,事件中的遇难学生和后来在武斗中的一些丧生者,被埋葬在万州西山公园上面的一块空地里,那里曾被叫做烈士陵园。不久,风向转变,烈士陵园被取消,坟墓纷纷迁葬,空出来的土地,种植了一大片柑橘树。在万州,昔日烈士陵园里的坟墓早已迁出,墓地上的柑橘树也被砍得精光,在那里已修建了一排排高楼,当年的烈士陵园已荡然无存。住在高楼大厦的人们,有几个知道在他们的楼房下面,曾经安葬过几十名文革中的无辜死难者。

几年后,在对文革进行“秋后算账”时,把“6·3事件”作为一条主要罪状,算到了“赤旗”战团的头头钟同学身上。钟同学因此从地革委副主任的高位跌落,沦为阶下囚,被判刑十年。而事件的另一位主角、当时学生们要揪斗的那位公安局长,却因此而声名大振,虽然在短时间内受到过批斗,但不久即官复原职,后来还荣升为该地的副市长。“一将功成万骨枯”,顶戴多少血染成。三十余名无辜的青年学生,化作道道冤魂,竟然成就了一些人天壤之别的结局,不免让人唏嘘感叹。后来有人说,无论是公安局长还是学生头头,他们都无法超越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他们的升降沉浮,荣辱成败,都被那个时代紧紧地捆绑,因此,不必过多地追究个人在运动中的责任。这话也许不错。不过我想,是谁,或者说是怎样才造就了那样的一个时代呢?这难道不值得深刻反思吗? ■

(节选自《朝事暮想集》,本文有改动)

(作者为重庆三峡职业学院高级讲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社科人文 文学小说 党建管理 经济管理 书画摄影

正规出书 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一)社科人文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二)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管理、行政管理、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专著;(三)文学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四)小说类书稿: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五)美术类:画册、书法作品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签订标准出版合同,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80-8368

投稿邮箱: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

综合编辑部收;邮编:100025

电话:010-57733087、57733088、57733086;

传真:010-89506878;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高晶、嘉悦、文馨(编辑)

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bookhk.net>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一个生产队的四清

○ 于俊沂

四清工作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总结一下它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有益的,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所谓“四清”,即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在政治上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思想上与资本主义决裂,在经济上杜绝贪赃枉法,在组织上纯洁队伍。概括起来,就是抓农村的阶级斗争,促进生产。其效果到底如何呢?我们不妨看看一个生产大队的情况。

本人参加四清工作的单位名称为:天津市南郊区长青四清分团和平之路工作队(以下简称“工作队”)。队员31人,分别来自以下几个部门:国家机关、银行、大学、中学、工厂、农村生产队;指导员和队长,均已搞过一期四清,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进驻和平之路生产大队的时间,是1965年10月25日,地址位于天津市河西区平山道和平里。这个大队不足200户人家,绝大多数为城市户口。经济条件得天独厚,土地面积大约:稻田1000亩、园田(蔬菜)500亩、鱼池500亩、藕田200亩。设有稻田、园田、鱼藕、副业、运输5个小队。年收入较为可观,公共积累达60万元,还给大家盖了100多间宿舍。社员们的温饱得到了解决。

面对这样富有的生产队,大家经过初步分析后认为:这个深山老林必有“虎”(贪污犯),阶级斗争这根弦一定得绷紧,工作要“高标准”,做到万无一失。既要不漏掉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大家揭发检举。同时配合内查外调,一旦发现疑点,就跟踪到底,搞个“水落石出”。对工作进展情况和遇到的问题,三天两头就向长青四清分团汇报,得到了及时的指导,使工作按照计划正常进行。

经过近半年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得出的结论与原来的主观想象正相反,既没有发现“虎”影

子,也未见到“猫”的足迹;不仅没有贪污犯罪,就连多吃多占也不存在。以大队书记徐恩普为例:他的生活极为俭朴,4口之家住的是15平方米平房,家具陈旧:骑的自行车架子是用自来水管焊接的。小队干部也是如此,看不到一点与众不同的特殊化现象。工作队员具有30年工龄的银行会计范宝伦,反复查看账目,没有找出任何漏洞。经大家充分讨论,绝大多数同志认为这个大队属一类队。经请示分团批准后,定于1966年4月1日宣布干部“下楼”(解放)。

对于上述决定,工作队杨队长和另一名李队员,是有不同意见的。他们认为这个生产队干部绝非“两袖清风”,而是指导员黄文彬立场不坚定,与大队干部关系密切,有意包庇,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他们高举“反右”的旗帜,以使人震惊的语言,写了一封信,越级直接上报给天津市郊区四清总团。

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怕右不怕“左”,是人们的通病。凡是有关反右的案件,人们格外重视,谁也不敢耽误;否则就极有可能被扣上“同流合污”的罪名。四清总团收到举报信后,未作认真研究,就认定情况属实。立即派了一名赵特派员,来到了工作队,宣布大队干部“下楼”暂缓,黄文彬停职反省。然后按照杨队长的指点,找了一部分人谈话,作了极为片面的“调查”。对那封空洞无物的举报信,毫不怀疑,全盘否定了前期的四清工作。决定再从头搞起,来一次大“回炉”。四清总团首先认为,长青四清分团领导有“失职”之处,故而调换了政委和团长。同时对工作队的领导进行了改组,重新任命了一名指导员,增加了一位队长,分团也派了一名特派员。对来自银行的会计范宝伦,不予信任,让他靠边站。从异地调来一名新干部,重新查账。新上任的贺指导员,很有“魄力”,先后烧了“三把火”,显得“轰轰烈烈”。

首先以大队会计为重点,展开攻势。由于受尽煎熬,对方终于招架不住,被迫谎称“贪污”900元。初战“告捷”,贺指导员欣喜若狂,扬眉吐气,顾不得核实,就信以为真。他说:“现在我讲话算是有根了!”对前期的四清工作的否定,也就有了“依据”。故而他在用词上又动了一番脑筋,概括了以下几句话:“和平之路四清工作队,进驻了和平之路生产队,住在了平山道和平里,与四不清干部和平共处,搞了走过场的和平四清。”在他看来,这“和平”二字,简直成了“洪水猛兽”。四清总团得知后,在表扬了贺指导员的同时,给黄文彬戴上了“修正主义分子”帽子,并在文件上点了名,遣送回原单位天津体育学院。

第二是在工作队内部抓黄文彬的“同伙”,肃清其“流毒”。把那些在工作上与黄文彬联系较多的同志作为重点,口诛笔伐。例如来自银行的会计范宝伦,其任务就是查账,这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让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入城干部江明和曾在天津日报当过编辑的本人,帮助指导员写材料,都是无可非议的。但却被曲解为“重用专家才子”,“歧视工农干部”。而且还把范宝伦称之为黄文彬的“黑高参”;写材料的二人则是他的“左膀右臂”。至于与黄文彬接触较多的女队员,则被诬蔑为“关系暧昧”;如果是男同志,那就要被怀疑搞了什么“阴谋诡计”。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最后因拿不出任何证据,挖“同伙”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第三是在社员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经过近半年的揭发检举和内查外调表明,大队内部并不存在上述坏人。但贺指导员要来点真格的,重新发动群众,在攻克900元“贪污”款的基础上,扩大战果,再扫出几只“老虎”来。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不但一无所获,而且形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群众之间揭发的问题,几乎全是男女生活作风方面的隐私。男社员倒不大在意,而女同胞却被剃成了“阴阳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满面羞愧,无地自容。使一些人由原来的和睦相处,变成了冤家对头。有人说:“工作队闲得没事干,自己给自己添病。”然而,有一件事倒是让何指导员高兴了一阵子,那就是正在上初中的生产队长的儿子,说了一句:“我看江青不像好人,别把毛主席给骗了!”贺指

导员得知后,认为这个案子的破获,胜过抓捕一只“老虎”,便兴师动众,召开大会,让派出所来人,当场把他作为现行反革命逮走。后经仔细审查,被拘押者系“三好”学生,家庭出身贫农,又未成年,仅凭其一句错话,就定为反革命,太“小题大做”了,故而宣告无罪释放。此事影响极坏。

到了年底,四清工作队准备撤出,如何收场可就没那么容易了。首先落实会计退赔900元“贪污”款问题,人家提出:“请拿出证据来!”贺指导员可就傻眼了。原来那是逼供信的产物,无中生有。这笔“贪污”款被推翻,就标志“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啊!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证明前期的四清工作是过硬的,经受住了考验。黄文彬没有错误,给他扣上的“包庇四不清干部”、“修正主义分子”帽子,是一桩大冤案;还有受其株连的所谓“同伙”,均属颠倒是非,强加之罪,应该一律推倒,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不仅如此,贺指导员在社员中还欠下了几笔不小的债,伤害了許多人,耽误了生产,减少了收入,等等。此事“始作俑者”,当然是杨队长和李队员,谎报“敌情”,欺骗领导;四清总团官僚主义,偏听偏信。但贺指导员是积极贯彻执行者,且自主创新,责任非同一般。惹了那么大的祸,如果不给个说法,作出交代,就逃之夭夭,那就很可能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还算明智,先后向社员们和被污辱的工作队员,作了赔礼道歉,取得了谅解。

最为悲惨的是黄文彬同志,实践证明他一点也没错,由于当时正处在文革期间,天津市郊区四清总团已经撤销,天津市委处于瘫痪状态,关于他的平反无人负责。而天津体育学院的造反派又不明真相,仍然揪住不放。迫使他东躲西藏,无处栖身,由抑郁而导致肺癌,于1968年含冤逝世,年仅37岁。

和平之路生产大队的四清工作,历时一年多,投入了不少人力,不但一事无成,反而使生产受到了损失,伤害了不少人,破坏了安定团结局面。■

(作者为天津市人大机关副局级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我亲历的造神运动

○ 裴 毅

1966年到1968年,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人人都胸佩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个个都手捧毛主席语录,在各种会议和集会场合,都激动地高举语录,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无论是机关、部队、学校还是工厂、商店、街道,每个单位都要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都要进行早请示、晚汇报活动,狂热的个人崇拜之风引向极致。

本人曾在海军参加过几次带领中学红卫兵接受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或长安街接见红卫兵宏大激动的场面,也参加过几次毛泽东主席接见有关军兵种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只见许许多多连队干部和战士代表,每人都拿着一块别满了连队或排、班干部战士个人毛主席像章的布块和毛巾,当毛主席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现场时,拿出来面向毛主席又抖又摇,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跳动,高呼万岁。他们回部队后,都要举行隆重的不同仪式,将毛主席接见过的像章发还给每个人,这些没有机会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干部战士,在拿到和别上毛主席接见过的毛主席像章,表现出十分激动和自豪的状态。其中,沈阳军区部队和地方上的红卫兵推行的“忠”字舞,迅速传遍了中华大地,红卫兵身穿令人羡慕的绿军装,胸别各式毛主席像章,整齐地、慷慨激昂地表演各种形式的“忠”字舞,已成为当时红卫兵运动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更有甚者,我当时因任务出差经过宁波市,见到在市区街道有的居委会的办公室内,看到墙的正中挂着毛主席像,像下放着一张长桌子,摆着一些供品样东西和两支点燃的蜡烛,桌前站着一排低头请罪的“四类分子”,据说,一次要站一至两个小时。当然也有另一种形式,“因类分子”胸前挂牌,在居委会门口的街沿上,低头站立一排,向过

往人展示请罪。毛泽东主席,已经成为了民间的真神。

我当时是海军政治部的秘书,1967年因工作需要,随首长同时兼任军委办事组秘书工作,当时很多领导机关(包括军队的一些领导机关)都无法正常工作,为避免受到军内外红卫兵的冲击,军委日常办公地点,也离开了三座门原址,临时迁到了西郊军委总参谋部机关事务管理局直管的京西宾馆。对一般外人而言,京西宾馆外表并不起眼,但实际上保密和安全工作十分严密。它的外围是中央警卫一师管辖的布防重点目标之一,内卫是宾馆警卫部门的严格管理,没有必要的手续和内部通知,任何人都无法靠近和进入宾馆。因此,京西宾馆当时一直住着不少在本地区受到冲击,但受到中央首长指令保护的军区司令、政委等首长及其家属。同时,京西宾馆不仅有一个不小的礼堂,而且还有很多间很大的会议室,周恩来总理和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也常借用此处会议室,召集有关地区两派对立的造反组织进京代表进行调解,首长们坐车从后门直开进来,结束后坐车悄然离开,非常隐蔽和安全。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第一次接见部队团以上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在京西宾馆礼堂举行的。

军委办事组的办公室设在临街主楼的十楼整层楼里,内卫由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直接警戒和管理。由军委办公厅统一领导和管理行政工作、机要文件、会议安排、通讯设施、安全保密和警卫等工作,我记得当时我们的直接领导是原军委办公厅金涛副主任(肖向荣主任当时已被迫靠边),经常性的具体日常工作多由秘书科吴一平科长安排。军委办事组首长开始时有这样几位:杨成武代总参谋长(组长)、吴法宪空军司令员(副组长)、邱会作总后勤部长(组员)、张秀川海军政治部主任(组员)以及民航局刘锦平政委(负责政工

一块)等。林彪夫人叶群既是林彪办公室主任,也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但不参加具体工作,偶尔也参加会议。办事组首长各有一(大或小)套间,作为办公和休息的地方,每个首长秘书和办公厅几位秘书均各有一间带卫生间的客房作为办公和睡觉用。

军委办事组首长处理日常事务,都是跟随毛泽东主席夜间办公习惯和节奏进行,一般在白天处理本部队的机关工作,在晚饭以后六七点钟开始,多数以集体碰头开会形式,在京西宾馆后楼会议室进行。处理包括中央、中央文革布置的有关工作和军委三总部、军兵种和各大军区请示的有关工作。每次开会,夜12点前结束的很少,多数在深夜两三点钟,甚至凌晨五六点钟结束。所以中间有一点夜宵,就是一小碗面片汤或面条,这是免费的。喝茶的话,无论是首长还是秘书,向服务员要一小包茶叶,都要现付两角几分钱。

我们几个首长秘书的工作,主要是以下几项:每天要看几十份电报和中央下发的三总部、军兵种、各军区甚至是军一级上报的文件电报,重要的、机关的要做出摘要,提交首长参阅;陪同首长参加机关会议做记录;列席办事组每次办公会议轮流做记录,轮流参加军委办事组的日常值班和接待工作等,面上的工作主要由办公厅几位秘书承担处理,他们面上熟悉,业务熟练,工作麻利,值得我们学习。

这期间曾有这样一件事,至今我仍记忆深刻。它发生在兰州,时间大约是1967年秋冬之际的一天(具体日期已记不准确,但在机关档案中可以查到),在我收到的数十份电报和文件中,有一份兰州军区党委和政治部上报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同时下发兰州军区各军、省军区直至各军分区、团等单位。主要内容是:兰州军区和地方革委会共同在兰州市最大的广场上(具体名字记不得了),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军民同学毛著、表忠心的大会,约有上万人部队官兵和地方群众一起参加,其中最震撼人心的内容是,开始时首先由地方群众组织几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代表,先后走上讲台,汇报各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和收获,当表忠心发言即将结束时,每个代表都激动地解开上衣纽扣,露出结实的胸膛,赫然显露出别在胸肌上的一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



虔诚者

像章,以显示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振臂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等,马上整个大会会场沸腾了,全体与会军民群众热泪盈眶,口号声此起彼伏,场面蔚为壮观。接下来是军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三位代表同时走上高高的主席台,他们在激昂地汇报完向毛主席表忠心的讲演后,三人同志解开军上衣,每人都露出别在胸脯肉上各种不同式样的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而且是每人在胸脯上各别了三枚,这种产生的震撼场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整个大会会场的军民都站起来,激动的泪水,振臂高呼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军区党委和政治部在电报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和褒奖。把它作为一种好的形式向上汇报,和向军区各部队进行推介。

说实在话,看了这份电报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和不能随便说的感觉。我本人当时也是部队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代表,也参加过接受毛主席接见的激动场面,忠于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是没有疑义的,但又总觉得像在宁波市见到的一些现象,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有点太形式化了,太神化了,有点给迷信形式连在一起了,确实有点个人崇拜过头

江青八次到天津

○ 王 辉

1974年6月至1976年8月间,江青曾先后八次来天津。当时,我任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主任,因工作关系,了解一些江青来津的情况。

江青过去从未来过天津。她在批林批孔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看到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中有一篇铁路局天津站工人宣讲儒法斗争史的报道(记者阎晶昌),便请示毛泽东要来天津看看。毛泽东决定由纪登奎陪同江青一起来津。

第一次:1974年6月17日晚10时22分,江青乘火车专列到津,在天津站下车,乘她的专车到市第一招待所。她自己住1号,日常活动在3号。6月18日晚7时半,她到干部俱乐部打乒乓球、羽毛球;19日晚7时半,她(又)和纪登奎在俱乐部大剧场参加天津站工人宣讲儒法斗争史大会并讲话。她提出要到农村看看,当时市委提出4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村,其中有宝坻县的小靳庄。江青听到介绍小靳庄有作诗、唱样板戏的情况(宝坻县一些地方有唱评戏的传统),要立即去这里。21日下午,她乘专列到宝坻县,下车乘汽车到宝坻县城,去一户职工和一户武装部干部宿舍“看望”。晚间在宝坻车站候车室,她让和她同

来的写作班子讲批《三字经》,直到凌晨3时半。22日上午,江青等人从宝坻车站候车室乘汽车到小靳庄大队,下午参加批林批孔座谈会。下午6时回到宝坻县车站,乘专列回津。晚上到俱乐部游泳、打扑克。

江青23日晚在第一招待所3号看自己带来的外国电影。24日下午,到天津重型机器厂,直接到金加工一车间转了一圈。这次她一出厂门就要回招待所,原先安排还去发电设备厂也不去了,使得警卫工作很被动,造成交通混乱。车队行驶到河北区中山路时,她的前卫车撞伤一名路人。随行的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急忙停车处理此事,将受伤路人送往附近医院,好在伤势不重,经过住院治疗,很快出院。我得悉此事,也赶赴医院看望。当晚,江青去俱乐部大剧场看天津河北梆子剧团演出《渡口》、《红灯记》选段和《泗州城》选段,还听了曲艺团演员演唱的天津时调、京韵大鼓等。25日晚,去俱乐部小剧场看天津河北梆子剧团为她演出的旧戏《断桥》、《泗州城》、《辕门斩子》、《挑滑车》。26日下午,乘军舰到渤海油田四号油井“视察”。27日下午,乘专

了。但又不能也不敢随便讲出来,可是内心总感觉发展下去有些不妥。作为军人的脾气,心里有了想法,就有点憋不住,总想说。于是我鼓起勇气在办公会前,向我的直属首长张秀川主任说了我的看法,给他看了兰州军区的电报。张主任看了后,也皱起了眉头,觉得是个问题,但当时也没说什么。但他好像也憋不住了,当走进办公会议室,会议还未正式开始前,他走到主持人杨成武代总长的座位旁小声说:“杨总长,×秘书给我看了一份兰州军区的电报,就是这一份(随即递上电报原文),他认为好像有点不妥当,请你看看……”杨成武代总长一愣,随即看了下电文,立即眉头紧锁,马上就说:“怎么搞的!这不是在搞

封建迷信一套吗!老吴(即吴法宪司令员)、老邱(即邱会作部长)、老刘(即刘锦平政委),你们都看看,这么搞怎么行呢!”随即吴司令、邱部长、刘政委等分别看了电报,都大声说了开来,都一致认为这种表忠心活动搞歪了,是封建迷信一套,首长们都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杨总长马上对邱部长讲:“老邱,你马上给兰州军区×政委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这样搞不妥当。”邱部长马上起身到隔壁房间打长途去了。第二天,兰州军区党委和政治部马上发来了电报,作了深刻检讨,并声明立即收回前一天上报和下发的这份电报。

■ (责任编辑 杨继绳)



1974年8月江青在天津小靳庄

列然后转乘汽车到驻军某部打靶,之后骑马到驻军某部看军事表演。当晚,乘专列暂时回京两天。29日晚7时,又乘专列到津,仍然住在第一招待所。6月30日晚,在天津干部俱乐部友谊厅听取天津市委汇报工作。7月1日晚7时,乘专列返京。她第一次来津,带着迟群、谢静宜、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人,庄则栋后来也被江青叫来。这次来的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35人组成的“理论班子”。她走后,把这个“理论班子”留下继续在天津活动。这是江青在天津活动时间最长的一次。

江青每次来津,都是乘专列,下车后乘自己的防弹汽车,并带有武装警卫,在她下榻的住所设警卫(岗哨),不经她的准许,任何人包括解学恭均不得入内。有两次,她还自带厨师。据负责接待工作的人说,她是最难接待的“中央首长”,对她的活动和生活实在无法安排。周恩来、刘少奇等任何领导人都没有这样的保卫规格。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据说这是中央办公厅的安排。

第二次:同年8月15日零点27分,江青乘专列到津。她说是来“休息”的,仍住“一招”原处。16日下午,到水上公园。由于水上公园休息室有风,时间不长,她很不高兴地回到住处。17日晚10时,乘专列返京。

第三次:同年9月23日晚,江青乘专列来津。24日下午,她在小靳庄陪同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参观,晚上又陪同马科斯夫人到天津自行车厂参观。当晚,乘专列返京。

第四次:同年12月4日零时3分,江青乘专

列来津。她又说是来“休息”的,还是住在“一招”。5日至7日一直在“一招”。8日晚8时半,乘专列返京。

第五次:1975年2月22日下午2时,汪东兴来天津干部俱乐部查看为毛主席休养准备的房子(按照中央办公厅的要求,这俱乐部老楼室内游泳池改造一间供毛修养的卧室),尽管毛并未来这里休养过,可当时谁也不敢对此掉以轻心。孰料江青也来了。她莫名其妙地发了一顿脾气。晚9时半,乘专列返京。

第六次:1975年3月12日晚11时40分,江青乘专列来津。她还说是来“休息”的,住在“一招”。这次也带迟群、谢静宜等人。13日、14日均在“一招”。15日晚9时,乘专列返京。

第七次:同年8月11日,江青乘专列来津。她仍说是来“休息”的,还住“一招”。12日在“一招”,13日晚乘专列返京。

第八次:1976年8月28日凌晨2时37分,江青乘专列来津,因为是在天津发生地震之后,她住在火车上。下午4时,去小靳庄,晚10时回津。29日,去天津手表厂、第一炼钢厂参观。30日下午,去看在毛条厂的排险部队和支援天津抗震救灾的某军和警备区连队,当晚返京。

江青第八次来津时,1976年8月28日下午2时,她下专列乘汽车去小靳庄。在市区的路上,她叫解学恭上了她的车,说有事谈谈。当时同坐在车上的除解学恭以外,还有江青的警卫员、护士。在车上她谈了要接见天津驻军,说她第一次来津到天津驻军看望广大指战员,部队曾因此受到邓小平的批评,现在要为他们恢复名誉。她还要把一个“顺口溜”让66军军长刘政给抄来,并要给她做套军装,说来时急,忘记带了。她还说警备区的部队也要去看看。解学恭说,还有来津支援抗震救灾的67军,不去不好。她说,也去看看。汽车行至津塘公路和京山铁路交叉口附近停车,解学恭下了她坐的车。

下午5时许,车开到离小靳庄不远的村庄,她来到参加抗震救灾的部队驻地。下车伊始,她大喊大叫,要人们走开,说要“睡一小时觉”。其实,她根本没有睡,而是装腔作势,一会儿要给战士擀面条,一会儿又要蒸馒头,搅得战士做不了饭。

据解学恭回忆,8月29日晚11时许,他刚服

安眠药睡下,突然来电话,江青让他马上到专列去。江青一见到解,就十分严厉地说,你见到了这个方案吗?说着,她把一份天津驻军打印的“接见单位名单”甩给解学恭。原来江青安排次日要到部队去,驻军急忙确定了一份“接见单位名单”,直接送给了江青。江青板着脸厉声训斥:为什么称“接见”,这是谁的主意?我是探望部队,不是接见,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为什么混淆起来!她还说:只有中央政治局在北京才是接见,我个人怎么叫接见呢!她越说越气愤,解学恭不知所措。她气势汹汹地说:明天我不去部队了。这时解有点着急,部队已准备了两天,而且是按照她的意见准备的,现在改变计划对部队怎么解释呢!解学恭这时考虑,或许自己承担了责任,事情还有挽回的可能,于是说“接见”这个词是他建议的,部队没有责任,部队准备了两天,不去恐怕不好,还是去探望一下。江青听到解承担了责任,才说:“可以去。”江青讲话时解简要记了一下,江青把解的记录稿拿过去看说:“大体还可以,有两个地方需要加一下。”解以为她要亲自改,可是她又不改,让解用笔加上她的话。最后对解说:“请你把今晚的谈话给我整理成一个记录,并起草一个电话稿,报告华国锋同志。”回来后,解学恭按江青的意见办了,把整理和起草好的记录稿、电话稿送给她看,她批了“同意”,并让解抄清一份给她。30日下午,电话稿报到了华国锋处。此事由市委办公厅经办,由办公厅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将电话稿传过去。

解学恭起草的“江青同志谈关于探望参加天津抗震救灾人民解放军连队”的记录稿,原文是:“(一)探望和接见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原则问题,决不能混为一谈。军里的报告提出了接见方案,提醒了我。(注:‘接见’——这一建议是我向江青同志提出的,军里没有责任,责任在我——解注)探望也要按下列要求办:第一,首先是探望参加抗震救灾的基层单位——连队;第二,陪同探望的领导干部,也是参加抗震救灾的,军级干部不能多了,有一、二位就可以了,也是参加或指挥抗震救灾的;第三,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的唐山、丰南、天津市、北京市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会,届时中央要接见代表。这是接见。我到小靳庄探望贫下中农,同时也看望了在小靳庄参加抗

震救灾的师指战员同志,在那里吃了社员王锡恩同志家的饭,其中也有九连战士的饭菜。这是探望,也不是接见。(二)请转告在天津参加活动的新华社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天津日报记者,请他们不要帮倒忙。一般不要用《内参清样》报道我的活动情况;如果要搞点内参报道,也要恰如其分,不要胡乱吹捧,言过其实。最好不搞。解学恭整理于8月29日晚12时许。”

解学恭起草的给华国锋的电话稿,原文是:“江青同志于8月28日到了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看望了小靳庄的贫下中农同志,邢燕子同志所在的大队和侯隽同志所在的大队也派来了贫下中农代表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同时也探望了在小靳庄参加抗震救灾的师九连的指战员;在小靳庄吃了社员王锡恩同志家的饭,其中也有九连战士吃的饭菜。江青同志在9月29日又看望了在批林批孔推动下已经全面恢复了生产的天津手表厂、第一炼钢厂的工人同志。我建议江青同志接见一下在天津参加抗震救灾的66军、67军、天津警备区各一个连队和部分先进代表。江青同志告诉我,不是接见,是探望,不要把两个问题混淆了。中央决定接见抗震先进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这是接见。根据江青同志的意见,在29日晚纠正了我的建议和安排,决定只探望三个军的三个连队,都是参加抗震救灾的。我认为江青同志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我的安排已经纠正了,特向你报告。解学恭8月30日上午。”

从这桩小事可以看出,在1976年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江青也是心中没底,怕被人抓到辫子,所以在“接见”和“探望”的区别上大做文章。这样一来倒霉的是解学恭。解学恭作为“下级”,既要绝对按中央领导人的旨意办事,出现了问题又要主动承担责任,委曲求全。解学恭更不会料到,在他连夜苦心为江青起草“记录稿”、“电话稿”之后,仅仅时过36天,10月6日,政局激变,江青作为“四人帮”的一员被逮捕。

江青三次访问小靳庄,使这个北方默默无闻的小村,遽然闻名全国,成了“无产阶级占领意识形态领域”的“样板”。根据江青的指示,解学恭随即带领有关部门的人员以及宝坻县委负责人于7月2日到小靳庄蹲点,住了8天,然后给江青、纪登奎写信汇报,共讲了办政治夜校出现的

八件“新人新事”，并说“准备建议市委在全市推广小靳庄的经验”。江青于7月13日批示“小靳庄办政治夜校的经验值得推广”。纪登奎批示“可由新华社派人认真总结经验，以便向全国宣传推广。”新华社记者很快写出报道稿，对原汇报的八件“新人新事”有所增删，经总社审改，报姚文元批准，于8月4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同时播发和刊发了《小靳庄的十件新事》一文。这“十件新事”是：办政治夜校；培养贫下中农理论队伍；贫下中农登台讲历史；大唱革命样板戏；成立业余宣传队；开展群众性的诗歌创作活动；开办图书室；讲革命故事；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发展；移风易俗。一时间，全国各个报刊转载，立即掀起了学习小靳庄的浪潮。

接待江青来津，解学恭诚惶诚恐，全身心地投入，对于江青交办的事项，一一认真照办。当时派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和机关事务管理局一位负责招待工作的副局长昼夜在一招负责接待，江青来前是绝密的。那位副主任告诉我一号任务来了，我明白江青来了。第一次江青来开大会前，我在后台服务，解亲自来后台察看，连后台的

卫生间都进去看看。当时我昼夜在机关值班，接受江青批示翻印的文件。

江青在1974年6月17日至7月1日第一次来津期间，亲手批示让市委翻印了大量批林批孔的文章、资料。据统计，共有43种，翻印了78万份。所有资料基本上都由我经手。一般情况是，江青的秘书刘某将要翻印的资料送解学恭，解再让秘书或司机直接送我。有的是口头转告我，有的是解学恭亲笔批给我，但都不是在原件上批示，而是另写一短信，因为所有江青批过的资料，最后都要写上“退江青”字样，返回到江青那里。江青也是仿照毛主席使用铅笔，用较大的字在原件上书写。她的字写得不错，稍有一点仿毛体。当时我和办公厅秘书处以及机关印刷厂昼夜值班，文件随来随印，不得延误。秘书处一位副处长赵庆，抠文字和校对特别细致，最后由我看清样印发。我们翻印了这么多文件，最后竟无一个错别字，以致江青走后，解学恭到办公厅鼓励我说：“你们任务完成得好”，当时真有点“受宠若惊”之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 : 010-84608877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6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7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 / 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0040048号

读曾希圣给中央的检查

○ 尹曙生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有七千多人参加,故又称“七千人大会”。当时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于2月3日在安徽代表团会议上作了第一次检查。与会的安徽代表对他的检查非常不满意,向中央反映,要求继续开会,揭盖子,中央同意了。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安徽代表团被留下,继续开会。2月9日,在刘少奇亲自坐镇安徽代表团的情况下,曾希圣作了第二次检查。曾的检查开头就说:“前一次检查(指2月3日检查——笔者),正如同志们所说没有放下架子,就是说没有拉下面子、脱掉裤子,主要是自己思想中的肮脏的东西没有勇气拿到太阳下面给大家看。这两天经过少奇同志的启示,经过柯老(柯庆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笔者)的谈话,经过许多同志的帮助,经过自己激烈的思想斗争,经过对一些事情的回忆(有的可能记不清),我决心和党一条心,和少奇同志合作,和中央部门、华东局负责同志合作,撕下面子,放下架子,再做一次检查,把肮脏的东西讲出来,也可以说是对过去的曾希圣的揭发批判,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

曾希圣第二次检查一万多字,内容是围绕安徽在大跃进时期主要是1960年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方方面面展开的。曾希圣在检查中说:“七月石关会议(指1961年7月在岳西县石关召开的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各地汇报1960年的死人数字(他不说不正常死人,而是笼统地说死人,死人有正常和非正常之分,石关会议各地汇报的是非正常死人数字——笔者)是二百二十一万八千二百八十人”,“当时我和桂林栖、郑锐、邢浩(分别是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秘书长、公安厅厅长——笔者)四人研究,他们说不要再核对,就这样上报吧。但是我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提了一些疑问……结果把原汇报的数字缩小为一百一十七万多人,扣除

重报数字九万三千一百六十八人,扣除了五九年死亡的四十八万六千六百九十人,这在报告附件中都说明了。这个数字决定由公安厅上报,并作为省委向中央上报的附件……另外,一九五九的死亡数字,没有上报党中央,这也是我的责任。”

对曾希圣检查的这方面情况我要做点说明。1961年2月,公安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公安厅(局)于六月底前,上报1960年人口统计数字。安徽省公安厅要求各地(市)公安处(局)于4月底前上报公安厅,公安厅于5月汇总后,发现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3839779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218280人。公安厅长邢浩将公安厅汇总的全省人口数字情况报告曾希圣,并说准备上报公安部。曾希圣当即指出,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这么多是不可能的,可能是1959年人口基数算大了,死亡人口统计可能有重复,要求公安厅重新统计后再报。公安厅把地、市公安处、局人口统计人员召到合肥,核实人口数据,结果和上报的数据吻合。公安厅长邢浩再次请示曾希圣,是否上报公安部,曾希圣回答说,等省委扩大会议开过后再报。于是省委在石关召开扩大会议的第一天,曾希圣就要求参加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汇报1960年人口数字,书记们赶紧打电话给自己管辖的公安部门,索要人口数据,很快就报来了,经过会议秘书组的统计,书记们汇报的数据和公安厅一致,因为他们汇报的数据都是根据公安部门来的,不会有大的出入。这时已经是7月,过了公安部要求上报人口数据的限期。由于公安部催得紧,公安厅只好先派户籍科长将人口统计数据送到北京。正在这时,曾希圣明确表示不同意公安厅汇总的数据,邢浩厅长当即指示公安厅治安处,通知户籍科长马上回来,把统计报表都带回来,对公安部说统计数据有重大差错,回去核实后再报。从北京回来的户籍科长和几名统计员,在厅长邢浩带领

下,吃、住在省委,修改统计数字,整整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修改完毕(应该说是造假完毕——笔者)。在修改时,要求不能让人看出破绽,不能产生矛盾,要合乎“科学”,尤其是儿童、妇女死亡数字要尽量压缩,加大老人死亡数等等。最后得出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不是200多万,而是117万多人,经过曾希圣审阅批准,报告公安部。与此同时省委报告中央,把公安厅给公安部的报告作为省委报告中央的附件。七千人大会后,曾希圣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李葆华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62年5月12日,在中共安徽省委全体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为了防止政法机关滥抓滥捕,草菅人命,在会上郑重宣布与政法干部约法八章:一,不准乱逮捕、乱拘留;二,不准乱管制、乱监督劳动;三,不准乱用侦察手段;四,不准乱收容强制劳动;五,不准刑讯逼供;六,不准虐待犯人;七不准扣押申诉;八,不准任意加刑。同时指示公安机关要纠正在户口问题上的弄虚作假,正确反映户口信息。于是,安徽省公安厅于1962年11月22日至29日,专门召开全省户口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市、县公安处、局的治安科长和户口统计员(户口归治安科管——笔者),水上、铁路公安处(局)治安科长和户口干部共98人参加。会议任务就是纠正1958年以来户口统计上存在的问题,真实反映户口、人口变动情况。会后公安厅在给省委和公安部的报告中说:“近两年来,在户口工作中发生了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教训十分深刻,特别是1959年冬和1960年春,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和非正常死亡,公安机关未能通过户口登记管理,全面了解情况,甚至有意篡改人口变动数字,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经过这次会议,把过去弄虚作假的人口统计恢复正常,结果显示:1959年底安徽人口总数为34265037人,1960年底安徽人口总数为30425058人,比1959年净减少3839779人;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仍为2218280人;1961年,安徽人口总数为29876855人,比1959年人口净减少4388182人。这组数据已经作为官方正式数据载入史册。

曾希圣检查重点是安徽省1960年人口大量死亡,他是如何弄虚作假、如何捂盖子、如何向中央封锁消息、如何对1960年中央检查组到安徽



周恩来写信给曾希圣谈安徽大饥荒

调查死人情况进行刁难、告反状,以及他的霸道的工作作风、对错误的认识、改正错误的决心,等等。检查结尾曾希圣说:“现在我深深认识到我的错误异常严重,我的罪过是还不清的,我唯一的决心是虚心倾听大家的意见,永远倾听群众的意见,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戴罪立功。”

50年后,笔者读当年曾希圣的检查,认为他的态度基本上是诚恳的,在很多方面检查也是深刻的。但是因为造成了几百万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当时刘少奇代表中央宣布免除他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是完全应该的,就是宣布将他绳之以法,也并不为过。不要说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就是死亡几十万人、几万人,在和平年代,也是严重的罪过,就是撤职查办、追究刑事责任,有何不可?同是饿死几百万人的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向中央检查就比曾希圣深刻。吴芝圃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处理,我都没有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检讨交上去,毛泽东批示“不要再做检查了”。人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勇于承认,仍不失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值得尊敬的人。尽管曾希圣的检查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是这和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关,不能完全怪罪他。当时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仍然当作旗帜,而安徽乃至全国发生的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都是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发生的。曾希圣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承认自己有罪,表示要戴罪立功,应该值得我们肯定。而这30多年来,有些人却竭力美化曾希圣,把他自己承认的错误甚至犯的罪一笔勾销,把他自己早已唾

弃的痛疽当宝贝来收藏,如果曾希圣地下有知,也会骂这些不肖子孙的。曾希圣犯的那些错误、那些罪行,难道不是和那些曾经一味地给他抬轿子、一味地吹捧他、指鹿为马的人密不可分吗?

笔者认为,曾希圣在第二次检查中最为切中要害的是这样一段话:“一九五九年大概是六月,张恺帆反映无为问题严重,我说你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又是无为人,你可以去处理,不久我到庐山,省委有个同志打电话给我,大意说张在无为解散食堂,当时我怕他搞出乱子,要张回来,并要宋孟邻(时任芜湖市委书记,无为属芜湖管辖——笔者)去调查处理。宋(调查后汇报)说无为有些问题,但不严重,我听信了他报喜不报忧的话,无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实际上那时农村非正常死亡已经发生。如果无为盖子早揭开,从中吸取教训,安徽的问题就不会那样严重”(就不会饿死400多万人——笔者)。这是非常中肯的话。可是历史没有“如果”。张恺帆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领军人物,受他的牵连,仅无为县被批斗处理的干部、群众就有2.8万多人。而无为县最终饿死了20多万人。可是宋孟邻却由此升任省委书记处书记。这教训难道不极为深刻吗?(无为问题详见宋霖同志“张恺帆在1959年”一文,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

但是,对另外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曾希圣并不认识,没有检查,我感到非常可惜。这就是1958年初他把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效春、副检察长李锐,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仁刚等,打成“右派反党集团”。这一案件株连中央管理干部33人,省管干部77人,政法系统被批判处理的干部3000多名,这为政法、公安工作“大跃进”,不断地用镇压反革命的手段,推动大跃进运动的开展,残酷镇压毫无过错的人民群众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也为安徽饿死人火上浇油。笔者在《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对此有详细论述。这里在做些补充。

安徽的反右派斗争,在曾希圣的主导下,共划右派分子31472人,是划右派最多的省份之一,使全省党内、党外精英受到重创。因为曾希圣独出心裁,花样翻新,他将中央划右派的6条标准扩大为12条,增加6条,即:丑化党的领导,

丑化积极分子,挑拨党群关系,挑拨群众关系,反对农业“三改”,反对河网化。这12条标准,可以随意把一个人打成右派分子。安徽的反右派斗争先是从文教界开刀的。首先是中共安徽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兼主席戴岳为首的16人被打成“文联右派反党集团”,占该单位编制43人的37%;接着,安徽文联党组成员、《江淮文学》副主编王影和文联党组成员、《江淮文学》副主编石青为首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省文化局以陈仲、张熙才、余建民为主要成员被打成反党集团。紧接着反右派斗争在教育、卫生、科技部门展开,所划右派越来越多,斗争越来越残酷。仅省立医院和安徽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以上高级职称被打成右派的就有58人,占高级职称人员的39.5%。在3万多右派中,有25137人是文、教、卫和科研单位的知识精英、科研骨干。近年来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曾希圣如何爱惜人才、求贤若渴,读了之后,让人喷饭。

就在反右派斗争如火如荼之际,1957年11月21日至24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一届四次全委会议,12月15日省委召开一届六次扩大会议,专门对李世农、杨效春、李锐等人开展批判,以解决省委内部的“右倾”问题。12月25日,省委报经中央同意,决定延长会议时间,并将会议扩大到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共1500多人参加,还有1800多人列席会议,共有261人大发言或书面发言,口诛笔伐,揭发、批判李世农等人的所谓右派反党罪行。会议通过《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春、李锐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并定性为“右派反党集团”。1958年3月10日,省委向全省发布公告称:“这是安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次巨大胜利,是安徽反右派斗争的最重大成果”。同一天,《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社论是根据省委的报告和曾希圣在批判李世农等人大会上指控的“罪行”基础上写出的,社论“祝贺安徽省委这次会议的成功,祝贺他们在这一巨大胜利基础上乘胜前进。”

李世农等人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公安机关对反革命活动的打击,包庇和纵容了大批反革命分子、自首叛变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为他们开脱罪责,为他们免刑减刑,为他

们翻案——他们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社论原文——笔者）。

这样的指控完全是颠倒黑白。从1949年解放到1957年底，安徽在镇反、肃反中不存在包庇和纵容反革命的问题，而是严重扩大化的问题，尤其是从1954年以后，在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把几十万不满意合作化的农民和工商业者打成新生的反革命、坏分子，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让我们从几组打击数据看看安徽是不是包庇、纵容了反革命、坏分子。安徽省在1950年到1953年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一共逮捕了110164人，判处死刑32876人，判处徒刑的49332人，判处管制8839人，狱中死亡1410人（多数被刑讯逼供致死——笔者），释放9259人（有一般历史问题，根本就不应该逮捕——笔者），逃跑64人，自杀26人，其余转外地处理。为配合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在中央统一部署下，1955年开展了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共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3562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570人。这次镇反中被逮捕的大多数是对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不满的农民和工商业者，被称为“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另外，安徽在土改过程中，共打击地主、恶霸63610人，其中逮捕判刑27551人，其中7685名被判处死刑，判处管制的7334人，其余斗争后戴帽就地监督改造。在剿匪斗争中共打击51061人，其中击毙2069人，击伤1380人，俘虏30736人，投诚16871人。从1955年开始的内部肃反中，查出反革命和坏分子14635人，判处死刑的72人，判处徒刑的5855人，判管制、劳教、下放农村监督改造1370人，送外地处理的175人，自杀193人。

从1950年到1957年底前在这些大的政治运动中，安徽共打击处理了275090人，其中有5万多人被处以极刑。一个新生的革命政权，在战乱之后，应该采取宽容的政策，休养生息，可安徽打杀了这么多人，还说包庇纵容反革命，难道要把那些有些历史问题的人、对新政权不满发发牢骚的人都要赶尽杀绝不成？其实早在第一次镇反中，就有严重扩大化现象。比如在镇反过程中，阜阳专区向省委报告说：自“双十指示”（指1950年10月10日中央下达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

笔者）下达至1951年4月，在逮捕的人犯中，可捕可不捕的占捕人总数35%；砀山县将一般不法地主、地痞流氓乃至所谓“破鞋”（有男女关系——笔者）也逮捕起来。安庆专区报告说：桐城县将16名拟处死刑的人犯报地委审批，地委批示说，“仅看现有材料，不能判死刑，必须继续补查再报”。而公安局接到地委批复，未看批复内容，以为地委同意，当即将16人押赴刑场枪决。事后检查这16人有12人连逮捕条件都不够。霍山县不经地委批准，擅自枪毙只有反革命身份而无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犯9人。皖南地区对可捕可不捕的人基本上都捕了。1956年，在内部肃反中，有1700多人未经检察院批准公安机关擅自逮捕的。为此省检察院向公安厅提出，今后捕人应先办批捕手续，后捕人。这就成了李世农、杨效春、李锐“右派反党集团”包庇、纵容反革命罪状之一。从1955年秋天开始，为了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开展，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下，开展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社会镇反，安徽省制定的镇反捕人数字是1955年2.5万人，1956年4万人，1957年3万左右。由于时间紧迫，1955年捕人指标难以完成。所以省公安厅10月28日发出《关于统一集中搜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的具体实施意见》，要求采取集中统一行动在10月底采取“摸一批捉一批”的办法，逮捕人数不得低于5000名。11月份，实行全党动手，全面动员，统一行动，集中搜捕，拟逮捕1万名左右。结果全年逮捕27611名反革命，超额完成任务。其中有1419人没有任何反革命罪行，有的只是家庭成分不好，有的对合作化有意见，说过牢骚话而被逮捕，且没有任何批准手续。检察机关提出补办手续，公安机关不得已将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释放，为此曾经遭到李世农的批评。这就成了李世农“右派反党集团”的又一罪状。由于合作化运动使农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加上基层干部的恶劣作风，激起群众强烈不满，整个农村动荡起来，哄抢国家和集体财产、打砸区、乡政府、杀害基层干部事件不断发生，其中大规模哄抢国家、集体粮食事件，每年就发生几百起、上千起，可以用此起彼伏来形容。当政者不检讨自己的方针、路线是否有问题，而是采用镇压反革命的办法来解决。1957年8月底9月初，公安部在北京召开全

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会议要求“进一步再给残余反革命势力一次有力打击”，坚决地“逮捕一批，管制一批，劳教一批，批斗戴帽子一批”。于是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第三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又开始了。鉴于安徽农民不满意农业合作化而不断闹事的现实，省委指示公安机关，安徽镇反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结合省委在农村进行全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镇反。于是，省公安厅部署，从1957年10月到12月，在8277个农业生产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挖新、老反革命。于是在两个多月时间，就在农村逮捕了12274名反革命、坏分子，管制1074名，劳教855名，戴反、坏分子帽子1565名，斗争6518名，关押审查2338名，在辩论中被迫自杀845名。在这些受打击的人中，绝大多数是不满意农业合作化的农民。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安徽对反革命不是包庇从容，而是打过了头，把那些不是反革命的普通人民群众当作反革命、坏分子打击了，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1979年至1981年，仅安徽公安机关就平反了这方面冤假错案31万起，包括7万多所谓农民中的坏分子。可是其中大多数人早已命送黄泉，平反对他们已经毫无意义。

曾希圣反了所谓政法机关的右倾，为大跃进时期无法无天扫清了道路。逮捕人已经不需要检察院批准，判刑是根据公安机关预审后提出的判刑意见法院照办；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认为某人有问题需要抓起来，公安机关就抓；各级领导人对谁不满，打个电话、写个条子，就可以把人抓起来。反了检察院、司法部门的右倾后，公安独掌政法大权，检察、法院成了陪衬，有的地方干脆取消检察院、法院，成立政法部，由公安统领，实行所谓“一长（公安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一员（公安局侦查员、预审员）代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所谓分家，就是法院、检察院领导带上公章到公安局办公，任务是对公安机关已经关押并决定刑期的人盖上公章而已。公安机关不仅凌驾于检察院、法院之上，甚至凌驾于同级党委之上。曾希圣在第二次检查中说：“在某些问题上，（我）确有把党委第一书记和公安部门置于党委之上的错误。对于报告的死人数字，要公安部门负责审查，确实是我

提出的，而且审查后没有提到常委讨论，这是我把它置于党委之上的明显例子”。当然这不是安徽一省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大跃进时期实际上被取消，这两家只派领导到公安部联合办公，被谢富治戏称为公安机关手伸的太长，包办了法院、检察院的职能。

毛泽东在解放初期提出的公安机关要置于党委绝对领导之下，也就是要置于党委一把手绝对领导之下，并身体力行，公安部的重大决策部署无一不经过毛泽东的亲自批示，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杀、关、管、斗的具体数字，毛都有批示。安徽在批判了李世农右派反党集团后，安徽政法部门人人自危，谁都怕被扣上右倾的帽子，根据党委第一书记的指示，为推行大跃进运动的开展，镇压人民群众到了疯狂地步。1958年到1960年全省仅公安机关就逮捕了17万多人，集训、劳教了20多万人，给38万多人戴上四类分子帽子。至于县办、社办、大队办、机关办的劳改队、集训队处罚的人数无法统计，全省有43个县办过劳改队。定远县23个公社就有13个公社设立了劳改队，先后劳改了2160人，县劳改队劳改了4023人，死在劳改队的就有1280人。安徽非正常死亡的400多万人中，就包括被专政机关和县、社、队关死、逼死、打死、饿死在劳改队、看守所、劳教所、拘留所、集训队的人。据不完全统计，仅死在劳改农场和看守所的就有6万多人；1960安徽省就有13个县公安局看守所死亡未决犯罪嫌疑人数超过400人；三年中安徽农村被打死、饿死的四类分子有40多万，这些人中有很多人原来都不是四类分子，而是普通农民，因为反对大跃进、反对刮共产风、反对吃食堂等等被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坏分子帽子。假如没有把李世农等人打成右派反党集团，假如政法机关能够按照1954年宪法规定的互相监督制约，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就不会那样无法无天，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死于非命。

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走不掉，逃不掉，到处都有检查站，到处都有收容所，往外逃被抓回来生命难保；逃到大别山和皖南山区，也会被不断的搜山队抓回来（详情见《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一文）。写人民来信向中央反映，也是万万不能做的，被发现吃不了兜着走。安徽按省委的部署，在合肥、芜湖、马鞍山、蚌埠、阜阳、安庆设立了6个检拆站，查扣人民来信；各个县公安局

要求邮电局,把凡是寄往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和领导人的信,一律扣押交公安局检拆,凡是反映安徽省问题的信不仅扣住不发,还要给寄信人戴上反革命、坏分子帽子,所以有人把信写好后,拿到外省去发。曾希圣在检查中说:“扣押人民来信是在我的思想指导下发生的……我说过人民来信有很多是虚假的造谣破坏的,是人家向我们进攻,是个斗争”,“有的共产党员,对坏的东西也相信,过去搞人民来信的人,成了右派,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话,所以跟着右派跑了”,“工作落后的地方来信多,工作好的地方来信少,因此造成下面发生严重扣押人民来信”。

扣押人民来信不仅下面严重,上面更严重。安徽省公安厅动用侦查手段,直接查扣人民来信。1957年11月23日,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效春被批斗期间,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公安部长罗瑞卿,一封寄给他在新四军时期的战友毛英奇,他派外甥到南京和徐州两地去发。公安厅对杨效春已经实施技术侦察手段,掌握了他的一举一动,立即派3个干部跟踪盯梢他外甥到南京,以特务嫌疑进行搜查,连人带信押回合肥。公安厅长向曾希圣汇报,他没有批评这种犯罪行为,只表示人可以放,但信扣下(曾在检查中说他指示公安厅让他把信寄出去,当场遭到反驳——笔者)。1960年9月13日中央办公厅转来一封匿名寄给彭真的信,反映省委不顾人民死活,在稻香楼和董铺岛上大造宾馆,而合肥街头乞丐、抢饭吃的人很多。曾希圣批示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光宇查办。王将信交给公安厅。公安厅把它作为重大反革命案件侦办,将信拍成照片,在合肥的省、市、区级机关,人人对笔迹,人人过关,三个多月,闹得满城风雨、鸡犬不宁、人心惶惶。人民群众在这种高压态势下,只能任人宰割,稍有反抗,后果不堪设想。

在大跃进时期,为什么反革命案件占了整个案件80%?逮捕的人犯中,反革命犯占同样比例?因为人民群众冤屈无处诉,苦难无处申,胆子大的铤而走险,组织反革命集团,拼死反抗;胆子小的,写人民来信,写标语、传单,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些统统都被当作反革命案件来处理。1959年合肥街头贴出标语:“打倒曾胖子,杀死余妖精”(曾胖子指曾希圣,余妖精指曾妻)。曾希圣指示公安厅限期破案。公安厅作为重大反革命案件,厅长亲自挂帅,组织50多人的精干队

伍,侦破此案。强迫机关干部人人写字,核对笔迹,就连省委各部长也得照办。排查的对象达到1.8万人,笔迹鉴定3000人,非法搜查4000人,受审查的干部中有厅级干部6人,停职反省的3人,拘捕2人,逼死2个嫌疑人。有些领导则利用这个机会,打击报复下级,写条子给公安厅,说某某可能是反革命标语书写者,开出名单,公安厅就去捉人,因为破不了案,没法向曾希圣交代,只好先入为主,把人抓起来再说。折腾了几个月,案子也破不了。公安厅长和办案人员被曾希圣严厉训斥。公安机关变成了曾希圣的私家侦探社和卫队。这就是法制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公安机关要绝对服从党委领导的最好注释。

走笔至此,豁然想到哪位伟人说过的一句话: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是啊!时隔半个多世纪,重庆王立军、薄谷开来案,重现了大跃进年代党委一把手把公安机关当作自家卫队的情景。实在令人悲哀!但是也不感到意外。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中,经常见到这样的话:公安机关要独立行使侦查权;检察机关要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要独立行使审判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行动。这些正确的说法、提法,现在在报章上和领导人的讲话中,见不到了,见到的是“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三个至上发生矛盾怎么办?谁至上?现在听不到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声音,甚至法院自己都忌讳讲这样的话,要法官们做党的驯服工具,也就是做党委第一书记的驯服工具,在这种政治氛围下,重庆公安局变成市委书记薄熙来和他老婆的卫队也就不奇怪了。

宪法和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反映了党的根本意志,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政法机关办案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提出来,并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否则全国人大不需要制定这些法律,回到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无法无天得了!现在有人公开指责司法独立是西方国家西化、分化中国的阴谋,真是岂有此理! ■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我反对神化和特权的代价

○ 戴 煌

(一)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大约半年,越南人民军围歼法国殖民军的一支特大部队的“奠边府围歼战”已经开始,新华社社准备派我前往越南。1954年春节后,我来到奠边府前线。同年5月初,越南人民军全歼了约两万人的法国殖民军后,根据日内瓦和平条约,越南与法国殖民军的领导机关开始停战谈判,我也跟进采访。

在越法停战前后,特别在越南党和政府回归阔别8年的河内前后,我与胡志明主席有过多接触。1955年1月24日,是春节的第一天。记得除夕傍晚,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越南主席府打来电话,说是初一大清早,胡主席要去河内以北一些省份的建筑工地、农村和兵营,向工农兵拜年,胡主席问我能不能一起去——并说在河内的中国外国记者中,胡主席只请我一人同行。我立即回答:“我非常高兴去!”

第二天凌晨四点,河内市民还在甜睡中,胡主席和我们同行的几部小吉普,就沿着红河大铁桥,在四野昏暗的公路上向北进发。这天要去的第一站,是河内以北约70公里的托况水闸。这是红河三角洲以北太原省山区的著名水闸之一。我们到达托况水闸时,天色才透亮。高大却断裂的闸身,还在令人心痛地伫立着。但在它前面,已筑好一道大土堤,蓄起了一湖山水。这是几千名工人、农民、游击队员和地方部队的官兵,在停战后短短数月内抢修而成的。

胡主席祝贺抢修水闸的工农兵们春节快乐,并热情地讲了好多话,然后又拜访了附近的好多农民,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

时近中午,几部吉普车调转头,似欲返回河内。胡主席的车却突然带头拐进了路旁一座

残缺不全、稀稀拉拉的松树林。他下了车,向后面的几部吉普车招招手大声说:“吃饭,休息一会儿”,并邀请随行的公共工程部长、党外民主人士陈登科和我以及跟随我的越语翻译阮大,与他共进野餐。

在我们围着草席就地坐定之后,警卫员们从他们的吉普车内拿来了已切好的一只油炸鸽子、几小片咸鱼、一小碟肉饼、几棵生菜和几块豆腐,还有米饭和已切成片的粽子,一只看来还是二战结束时缴自日本鬼子的腰形军用饭盒装着的菜汤和一瓶来自中国东北的通化葡萄酒。这些就是这位一国之首在取得来之不易的伟大抗法战争胜利后第一个民间大节用以待客的午餐,而他却取笑说:“这比唐伯虎追舟的那顿饭强多了!他那次只是让艄公空口报菜名,他自己只能瞪大了眼睛咽干饭。而我们呢,有酒有菜还有汤。”

他过去搞地下工作时,在内地和香港度过好多年,学会了中国话,后来还学会了法语、英语和俄语。他说中国话就像广东人说北方话,《同志加兄弟》这首诗就是用汉字写出来的……大家一阵笑声过后,他首先举杯祝我们春节快乐,我们都祝他健康长寿。在和大家一起抿了一口酒之后,他把“健康长寿”这四个字重复了一遍对我说,“健康长寿”这种说法还比较实事求是,我领情了;但对那种动不动就喊某个领导人“万岁”什么的,他不同意。他说:“那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是绝对不可能的。就拿你们的彭祖来说,也不过只活了‘八百’岁,何况那还是古代传说,哪还有比他活得更长的,是不是?”

我说“是。不过大家常常爱喊‘万岁’什么的,也只是表达对一个人的敬慕之情而已。”他说:“不,那也要实事求是,不能狂热冲动。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不能像封建帝王那样要大家喊‘万岁’,对不对?”

我点头称是。接着他又向我提出了一个我压根儿也想不到的问题。他说：“这几年，几乎凡是去过你们国家的越南同志回国后都说，你们招待外宾的酒菜极为丰盛，都是些海参、鱼翅、对虾、鲍鱼这样值大价钱的。可是尽管宾主早就吃到齐脖子了，厨房里还是照着菜单子大盘大碗地往上端，许多菜几乎又被原封不动地撤了下去，不是很浪费吗？”

我一时语塞。当时我还不知道这算不算浪费。现在面对胡老人家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礼仪之邦，宾至如归嘛！”

他捋捋他那把灰白色的胡须，又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说：“唔——不能这么说。这都是国家的钱呵，也就是人民的钱啊！如果完全由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

这，又给我开了窍：我们的那种“礼仪之邦”云云，只不过是慷国家和人民之慨、大耍特权的遮羞布罢了！

一小时后，车队拐进了河内东北约50公里的北江省省会府谅商。在那里，他向共同抢修睦南关（后来改称友谊关）到河内的铁路和铁桥的中越两国铁路员工进行了节日的祝贺。他的贺词不足300字，竟获得了16次掌声。离开府谅商时，天色已昏暗，他又亲临某个兵营，对黑压压的一大群官兵讲了一个多小时，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激励他们前进再前进……

我们回到河内时，所有的街道就像我们凌晨出发时那样万籁俱寂。市民们都已沉浸在温甜的梦乡里。胡主席的这趟对工农兵的春节拜访，整整用去了21小时。

这是我在越南的一年中，与胡主席相处时间最长也是谈话最多的一次。尤为重要的是，从他的谈吐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共产主义革命者，他认为绝对不能像封建帝王一样，沉迷于全国人民齐呼“万岁、万万岁”。这对我来说真是醍醐灌顶。

（二）

1949年10月1号，开国大典在天安门举行。我作为新华社一名部队支社的记者，曾在南京一条宽阔马路旁的人行道上，与庆祝游行的庞大队伍一起，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

可到了1950年五一节，口号中“毛主席万岁”在，“朱总司令万岁”却没有了；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出版的《八一》杂志，本来是朱总司令题写的封面也被毛泽东的取而代之了。这使我很纳闷：井冈山上“朱毛会师”的动人故事流传了20多年，怎么突然只有“毛主席”而没有朱老总了？这样只突出“毛主席万岁”正常吗？但是在那个时代，我只能把这个疑团深藏心底。从胡志明主席反对喊“万岁”我想到中国，那个安然自得地接受“万岁”的人，是不是有帝王思想？这和他多年宣扬的“为人民服务”不是背道而驰吗？

胡志明的另一个故事为我的思想提供了佐证——

1954年10月，越南人民军和越南政府回到河内后不久，胡主席在河内原法国“总督府”改称的越南主席府内，宴请中国顾问团、中国军事顾问团和新华社河内分社的所有同志。宴会后，受邀的所有同志在大客厅外的一排排靠背长椅上坐等刚从中国学艺归来的越南歌舞团演出。歌舞团的演员正在紧张地化妆，离开幕还有段时间。胡主席显然想让气氛活跃一些，请中国的同志们先唱唱歌。于是，他站在垂着幕布的舞台前，双手套在嘴上形成个“喇叭”，从这个台角跑到那个台角，连声呼唤“AnhDai, AnhDai”。这句越南话音译是“阿因大，阿因大”，意思是“大兄，大兄”，是在称呼阮大。这种语法早在中国古时就流行，像三国时代有人称诸葛亮为“亮兄、亮兄”一样。让我惊讶的是，越南人竟一直沿用着这种古汉语语法的称谓。他们只有对德高望重的人——如胡志明，才会称呼“胡伯伯”。胡主席此时呼唤的，正是我身边当越语翻译的、在云南边境河口长大的越侨青年阮大，请他上台指挥中国同志唱歌。这时阮大才19岁。一位64岁的国家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竟对个毛头小伙子唤着“阮大兄、阮大兄”，这样的事情中国有过吗？

亲眼看到胡志明主席的这些行为，我就联想到毛泽东的作为。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进一步地加深了我对毛泽东的认识。一次，我们在参加传达“秘密报告”的内部会议后接到通知，要大家马上去中南海与毛主席照相。由于之前对毛泽东心存芥蒂，以至于我在中南海接见广场的那一

层层台阶上,尽量向高处多走了几步,离第一排正中的毛泽东越远越好,生怕沾染了帝王气。

(三)

1956年6月,苏联第一次派出友好舰队访华,停泊地在上海。新华社派我和我的好友李耐因前往,配合上海分社完成这一报道任务。

6月25日晚,苏联舰队返航海参崴。舰队走后,接待委员会和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当时的中苏友好大厅联欢,北京去的记者们也应邀参加。看电影时,记者在剧场第一排选下了自己的座位,后面的第二、三排是海军的将军和军官们。

他们刚坐定不久,来了一个斜披着上衣的二流子式的干部,竟喝令记者们和后两排的将军与军官们立即离座,说这三排是专给首长们留下的。《解放军报》的一位少校记者对他说:“这是联欢会,大家是平等的,还分什么‘首长’不‘首长’的!”

谁知这二流子式的干部立即露出一脸凶相,扯着这位少校记者的上衣,喝令他站起来。而这位少校记者是经历枪林弹雨的老八路,哪吃这一套?他猛摔胳膊怒吼一声:“你算个什么东西!王八蛋!”这惊动了整个剧场,把这个二流子式的人呵斥得张口结舌,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下泱泱而去。这时,少校记者转身问背后华东海军的一位将军:“这个人是不是你们华东海军的?”这位将军不屑地回答:“是华东局的,是柯老他们那里的。”——这位“柯老”,就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

快放电影时,一旁的太平门外传来了男女老幼混杂的欢笑声。那个二流子式的干部慌忙迎上前去。结果并没有什么“首长”,而是几十位浓妆艳抹的妇女带着一大帮孩子,他们的身后跟着一大群护士和服务人员。跟在这个“首长大队”后面的,只有一个派头十足、大腹便便的人,看上去他倒可能是个货真价实的“首长”。这个翘着下巴颏的人问那个二流子:“为什么没搞到好的座位,嗯?”见他嘟嘟囔囔地说不清,“首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饭桶!”

目睹这场活报剧,记者们和海军将军、军官们都忍俊不禁。

(四)

在招待苏联舰队的那几天中,宴会是很多的。中苏友好大厅的最后一次盛宴,是在苏联舰队离开上海两天后举行的,赴宴的当然都是我们中国人。举行这次盛宴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大家在接待苏联舰队的工作中都辛苦了,恰好接待经费又有富余,“首长”指示就用这笔钱犒劳大家一番,以示关怀。

这就是说,预算的经费没用完,用不着再缴回国库,倒可以拿出来大吃大喝。我因为住院开刀,没有参加这在接待苏联舰队名义下的“最后的晚餐”,但同样为了观察生活或不得不去的同志们事后告诉我,这“最后的晚餐”气氛之欢腾和菜肴之丰盛,也完全可以载入“史册”:海参、鲍鱼、对虾、干贝、猴头、鲥鱼、熊掌、卤鸽、珍珠鸡……一盘盘、一碗碗,目不暇接,最后还端上了一大盘、一大盘油光光酱红色的玩意儿,惊得许多食客兴奋得睁大了眼睛大声欢呼——“烤乳猪、烤乳猪”……

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山里跳的,水里游的,几乎都“兼”遍了!这“共产主义”有多棒!我想起了胡志明主席给我说的那句话——“如果让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而我们这“最后的晚餐”可好,外国的贵宾一个也没有,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对中国人,几乎又全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五)

1956年7月下旬,酷暑难当。我出了医院要回北京时,顺便拐到苏北老家去一趟。

这个苏北老家,就是盐城地区阜宁县城南30里的沟墩镇。1947年春夏在这里打过一仗。1948年春节刚过,我随军渡运河去开辟江淮地区,暂时离开行军大队回家拜望老母,老母叫嫂子给我下元宵我都来不及吃一口,又急忙去追赶急行军的大队。后来横渡长江,建国后又去了朝鲜和越南……转眼离开老家已八九年了,很想看看我的老母、兄嫂和一大帮侄儿侄女。我满以为等候游子归来的故土,必定呈现出一派新中国的

新气象。但是,对童年时代十分熟悉的大街小巷匆匆浏览一遍,我的心顿时就凉了!房屋零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1947年5月的碉堡和残锈的铁丝网原封不动地摆在河边和桥头。与1948年春节过后我匆匆赶往行军大队时所见的景象,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再看看沟墩镇内外乡亲们所过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颤了!养鸡者吃不上鸡蛋,养猪者吃不上猪肉,种棉花的一年也没有几尺布票,种花生、大豆的每个月也得不到几小两油。还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疾病得不到治疗……

国民党被逐出大陆已七年了,为何我们的老家还是那样破败?我在家刚刚住了下来,就有人来向我喊冤告状。我再深入一了解,家乡旧貌难改的症结所在,就是当地的一些干部不争气。

其中尤为不争气的一个,竟是我小时候的一位同学。1943年秋天,日寇第二次占驻沟墩时,我的这位同学跟日寇当起了火头军;日寇下乡大扫荡,他都跟着“小扫荡”;日寇投降,他潜逃数月,才惶然而归。由于他擅长溜须拍马,竟当上了我们的村干部,又混进了共产党。从此,他在日寇侵占沟墩时的种种胡作非为,立即公开而“合法”地死灰复燃,被人们称作“共产党中的‘二皇军’”。

土改,他中饱胜利果实;镇压反革命,他与反革命分子合伙做买卖;大军南下渡江修桥铺路,他偷拿修大桥的木料;统购统销,他利用公款和自开的粮行抢购大批粮食,来春高价出售;业余剧团的经费、抗美援朝老百姓捐献飞机大炮的钱,只要经他手,他都要雁过拔毛;尽管他早已成家,并有了一大帮孩子,但他那寻花问柳的“雅兴”仍不减当年,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许多妇女工作人员,都在他的“寻问”之列……

这种坏干部各地都有,绝非个别现象,他们相互依附,盘根错节,形成了一张密实的大网。

一天上午,我跑到北边30里外的阜宁县城去,见到了县委书记邢宝成,才把县委工作组请了下来。可是沟墩镇的那个新恶霸对调查结论中的个别事实矢口抵赖,县委会对他的开除党籍处分就拖延不决。这立刻使得沟墩镇的党团员们陷入慌乱之中,担心又一次不了了之,还将受到无情报复。他们中还有人跑到我面前痛哭流涕,准备全家远走高飞,以防后患……

这样,8月16日一早,我就带着镇上的三个党团员代表,到了南面90里外的盐城,向盐城地委负责人作了汇报,就忧心忡忡地离开了盐城。

而这盐城,正是我们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的三个记者,1947年8月随军参加过拼搏的地方。其中年龄最大的胡捷同志,跟随曹荻秋为政委的华东野战军第12纵队所属的谢振华为政委的第35旅突击队,攻打西城墙上的碉堡群,左右臂与胸膛中了一排子弹,壮烈牺牲。我和另一名记者陈清伦,也随着廖成美为旅长的第34旅突击队,对北城墙的防守线进行了拼杀,侥幸生还。现在,这条用无数烈士的汪汪碧血铺就的胜利之路,除台湾一岛之外,早已延伸到了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我们的民主自由的理想呢?已经十分渺茫了!

我产生了不祥的预感:我们的事业即使不会发生夭折,也会即将发生非同寻常的挫折!面对深埋忠骨的土地,我不禁一阵心酸,默默地流着泪。

(六)

1957年5月,“整风”运动开展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反复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很多人都响应号召畅所欲言。可是,6月8日,《人民日报》又突然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就立刻变成了残酷的“反右”斗争。那些响应号召发言的党内外人士或青年学生,一下都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很多人对此都大惑不解,怎么突然自食前言、反目为仇呢?正当这节骨眼儿,一天下午,北京所有高等院校的党支部委员以上的同志,都奉命来到广安门内白纸坊人民印刷厂(实是造币厂)礼堂去,听取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作报告。由于我当时是中央许多部门派在外交学院学英文的同志所组成的党支部的书记,我也去听了这个报告。

彭真开门见山地说:“‘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样提,这叫做‘内外有别’。”最后彭真还提高了声调说:“即便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甚至都错了,那也不要紧,党绝对不会把这

些同志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中央在这里向同志们作保证……”

这种讲话，又重新点起了我的希望之火。当晚，在党内鸣放座谈会上，我第一个发言，把这几年郁积于胸的种种思考和盘尽托，整个发言的中心就是反对“神化与特权”。这“神化”当然就是鼓动全国人民高呼“万岁”的毛泽东；“特权”也主要是指毛泽东，以及在他的带领下层层级级的“特权”。很快我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最近，我翻看了1957年反右前后新华社机关报《前进》。当年新华社领导层紧跟毛泽东“阳谋”，在反右后不久，就常常出现批判我的头版头条大标题，如《共产党员戴煌集右派言论之大成……他竟诬蔑地说我们国家矛盾的根源是“神化和特权”》，《戴煌的一些反动言论》这样的文字：

戴煌（共产党员）经常地、不分场合地散布对党组织、党中央、毛主席、党的政策、国家制度的反动言论。当党支部书记对他这种反党言行提出批评时，他竟然回答：“我是在唤起群众”……

戴煌不相信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他说，党的八大代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的选举是不民主的。他说，吴冷西同志是天津市的人民代表，天津市的老百姓认识他吗？只是毛主席选他这个官僚主义者当代表。他说：他不盲从，所以在西单区进行选举时，不参加投票。戴煌不止一次地诬蔑党和全国人民的领袖，他不止一次地说“毛主席应该在适当的场合出来检讨”，说毛主席“不虚心”，甚至有时对喊“毛主席万岁”也表示不满。他说：什么鸡毛蒜皮的成绩都算在毛主席的账上，为什么工作上发生错误都推在下面干部身上呢？他又说：毛主席说王明有缺点，但苏共二十次大会揭露了斯大林的问题，是不是毛主席也有问题呢？

戴煌不断宣传所谓党内的“新贵族”。在一次谈及新华书店郊游翻车时，他即借题发挥说：“旧的统治阶级打倒了，新的统治阶级出现了。我看再下去台湾也不用解放，合并算了。”他创造了所谓“北京特权集团”的说法。他说：“有好多过去都想加入共产党，现在他们看到党的黑暗都不愿入党了。对这样的人我很同情。”“过去共产党员确实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在群众中威信很高；而现在则是争权夺利，乌烟瘴气，这样的

党怎不会丧失威信呢？”

戴煌经常把农村歪曲地描写成“一片黑暗”。他说：“在农村中，干部们骑在老百姓的头上，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老百姓现在的生活是吃不上、穿不上，老百姓都说共产党变了。”

在反右派斗争中，戴煌说，储安平的思想有很多好处。他甚至看到储安平“老和尚、小和尚”的恶毒谩骂时称赞“储安平其人文笔幽默”。他还曾表示同意葛佩琦的一些反动言论，跟着大声疾呼：“就是该杀的杀，该惩的惩。”

波匈事件后，戴煌表示：苏联出兵，我们只能从立场上来说；如果从客观、公正以及从道义上和国际法上来说，都讲不过去。他还把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来与苏联帮助匈牙利人民作对比，肯定说苏联是干涉匈牙利内政。等等……

我被打成了“右派”后，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被发配大北大荒“监督劳动”，每月由155.75元工资降为28元生活费，苏北老家先后有三人受到株连死了。因为我一直坚持1957年的观点，1964年4月23日，正是我参加新四军20周年纪念日，我又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两年。新华社的负责人连我的妻子也不放过，给她所在的单位多次送去黑材料，说她“思想反动”，硬要嫁给一个大右派分子，工厂就把怀孕期间的她从会计岗位赶到胎儿容易受到伤害的喷漆车间做工。1964年我被送去劳教的那天下午，她挺着大肚子到劳教所给我送铺盖日用品，回来后的第5天，早产1个多月的女儿降生，不幸罹患血液病。

现在，有些人还认为毛泽东时代是清廉的、公正的。从我亲身经历的情况看，其实那个时候特权横行，腐败丛生，对不同意见的残酷打压，全社会万马齐喑，使人窒息。

今天，经济已经市场化，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基本没有什么改变。特权依旧。处于特权地位的官僚们，享受着改革开放造就的盛宴。今日的社会财富比毛泽东时代多了，特权者的享受和贪婪更是肆无忌惮。权力和资本勾结在一起，毫无节制地掠夺社会财富，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了。55年前我不顾身家性命，高呼反对特权。今天，我更要继续高呼：反对特权！反对特权！■

（作者为新华社原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顾准文集》出版的曲折

○ 卢惠龙

这是1994年，经王元化的推荐，《顾准文集》走进了我所在的贵州人民出版社。此前，文集在上海学林等一些出版社飘移过，未果。

这个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顾准，1949年官至上海市财政局局长，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

顾准却两次划为右派。1980年，恢复名誉，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万里、黄克诚、方毅、谷牧、张劲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

顾准曾经追问过“娜拉走后怎样”，也就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

1957年，他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非常大胆和超前，是我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先驱。

《顾准文集》由其弟陈敏之作序。全书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经济文稿，包括《关于海上的文明》《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辩证法与神学》等。为我们留下了一种卓尔不群、独立思考的精神。

这本文集今后的命运会怎么样，无法断定。但它不会湮没于历史的洪流中。我以为。

这固然不是顾准唯一的著述，他早在1934年就完成过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被大学采用。到上世纪50年代被打为右派前，发表过《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对经济学、会计学、政治学研究颇有建树。

以后，灾难不断，他完全丧失研究、写作的条件，这本文集中以通信形式写的二十来篇笔记，是他在那个“被彻底孤立”的年月里，写给弟弟陈



敏之的书信。他的思想从未停歇，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1975年以后，他是唯一一个在中国代表精神独立的人，唯一一个能与西方学者如葛兰西、卢卡斯、哈耶克和伯林等对话的人，是以一人之力顽强凿通了那条阻隔中、西思想对话的黑暗隧道的人。

《顾准文集》有不能出版的理由吗？经总编辑会论证，报贵州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决定出版。我社政经编辑室的杨建国担当责任编辑，曹琼德封面设计，送湖北襄樊文字603印刷厂印制。354千字，32开，首印8000册。

《顾准文集》一面世，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刮起了“顾准旋风”。

顾准所倡言的重视商品价值规律，他论述的不受制约的权力造成的危害、法治和人治的利弊、人民当家做主反映在政体上的恰当形式、理性主义政治哲学蕴涵的问题等，普遍受到热议。对于深化改革，对于中国的民主法治前景，引起普遍关注。人们展读顾准，不仅对顾准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和罕见的才气由衷折服，也对他长期忍受地狱之火煎熬，却以非凡的胆魄探索未来改革之道的人格魅力，深感崇敬和震撼。

王元化这样评价顾准：“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他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李锐说：“1959年以后，我也在难中，也在思考……但是顾准的思考深得多，广得多，也更有成果。有关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顾准思考围绕的中心是如何克服专制、实现民主和发扬科学精神。”

吴敬琏在《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中说：“学识渊博、言辞犀利只是顾准的外部特征，作为思想家，顾准的内在特征是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言人所未言。这些问题包括：革命的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革命成功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取得真正的进步，等等。”

李慎之引用泰戈尔的诗句形容顾准：“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吧！”并说：“有人说，自进入20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

王蒙说《顾准文集》中有关欧洲史、经济学部分我浅浅地看了一遍，但《顾准文集》里面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我看得实在是入迷。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我以为正是这样一个概括，是顾准最自觉地、而且是最早地论述这一过程。但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活生生的，是充满血泪、疯狂、热情、失望。充满痛苦的一个过程。

陈乐民说“这本文集，看着看着，竟不禁为之击节者再，有感于先得我心者再；读至痛切处甚至禁不住扼腕而叹”。林贤治说“一部《顾准文集》，几乎言必称希腊，其实所言并非希腊，正如言不及中国实所言全在中国，作为个体思想的最沉实也最具挑战性的表达，顾准的著述，乃缘于某种现实使命”。

朱学勤说，“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顾准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顾准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

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他拥有属于自己的研究、运思，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文字，才引起真正而非虚假的共鸣。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

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电话频频，索要者甚众，社里库存很快告罄，只得加印。

正在这时，我们出版社被告知去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参加吹风会，要吹什么风，不知道。我为出版社总编辑去了。

吹风会两天。第一天务虚，出版局局长在座。会议室四周陈列了他们认定的近期有问题的图书。要出版社老总们自己看，问题在哪里？第二天务实。第一个问罪的是黑龙江的社长，这么淫秽的书，你们也敢出？而且是你终审。黑龙江的社长顿时痛哭，说他正在住院，责任编辑把书送到病床边，请他签发。他问“有问题吗”？责编说没问题，难道我会害你吗？他看也没看，就签了。局长说，你们负责终审的人，就这么把人民交给你们的权力当儿戏？不看书稿就敢签字，你知道危害有多大吗？听候处理吧。第二个就是我，局长问：请问贵州的老总，一本学术著作，为什么这么走红、畅销？原因在哪里？这难道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吗？你见过这种现象吗？请回答。我无言为对。局长说，你要想想，是什么人在热捧这本书？为什么热捧这本书？奥妙在哪里？我问，《顾准文集》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在哪里？局长不高兴了，我请你来，是问你问题出在哪里？不是你来问我问题出在哪里？我说，是你认为书有问题才要我来啊！局长更不高兴了：问题在哪里，不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的吗？你揣着明白装糊涂？局面有点僵持。坐在我一旁的一位省的副局长出来打了圆场。说我们回去一定冷静反思，做好善后。

会上，局长实际并没有直接指出《顾准文集》的问题。

散会了，我们走进电梯。我问：局长，你又不作结论，我回去怎么办啊？他说，回去就封存，不要卖了。电梯里说的，可不是会上说的啊。

多么聪明、机智、滴水不漏的领导？

顾准实在太“扎眼”。我想起了柏克对于法国大革命的预言——“任何具有独立性的东西，都不能与这个共和国相容。”有顾准这样的人，值得我为这个也许是上帝选民的苦难民族而流泪。

第二年，即1995年，北京举行顾准80诞辰纪念会，这就是徐雪寒和骆耕漠联合倡议的，我社的责任编辑杨建国应邀参加。这时，已经出版的顾准著作有：《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顾准传》《顾准全传》《顾准笔记》《顾准文稿》《顾准自述》等。顾准的思想得到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对这一轮“顾准热”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没有批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也在进步。

10年后，2005年7月1日，顾准诞辰90周年纪念日，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顾准生前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部分老专家、学者为主体的专家团赶赴河南省息县及东岳镇，在顾准的忌日举行纪念活动。

2007年，中国市场出版社还在出版《顾准文集》。推荐词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权威

主义则必须打倒。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品德，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具备‘直立独行，敢开新路，敢行己志’的现代精神的知识精英，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驱者。”

这是一条不曾中断的流水：2010年，海峡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了《顾准研究书系》，2011年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推出《顾准经济文选》。

顾准1974年去世至今，三十八年过去了，人类社会总是在按照自己的逻辑缓慢地往前发展，但也总是一步一步地在进步。

跨入21世纪以后，中国知识界、思想界，仍在孜孜不倦地解读顾准。人们再次惊讶地发现，顾准数十年前的研究课题，早已准确触及中国历史变化的核心奥秘。而顾准当年凭借宏大知识背景所进行的真理求证，恰恰是当下中国改革家关注的系列焦点。顾准其实初建了一座属于21世纪中国的理论灯塔。顾准的传世著作，可以说是中国改革永不熄灭的航灯。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闯将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作者为贵州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冯雪峰两首遗诗

○ 季 音

近日，在整理旧书稿中，偶尔翻出了冯雪峰在1963年蒙难的日子里写的两首旧体感怀诗。这是作者在1957年那场政治灾难里，被逐出终生为之奋斗的革命文艺队伍之后，在内心极度痛苦中写出的。

这两首旧体诗过去没有发表过，也不可能公开发表，它只在少数知心朋友间传读。我是在一个与冯雪峰同在上饶集中营里共过患难的战友那里读到的，并抄录了下来。虽然时光已逝去半个世纪，今日重读，依然让人久久不能平静。

两首诗都写于1963年，一首是8月30日，题为《塞童》：

天赐塞翁千里驹 / 塞童驰骋乐如痴 / 只因不学疏御术 / 立即颠身变缺肢 / 从此永除壮士籍 / 徒然怅望将军旗 / 男儿不得沙场死 / 祸福玄谈只自欺

另一首诗写于9月18日，题为《未深思》：

嫦娥性急未深思 / 咽下仙丹即起飞 / 只道月宫绝浊俗 / 不知上界仍清凄 / 对空曼舞难寻伴 / 遣夜幽谈又与谁 / 最是还乡也不得 / 上天无术下无梯

冯雪峰是我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人们大多知道他在文学理论方面的卓越成就，却鲜知他也是

个优秀诗人。他1922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湖畔》，从此被人称为“湖畔诗人”，他写出的许多真挚感人的抒情诗，曾为人们传诵。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不幸被捕，囚入国民党特务设立的上饶集中营。他在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里，抱病写出了《灵山歌》等几十首壮怀激烈的诗，号召难友们与万恶的国民党特务作斗争。

在冯雪峰的诗作里，像1963年写的这两首情绪如此低沉的诗，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两首他一生最后留下的遗诗里，我们看不到《湖畔》那种清新柔美的抒情，也听不到《灵山歌》里那种豪情激越的呼号，听到的是诗人痛苦的独白与深沉的叹息。尽管诗用了隐晦的语言，但了解内情的人读了就会明白。

冯雪峰在1927年6月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时候参加了共产党，经历了长征，在国民党监狱里他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30年代他与鲁迅先生共同战斗的业绩，是中国文学史上璀璨的一页。不料，1957年祸从天降，“从此永除壮士籍，徒然怅坐将军旗”。以后，他曾经多次呼吁，希望重返“壮士”队伍，继续从事他的文学事业，始终未果。1976年1月23日，他抱憾离开了人世。1979年11月，冯雪峰的冤案得到昭雪。1986年7月，由胡耀邦题写书名的《回忆雪峰》纪念文集出版。但书中没有收入冯雪峰倾诉他晚年心迹的这两首遗诗。

最近，听说冯雪峰的亲属正在筹划出版《冯雪峰全集》。这两首研究这位文学大师的重要作品，肯定会收进集子吧。■

1950, 晏阳初在去留之间

○ 宋恩荣 张睦楚

晏阳初(1890—1990), 20世纪中国教育家中最具国际影响的世界性人物。70年中, 在中国与世界发展中国家从事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 赢得国际上极高的荣誉。1943年, 与爱因斯坦等人一起被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然而在国内, 近60多年来他的名字却鲜为人知。

1950年前后, 不但是他一生最为关键的时刻, 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折最为重要的节点。此时, 中美关系的走向与晏阳初以及许多文化人的去留, 有着密切的关联。

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因受民主党传统左翼思潮的影响, 对中共曾抱有某种幻想。从毛泽东和中共方面历年的言论中判断, 认为中共政权虽具有民族主义性质, 但还可以容纳资本主义思想, 期待其一旦执掌政权即可建立南斯拉夫式的不受苏联控制的社会主义政府。以为这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1949年4月, 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 一举攻陷国民政府首都南京, 中共的全面胜利已成定局。美国政府当时对时局的态度, 人们可以从后来(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看到。美国早就有意抛弃国民党。《白皮书》认为“中华民国在国共内战的失败, 是国民政府本身的领导问题, 与美国无关, 美国在战后中国情势已尽力而为, 最后的失败应由国民党负起全责”。美国政府早已决定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对国共内战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政策。一大批具有自由民主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 也早已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 失去信心。美国的态度, 对他们在重大历史关头投向中共留在大陆无疑起到了



晏阳初

鼓舞作用。

一、卢、晏互商, 试探新政

1949年10月20日, 晏阳初从重庆飞抵台北, 参加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会议。一周后取道香港转赴美国, 准备就拟议中的国际平民教育运动事宜与有关方面协商。国民党军队败局已经无可挽回, 共产党在大陆的全面胜利也指日可待。但许多身居海外的著名文化人士仍对国内的形势和自己的去留有种种疑虑。

此时, 身在香港的卢作孚(1893—1952, 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正在美国的晏阳初两位老朋友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 未来的新政权对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如何? 对他们多年来的事业是否接纳和支持? 这是他们急于了解的。1950年1月16日至8月17日两人接连互通书信计有8封, 值得注意的是, 在那极为敏感的时期, 他们采取了谨慎的方式, 在每封信上彼此都不约而同注上“极密”、“阅后火之”等字样。

1950年1月16日卢作孚致函晏阳初。信中说:

“有请吾兄注意者, 台湾绝非可凭藉以与大陆作战之基地。……美政府最近确定不卷入之态度, 亦系证明。但美政府仍予台湾以无济于事之经济援助, 使海岛与大陆相持之时间加长。……徒促中共更多仰赖苏联之军事援助, 于国民党之最后命运全无补救, 徒使中国人民更痛恨美国, 徒失美国人在国际之威信。此种利害得失, 万望兄向诸好剖析明白, 如美国欲得全中国人之好感, 最好设法结束台湾残余无望之争。此

为弟个人对兄个人提供之意见也。裁酌之。”

1月31日，卢作孚再次致函晏阳初：

“请告美国可靠友人，未来成败决不在原子弹或氢气弹，而在西方国家尤其美国对于落后国家有无真正了解。……必须先进国家真能全力帮助(比帮助西欧恢复需要力量更大)落后民族，使能迅速提高文化及生活水准，乃能使落后民族不生变化。对今后中国仍当寄予极大同情，予以帮助，使能和平建设，勿激起日趋恶劣的情感，日趋强烈的武装准备，走向极端，乃系可靠的办法。”

2月13日，晏阳初复信卢作孚，注明“极密”。

内称“近来(美国)朝野友好对于弟之主张(即在中国大陆继续农建工作)有同情者，有反对者(反对协助中共)，但事在人为，只要吾人不灰心，不头(投)降，成功不是完全无望的。但是弟有一重要问题(前函虽曾提过，但兄未答)，就是：如因我辈努力，结果得到此间朝野的拥护，中共是否欢迎，是否同意吾人在大陆继续工作，此点万请我兄拨冗打听个明白，否则费了一番心血，把这边说服而那边又成问题。请见复，愈快愈好，愈确愈佳。”

3月27日晏阳初再次致信卢作孚，仍标注“极密”。

“弟对于美国、中共的希望，试简述如左，请兄指教：

(一)在灾民、饥民、病民、死民遍国的今日，中共只靠一个在经济上自顾不暇的苏联，怎么得了?!

(二)我认为中国的大灾大难是我们救国救民的良机，在今日救死不及的时候，中美间不是谈政治、谈主义的时候，今天只应谈救灾、谈建设(我所谓：‘即救即建’的口号)。鄙见是由农村建设入手(比较单纯，双方容易合作，因已有先例)；(中美)双方在农建、即救即建的工作上有了合作的(态度、情绪、机构和人物)良好基础，然后第二步就可进行工业的合作；有了农建、工建良好合作基础，中美双方政治的，甚至主义方面的调协不是绝对无望的(我辈如能为中国多拉一个强大的友国如美国，那么中共做(苏联)附庸的可能就可减少多了，独立的国家可能性也就加强了)。

(三)弟所提供的这点愚见(但暂时只能粗支【枝】大叶)，您看中共可能有什么看法，什么态度？未得到比较可靠的答复前，我在此无法进行。

(四)如兄认为弟提的路线(由即救即建的乡建入手，而后工业，而后政治的合作)中共可以商量的话，我可进一步的同至好(指道格拉斯，Justice of the U.S. Super Court，时任美国大法官——引者)(前天曾与谈)商谈具体办法(道极赞同弟之路线)，如有必要，他可 secretly be authorized by the President as representative(被总统秘密委派为代表)到中国进行合作商谈。兹事体大，万望我兄百忙中抽出时间为此事用精力洒心血，缜密的敏速的进行，给弟一个具体答复。事关吾民族前途、世界和平，谅兄必应我所求。道(道格拉斯)兄要我代为致意。阅后附火，至要！”

同日，晏阳初再致信卢作孚。惦记重庆北碚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和璧山实验区的情况，希望卢作孚把“川中情形，以及吾人工作实况，新权态度，切望兄拨冗见告，至要”。

4月19日，卢作孚回复晏阳初。信中说：

“阳初兄密笈悉。兄先后所提意见，在目前国际局势之下能否洽得结果，不可知。弟在港亦无从接洽。亚洲问题诚不可听任战祸蔓延，诚当全力阻止战争发展，但基本拯救之道，仍在建设与改造，尤在农村建设与社会改造。中国如可在军事上告一段落，必能开始致全力于建设，必感觉需要国际之协助，届时必较易洽谈。”

8月17日，晏阳初再次寄信给致卢作孚。信中谈到：

“弟至好 Douglas(道格拉斯)到近东远东(India, Pakistan & Persia 等国)诸国家考察，约于九月廿日可抵香港(仅住一日)。如可能，亟盼兄能在港和他长谈。他的政治关系之重要，兄是深知的，如兄能为此特别返港一趟，是千值万值的。这对于中美以及美国和东亚今后的关系和影响是极大的。我已将兄在港之电报挂号给他，他在离开印度的前一日必给您电报。中美关系长此恶化下去，非我国之福，非美国之福，非世界之福。对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农、工、建设的合作，弟和各方友好无日不在积极努力中。天下无难事，天下无易事，只在吾辈如何努力耳！”

“最近台北农复会同仁来电促弟赴台商谈农建计划，彼等既不能在大陆实施农建，而只限于台北一隅，弟认为没有去台的价值。”

从两人频繁的书信往还中，可以反映出当时

他们对时局的迷惘、疑虑和对形势发展的关心。

就在晏阳初和卢作孚两人频繁书信来往揣摩中共态度、评估形势的期间,形势有了出乎他们预料的变化。

当中共占领南京后,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并未随其他国家使节南下广州,而是留在南京,设法秘密会见了自己昔日主政燕京大学时期的学生、时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的中共代表黄华。商谈美国政府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司徒雷登表示了访问北平的愿望,中共方面立即回应:他“可以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朋友受到欢迎”。

但是从1950年起,一股反共反民主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兴起。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所谓“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的浪潮”。在这种情况下国务卿艾奇逊电复司徒雷登,要求他:“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这表明美国政府决意在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之间最终选择关上了与中共谈判的大门。于是司徒雷登立即被召回国。紧接着8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说司徒雷登的撤离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要求“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的人,“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中共确定了“一边倒”的基本国策。晏阳初和卢作孚期待中共政权和美国建交的愿望终成泡影。晏阳初所期待的在新政权之下谋求自己事业发展的愿望也陡生变数。

二、院、会被封,归路断绝

让晏阳初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几乎就在他期待回国之际,川东行署派来工作组到乡村建设学院组织学习。配合抗美援朝,发动师生开展批判亲美、恐美、崇美的思想教育运动。联系实际,将水利系学生邓矿关于解放军借住女生宿舍“影响校内交通、卫生”一事所写的“我们的呼吁”大字报,定性为反



晏阳初早期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时,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

对解放军的反革命事件。并认定代理院长魏永清和副教务长石理亚是这一事件的幕后支持者,开展大批判。接着,以“反革命罪”将魏、石、邓三人逮捕。川东人民法院以“刑字第110号判决书”宣判魏永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大批判中认定乡村建设学院为反动分子所掌握,“以买办的奴化思想教育统治学生”。1950年12月22日,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言人发表书面谈话,称“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改良主义的外衣下,掩盖着投靠美帝国主义的实质,与蒋匪反动政府勾结,巧妙而阴险地从文化、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执行帮助美帝、蒋匪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反动任务”。“特予取缔并接管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接着,《新华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天津日报》《河南日报》《人民教育》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批判声讨晏阳初。随后在一些历史学、教育学的著作中也公开严厉指责他的“平民教育理论是一种为虎作伥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教育理论”,“是统治阶级麻痹农民的革命意识的工具”。认为它与梁漱溟的“乡农学校”教育理论一样,都是“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所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反动教育理论,都是为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服务”的;认为晏阳初的“四大教育”内容,“它的本质是反共反人民反对革命”的,他所宣扬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救

国论”，“完全掩盖了中国农村的阶级矛盾”，“掩盖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本质，替统治阶级开脱罪责，而对人民大加诬蔑”。同时认为“这便为国民党施行‘管教养卫’加强法西斯统治提供了根据”。这些著作长期被推荐为“高等学校交流教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至此，晏阳初的回归之路被彻底断绝了。

在那个思想控制严酷的年代，对知识分子厉行整肃，把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许多优秀人物扫进历史垃圾堆。他们的名字被社会“有选择性地遗忘”了。但是，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他们的名字却被广为传诵，备受赞扬。晏阳初被尊崇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世界平民教育之父”、人们称赞他为劳苦大众“在世界黑暗之处点燃了一盏明灯”。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授予他的表扬状上称道“晏阳初实在是一(位)具(有)信仰，富于想象力的英勇学者，也是他的万千同胞心智与精神的解放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根据对晏阳初的访谈写成《告语人民》(*Tell The People*)一书，高度赞扬“实用主义和平民主义在晏阳初身上的完美结合”。在印度的乡村工作者中间，晏阳初被称为“中国的圣雄甘地”，把《告语人民》奉为拯救乡村的“圣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参照它制定世界范围的基本教育计划。赛珍珠认为，晏阳初“他的祖国没有充分应用他的才能。或许这世界将会认识他并且充分应用他”。

三、二子归国，父子分途

1950年，这一风云变幻的时刻，晏阳初面对政权更迭和事业受到的打击采取了十分淡定的态度。此时正在美国读书的两个儿子却因国内政局的更迭而感到欢欣鼓舞，他们坚定地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可以救中国”，并对父亲说“您的那一套乡村建设办法对国家是没有用的。”坚决要求回到中共治下的祖国参加建设。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晏阳初的拳拳报国之心并未减退。他理解年轻人的报国志向。于是积极帮助孩子们在1950年实现了回国的愿望。其后他又不时寄信给国内的孩子们，鼓励他们学好技

术，提高业务能力，好好为国家服务。但是，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中国，政治运动连绵不已，孩子们由于有他这样一个父亲的背景，自然是厄运难逃，审查，批判，如影随形。从事石油情报研究工作的长子晏振东被下放到江西改造。从事音乐教学的二子晏新民被划成“右派分子”，几十年接受监督改造。屡经折磨两人都先后患脑中风，留下半身不遂的残疾。80年代，已是花甲之年的振东、新民相继来到设在马尼拉郊外的国际乡村改造学院探望父亲，同时接受乡村改造的国际培训，兼进行康复治疗。30多年后父子相聚自然格外欣喜，只可惜晏夫人许雅丽已于1980年去世。一直留在国内的，解放前曾是学生运动领袖、中共地下党员、后任新中国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高级干部的三子晏福民也在劫难逃。文化大革命中因不堪凌辱与殴打，被迫含冤卧轨自杀。有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人没有向晏阳初讲明实情。后来福民的夫人孙叶青到美国来，经不住老人不断的追问，只得说出实情，使90高龄的晏阳初悲伤不已。

晏阳初的挚友、乡村建设的同道、一代航运巨子卢作孚，因在“五反”运动中备受冲击与无端的污蔑，于1952年2月8日在重庆自杀身亡。这对晏阳初的打击可想而知。

尽管有亲友们的种种不幸，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旅居海外的晏阳初，思乡之情却与日俱增。除了随时关注着美国新闻媒体中有关中国的消息外，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常常站在窗前，望着异国的星空，情不自禁地低吟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以此来寄托他对祖国的怀念，他说“尽管我是四海为家，有时午夜梦回，难免乡思万缕。……尽管最近三十多年来，我常用的是英语，偶用母语，乡音未改。记忆中的故乡，随着我环绕天涯。”

四、两度返国壮心不已

1950年后，被迫离开中国的晏阳初得知中国新政权已经明令取缔了他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彻底否定了他过去的事业。但他坚信自己的事业方向正确。将平



教会建立之初的口号“除文盲、作新民”，扩展为“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毅然决然地将视野扩展到亚、非、拉美各大洲的欠发达国家。把在中国奋斗了30年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在海外又奋斗了40年。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印尼、加纳、古巴、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等国成立了平民教育组织。用当年在中国创造的“定县实验”中总结出的理论与经验，指导各国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实验。1967年在菲律宾创建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IIRR)，成为国际乡村工作干部的培训中心。该中心仍以“四大教育连锁进行”为基本原则。他是第一个将在中国人群、中国本土创建的平民教育理论与乡村教育制度传播到国外，使之在外国的土地上落地生根的中国教育家。

当晏阳初继续在一些国家推行在中国创造的“定县实验”成果，为改变贫困国家农民的生存境地而奔走呼号时，他在国际上继续赢得了极高评价。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在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之后，跨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面临着百废待兴，广揽各方力量共同建国的新局面。他看到一个个海外学人回国访问或定居。一些过去的同事与学生们，以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校友会的名义邀请他回国访问。虽思乡心切，但几十年来的阻隔与积怨，难以抚平那一颗深深被刺伤的心。他无法下决心作归国之计。1983年夏，欧美同学会在有关方

面的关照下写信给他，再次邀请他回国访问。欧美同学会是由几代留学欧美学人组成的民间团体，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他虽然意识到这次邀请再次传递了中国官方的某种信息。但此时他的心情仍是十分复杂，既有向往与思念，又难免疑虑与犹豫。他思虑再三，提笔写了一封婉转谢绝的回信。

欧美同学会诸位仁兄、姐有道：

久缺音问，而怀思无已。夏间荷蒙赐书，幸甚幸甚。承不弃在远，邀约回国叙旧，感何如之！适值冗忙，稽复为歉。母国故人，时在念中，惟以年迈，行虽不杖，不宜长途旅游，此医生之命，不得不从也。盛情厚意，念兹在兹，特申谢忱。

并颂

时绥！

弟晏阳初拜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八日

欧美同学会的邀请，确实传达了中共高层对晏阳初的关注。早在几年前，邓小平访美时就曾关心过晏阳初在海外的行止。希望他早日命驾回国观光，指示有关方面尽早做好欢迎他回国观光的工作。安排晏阳初回国终于从民间转换到官方的渠道。1985年8月10日，周谷城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的名义，郑重地邀请晏阳初及随行人员来华访问，欢迎他“考察中国农村改革和教育发展情况，并探望亲朋好友。”同时表示：“我相信，通过您的访问和考察，必将进一步加强我们之间的联系和友谊。我期待着您的来访。”接到周谷城的邀请信后，晏阳初十分激动，他说“我再也按捺不住要回国的急切心情了。”“我已到了这般年纪，有义务、有责任回去看看，考虑余年为祖国做点什么事情。”经过短时间的准备，他从纽约取道菲律宾马尼拉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陪同他来访的有国际乡村改造学院院长弗拉维尔，副院长、著名中国前辈外交家颜惠庆先生的女公子颜彬生，还有晏阳初的两位女儿。

晏阳初在回国考察访问期间,受到了高规格
的接待。

9月4日,周谷城在人民大会堂设宴为晏阳初一行接风,并以他历史学家的眼光高度评价了晏阳初为中国与世界平民教育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也会见了晏阳初。欧美同学会为他举行了茶话会,茅以升、严济慈、胡子昂、费孝通、赵君迈、薛暮桥、杨放之、陈翰笙等几十位各界名流与晏阳初欢聚一堂,共叙旧情。原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同事、学生们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晏阳初。亲切地对他说:“这几年,我们重点是先把农村的经济搞上去,随之农民的教育和文化也要跟上去。你在农村做了那么多年教育和改造工作,既有国内经验,又有国外经验,我们对你抱有希望,希望你多做贡献。”全国政协协商委员会主席、已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则在她中南海的家里接待了晏阳初。上世纪的40年代,周恩来与晏阳初在重庆召开国民参议会期间,曾为国家的和平、民主共同工作过。邓颖超紧紧地握住晏阳初的手说:“你可回来了!欢迎!欢迎!多年不见,非常想念。我们是老朋友,恩来在世时,常向我提起您,您一生从事平民教育志向不移,对中国和世界作出了贡献。您培养出来的学生,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有,他们成了国家的宝贵财富,为祖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盛情接待与高度评价,对晏阳初本人及其事业给予正面肯定,实际上已彻底否定了上世纪50年代大陆对晏阳初极“左”的否定与批判;实际上也是对过去强加于他们所谓“罪状”给予了昭雪平反。

1986年7月11日,中共重庆市委常委会上,审议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校史研究会的报告之后,决定以在《重庆日报》上公开发表老校友、中共地下党员詹一之、陶维全文章的方式,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平反,恢复名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早在1982年以《[1982]川法刑字第16号刑事判决书》,对原中国乡村建设院长代理院长魏永清案等改判,撤销原川东人民法院[1952年]刑字110号关于魏永清死

刑的判决;宣告魏永清无罪释放。

1987年7月,97岁的晏阳初又第二次回国考察,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教育部联系,试图恢复乡村建设学院,没有取得进展。

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一个以民间团体为主力的乡村建设派出现。短短十几年全国兴起600多个团体的1000多处乡村建设实验区。包括河北定县(晏阳初的平教会)、河南镇平(彭禹廷的村治学院)、山东邹平(梁漱溟、梁仲华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江苏徐公桥(黄炎培、江问渔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改进试验区)、无锡(高践四的民众教育实验区)等等。覆盖大江南北,大有风起云涌之势。倡导、推动这一社会改革的力量大多是非政府组织的民间社团。其代表人物之一的晏阳初,一生念念不忘的古训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其实质在于向中国人民中占90%的广大农民深入开展一场规模宏大的启蒙运动。为他们创造受教育的机会,医治“愚、穷、弱、私”痼疾,唤醒沉睡中的社会最底层人群,为国家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合格公民,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最终改变他们的命运。另一位乡村建设的领导者梁漱溟明确表示,中国现代社会,在经过了两次革命(辛亥革命与北伐革命)之后,需要的不是民族社会内部的斗争式的破坏性行动,简言之,“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文化改造与民族自救”。对于他们的事业,一些中国共产党人早有清醒的认识。1942年,薛暮桥在给刘少奇的报告中指出,乡村改造派“主观上是企图改造乡村,改造中国。他们不是为掩护地主资产阶级,甚至不是为着个人的金钱或地位,而是为着追求光明,追求自己空洞的理想而在这里艰苦工作着”。刘少奇在《答薛暮桥同志》一文中,明确指示党的白区的工作同志,“你们应更进一步与乡村改良运动的团体合作。……在反动统治时期,应加入改良团体,而不应与有群众性的改良主义团体对抗”。今天,我们对待晏阳初、梁漱溟这些历史上的改良主义的知识分子,更应当实事求是地予以科学的分析与评价。■

(宋恩荣,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张睦楚,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在读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二流堂”那些人和事

○ 马林

在1955年反胡风和1957年反右派之间，曾有一场反对“二流堂及其小家族”的运动。这场运动主要是在文化部在京各单位及文联各协会开展的。到了1957年，“二流堂”重庆时期人员的一大部分，北京时期的全部和“小家族”成员统统被划成右派。文化大革命兴起又都无例外地成了反革命分子。

那么，“二流堂”究竟是个什么组织？他们的命运，留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何为“二流堂”

抗日战争期间，位于陪都重庆的一所叫“碧庐”的大房子里，聚集了一批从全国各地流亡到重庆的文化人。长住的有话剧编、导、演金山、张瑞芳、吴祖光、吕思、凤子，音乐家盛家伦，《大公报》记者高集，《新蜀报》记者高芬，民盟萨空了；

时常往来的就更多了，有冯亦代、黄苗子、郁风、戴浩、方菁、沈求我等。坚持抗战，同情人民大众，靠拢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争民主、争自由，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对此国民党当局心知肚明，就在距离“碧庐”不足20米的一个坝子上搭了个席棚，以麻将桌为掩护，设专人常年监视“碧庐”的活动。

时任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文化组副组长的夏衍，是“碧庐”的座上客和主心骨。他是奉周恩来之命，一为广交朋友，时常就抗战形势和遇到的种种问题，来和朋友们通气；二是充分利用这个据点与相关人士会面。如在此地会见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夫妇等。

有一天，郭沫若、徐冰（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来访，话题谈到不久前在八路军办事处看过从延安传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剧情很简单。哥哥在山冈上开荒种地，远见妹妹送饭来，就佯装睡懒觉，被妹妹指责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后来误会解除，兄妹合力开荒，支援前线。聚集在“碧庐”的这些文化人，大多是自由职业者，居无定所，作息无序，自由散漫，落拓不羁，故借题发挥，彼此以二流子相称或自嘲。郭沫若本是名士，加上老友相聚自然不会放过凑趣的机会说，二流子集聚之地应称为“二流堂”。大家齐声赞好。徐冰高声叫喊找纸笔来，让郭沫若题写堂名。后来，纸笔没找到，堂名未写成。但“二流堂”之名却从此流传开来。据夏衍回忆，1949年5月，筹备建国，各界代表云集北京，他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以后，周恩来还特地问他：“‘二流堂’那些人回来了没有？”看来周是把“二流堂”的那些人当作朋友挂念的。

“二流堂”堂主唐瑜其人

“碧庐”——“二流堂”是唐瑜建造的。他是



文革中的《批判“二流堂”战报》(第一期)

“二流堂”名正言顺的堂主。如何看待唐瑜其人呢？最有发言权的是夏衍。

首先是因为夏衍一生经过无数政治风云的历练，而又才思敏捷，著述等身，举凡翻译、论述、话剧剧本、电影文学、报告文学，均有涉猎，这使他洞悉世事，目光犀利，见地独特、老道。其次，夏衍和唐瑜从1929年算起，有着66年从未间断的友谊，他们共同经历了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建国以后的四个时期；地跨沪、港、渝、桂、京各地，彼此亲密无间，聚多离少，相知甚深。第三，文革中，他们一个是名符其实的“二流堂”堂主，一个是“二流堂”的黑后台，一起被揪出来在万人大会上挂牌游斗，一起受辱蒙难，又先后获得平反，绝对是荣辱与共。

那么，夏衍是怎么看唐瑜的呢？夏衍说，唐瑜是“富贵胎，叫花命”，“像唐瑜这样的好人，今后再也找不到了”。

唐瑜出生于广东潮州一个华侨家庭。少年时为追求公平正义，从15岁起便和主编《绿洲》杂志的潘汉年建立了通信联系。1929年唐瑜只身离家赴上海投身革命潘汉年热情地接待了他。先把他安排在西门书店当小伙计，之后又派他到“左联”机关料理杂物。这期间，他认识了夏衍、阳翰笙等人。他在参加“五卅”大游行时被捕。警察对这个既不懂普通话，又不懂上海话的小“南蛮子”无计可施，又不肯轻易放过，稀里糊涂地判刑六个月。监狱是革命者的学校。唐瑜出狱时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还从同监难友那里学会了不少对付特务盯梢的办法，深受潘汉年的赏识，当起了潘汉年的交通员。

艰苦的革命生活锻炼，潘、夏的提携，加上个人的奋发努力，唐瑜从每月要靠潘提供5元钱的生活补助费，到学会了写文章、编刊物，在文化、电影界闯出了一片天地。

突然有一天，唐瑜发财了。原来，唐瑜的哥哥是缅甸的一位华侨富商。他借滇缅公路的开通，给唐瑜送来了几辆大卡车和一辆豪华小汽车。大卡车上满载着战时稀缺的物资和食品。战时的重庆工业品、药品十分匮乏，价格昂贵。唐瑜把大小汽车、物资卖掉；食品与朋友分享。唐瑜因此有了一大笔钱。他用这笔钱先后盖了



二流堂“堂主”唐瑜夫妇

五六幢房子。夏衍一家居住的规模较小较简陋，取名“依庐”的房子便是其中一幢。同情中国革命的奥地利医生弗里茨·严森（严斐德）的住宅也是唐瑜提供的。唐瑜盖房子，完全是出于朋友们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自己的浓厚兴趣，所以全部由自己设计，自己组织施工，为了使用木材方便，他甚至在重庆郊区买了一座木材蓄积量可观的小山。

“碧庐”是其中最大的一幢。当时在新华社工作的乔冠华称它为有着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它迎面有高大的立柱，宽敞明亮的阳台，有单间睡房和可供多人打地铺的大房间，有可容纳几十人聚会的大厅。这里的住户由堂主免费供应食宿，对朋友一律欢迎。唐瑜虽然有自己的睡房，但每逢人多或是来了家眷，他便挤到大房间去打地铺了。一副土产的古道热肠加西方的绅士风度，难怪被誉为“当代的孟尝君”。

1962年潘汉年获得假释，住在北京郊区，每逢进城必到唐瑜东单王府井住所，北梅竹胡同来歇息、闲聊。提起“二流堂”，潘说“其实唐瑜的哥哥更像‘二流堂’的堂主”。原来早在1940年潘就奉周恩来之命在香港约见过唐氏兄弟，布置他们利用关系，在缅甸建立一个空壳公司，以备必要时疏散文化界进步人士之用。唐氏兄弟当即返回缅甸，以最快的速度安排妥当，同时为《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导演蔡楚生、妻子陈曼云办理了入境缅甸的手续，再回到重庆当面向周恩来做了汇报。不出所料，“皖南事变”爆发，周恩来安排大批文化人进入缅甸。

其中有摄影师吴蔚云,画家丁聪,诗人张光年(即光未然),音乐家赵沨、李凌,戏剧家胡考,以及党的领导人徐迈进等。唐氏兄弟对这些人不仅包食宿,还发给生活费、置装费,足见潘说唐瑜之兄更像“二流堂”堂主言之不谬。幸好缅甸“二流堂”更具有临时性,也未曾命名,文革期间也未曾受到追究,否则会为天下人留下更多笑柄。

最冤的是“二流堂”北京时期的堂主吴祖光及“小家族”的成员。他们受难时间之长、程度之烈超过所有人。吴祖光生前发出的“一生误我‘二流堂’”的呐喊,可以说字字血、声声泪。

“二流堂”的精神气蕴

由于整肃“二流堂”错得太离谱,所以文革后“二流堂”一案较早获得平反。1979年7月27日文化部党组以[(79)文党字99号]文上报中共中央组织部为“二流堂”平反。那时候,推动平反的七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尚未开始。

文化部党组的报告,在叙述了“二流堂”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经过后指出:“所谓‘二流堂’是我党和一部分党外人士联系的场所,参与活动的同志,都是倾向进步,要求民主的。”报告引证了周恩来1970年5月9日对文化部和艺术院校的群众说过的话:“二流堂”不是一个组织,它没有正式手续,不像哥老会、青红帮有个手续;就是一个在一块吃吃喝喝,不是和“二流堂”一沾边的就是坏人啰!

无需多加说明,这个平反报告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是小心翼翼的,极其初步的,辩诬超过证明,远远没有恢复“二流堂”的真实面目和历史价值。

夏衍生前曾在唐瑜的一个册页上,大笔一挥题写了“二流堂主不朽”几个大字。“不朽”,用于活着的人并不多见。夏衍如此题写,不排除抚今追昔,笑谈往事的意味,但当我们把“二流堂”的兴衰,其同仁所受的磨难,与中华民族在苦难中振兴联系起来观察,就会发现一些神圣、永恒的东西蕴藏在里头,发着耀眼的光。不朽,无非是被后人记住,引起共鸣。它是些什么东西呢?

1. 爱国意识

在近代史上华侨爱国是出了名的。就唐氏

兄弟而言,论财富、地位,远远比不上陈嘉庚、司徒美堂、邵逸夫、霍英东等人。但是他们在国难当头的时候纾家功革命,罄其所有,尽其所能,义无反顾,终生不渝,而又与我国人文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结合得如此紧密,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唐瑜一生造了许多房子,但他造房子一不为生计,二不为牟利,三不为传留后代荫及子孙,他全然是为朋友,为革命,为急人之所急。直至解放后,他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条件,也一直是买房、租房居住。文革中,他被扫地出门,无处栖身,才第一次在虎坊桥分得三间公房居住。

唐瑜一生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他长期主管幻灯工作,每逢下面有人来谈幻灯工作,他总是自掏腰包请客吃饭。

说来有趣,在“三反”运动中,唐瑜还当了一回“大老虎”(贪污万元以上的称谓)。那是建国初期,为筹建八一电影制片厂,唐瑜被委任为副厂长,奉派赴香港采购电影器材,回来时正赶上“三反”运动。他兼具只身化妆赴港、经手大量现金、在香港社会联系广泛等诸多可疑条件,怎能不被查?一查,发现货与款严重不符。再查,是买回来的东西多,而花的钱少。多出来的器材,是唐瑜用自己的钱为公家买的。这无异于自己出钱买了顶“大老虎”的帽子戴在头上。这种事恐怕只有他才能做得出来。

到了晚年,唐瑜早已没有了其他经济来源,全靠工资生活。平日在家里,每每从电视、报纸上,见到什么不平之事、受难之人,被感动了,便悄悄写封信或寄点钱去。他自奉十分节俭,一辈子除了喜欢吃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突出的嗜好。说几句题外话,吃有三品,一曰能,二曰懂,三曰好。能是“饭桶”,不必说。他是既懂且好,不辞辛苦。为了品尝海鲜馅的饺子,他坐火车可以到站不下车,往前多坐两站。我们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期间,他竟能专程跑到武汉,挖墙打洞、千方百计寻访到曾经为毛泽东烹制武昌鱼的厨师,原汁原味地品尝之后,评价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谓武昌鱼,不过是鳊鱼,极为普通,唯鱼腩味甚肥美。而他在吃上面又十分注重节省,夏衍说他“富贵胎,叫花命”,也是他们一起在新加坡吃完饭后,唐瑜坚持要把折箩(剩菜)带走时的喃喃自语。

唐瑜弥留之际，曾把他的独子唐颂叫到床边说：“我恐怕没有多少钱留给你。”事后唐颂告诉我，“父亲留下的钱是人民币三万五千元”。

这就是那个一辈子被视为党内资产阶级而屡遭批判的人。我忽然想到，那些号称代表无产阶级的大人物，什么时候也把自己的财产公布一下呢？

一个连唐瑜这样的好人、爱国华侨都容纳不下，一味加以打击迫害的时代，绝不是一个好的时代。

2. 硬骨头精神

骨气的本意是对真理和信念的坚守，对谬误的抵制。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保持骨气代价极高。

夏衍的腿在关押期间被打断了，但是究竟在何时？何地？何人？何种情况下？在什么问题形成对抗？用何种刑具打断的？打断后有无进行医治？他从来不说。平时不说，写文章时不说，对亲朋好友乃至对子女也不说，像唐瑜这样的人问过他两次，他还是不说，至死也没和任何人说。有如他当年在国统区办报，对待欲说不能说的的问题，便在版面上开一个天窗，给读者留下无尽的遐想。

记得上世纪50年代中期，夏衍已年过半百，刚刚从上海调到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有一次我跟随他外出开会回来，朝阳门内文化部大楼前有十几层的高台阶，他出了小汽车，上台阶是一步跨两级，“哒哒哒”地跳跃着跑上去的。我当年二十多岁，当然跟得上他。他笑着对我说，这是他当年在日本读书时，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养成的习惯。后来，我跟唐瑜兄又曾谈起过此事。瑜兄说了自己的感觉，夏衍不说自己腿被打断的事，仿佛是出于一种耻辱感。耻辱！为谁感到耻辱？为他奋斗终生的理想？为他参与缔造的新中国？为人类文明的横遭践踏？我们无法猜透。如今夏公拖着瘸腿走了，让我辈泪眼模糊地凝视着他留下的一长串，一深一浅的脚印，从他那拒绝控诉中，领略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领略



相片中的人物，从右到左，前排：秦怡、张瑞芳、吕恩；中排：赵丹、吴祖光、唐瑜、丁聪岳母、丁聪夫人沈峻、丁聪；后排：黄佐临、张乐平、桑弧。

无声胜有声的无尽含义！

瑜兄不赞成打那么多的右派，对他们公开表示同情，竟然写报告给文化部党组，借口幻灯工作是冷门，无人愿干，要求多分配些右派分子到幻灯处工作。

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被划为军内大右派，要和夫人马桶一起下放劳动。他们的两个女儿一时无法安置。唐瑜说：“到我家里来吧！”他一诺千金。陈沂的两个女儿在唐瑜家居住经年，后来她们分别读完了中学、大学，都已成才。凡是从那段历史走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样做需要多大的勇气，承担多大的风险，即便是有心又有力的老同志，做到这点也很不容易。2009年，瑜兄到上海参加纪念“左联”活动的会议，病倒了。马桶拿了些钱给唐颂，唐颂说：“有钱花，用不着。”马桶动了感情说：“我知道你父亲不缺钱用，但有的时候精神的东西，也要借物质来表现。我这不是报恩，要讲报恩，我们全家下辈子也报答不完唐瑜对我们的恩情。他老了，这些钱你设法用在他身上吧！”

潘汉年犯的是惊天大案，1962~1963年，潘假释期间，谁都不找，哪也不去，唯独跟唐瑜联系。连夏衍、胡愈之等人由于他们担任着重要职务，都嘱咐唐瑜不要告诉，怕连累他们。唐瑜呢？瑜兄说：“像你那样的帽子我戴不上。我充其量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了。”

当时的社会主义教育学院是文化系统的“黑帮”集训班。陈荒煤是从办公室里被揪出来的，不准回家，直接从重庆押解来京接受批斗，脚上只穿了一双凉鞋。荒煤从“一二·九”时期的北平，30年代的上海，抗战时期的延安，解放后的武汉、北京，一直从事文艺工作。如今在社会主义教育学院，熟悉的人可以说是打头碰脸，比比皆是。但是，却单找唐瑜，“你能不能借一双鞋给我？”由此可见，瑜兄的侠肝义胆、不畏强暴在朋友中已经成共识。

戴浩，是总揽“二流堂”事务和对外交际的一个人物。他多才多艺，风流倜傥，1939年曾入延安抗大学习，后潜回重庆。他除了演话剧、拍电影之外，什么黑白两道、军警宪特、党国显贵，结交了个遍。连蒋纬国也开着吉普车和他同出同进，招摇过市。在旧中国，混迹官场有十字诀，其中一条是：“梨园子弟殷勤奉”。可见官府和艺人结交，实出于双方需要，古今同理。戴浩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特长，为党、为朋友做了许多别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阶段，已经沦落成一个腐朽没落的集团，原北平公安局局长在撤退台湾前，曾对他说：“耗子（戴浩的绰号）这么多年你说你钻了我们多少空子？我要是不走，你能让我钻你们一个空子吗？”

戴浩这样的人1957年成为大右派，可以说是理所当然。1962年熟知内情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找到瑜兄带话给戴浩，嘱咐他写一份检讨，即可由统战部出面，为他摘掉右派的帽子。戴浩断然拒绝，说：“不写。一写我不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了吗！”

文革中，戴浩这种顽固对抗的态度，受到了更加严厉的批判。说他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右派分子。”戴浩竟欣然接受，敬谢不敏说：“得，这样我岂不就成为右派完人了吗！”从此又多了一个“右派完人”的绰号。

面对知识分子既可杀又可辱的现实，讲气节、做硬骨头的代价是十分昂贵的。就戴浩而言，老婆离婚了，弃他而去；工资降到六十元，要维持四口之家，其艰难可想而知。当党组织从噩梦中醒来，真正了解自己忠诚的儿子，把他揽入怀抱的时候，距离戴浩告别这个纷扰的世界已经不远了。我们终于在他的讣告中看到这样一

句话：“他的崇高精神境界和优秀思想品质将永远记在我们心间。”

3. 平等宽容

上世纪80年代杨在葆和我拍了一部电影《代理市长》，杨是导演兼主演，我是总制片人。中宣部审查时认为有些台词过分激烈、刺激，要改。我们顶牛，不愿意改。夏衍听说后把我们找去一起看片讨论，说服我们做适当的修改。说：“不改，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不能放映岂不是损失太大了。”

在此期间，我跟在葆不服气，曾直接写信给总书记胡耀邦，向他申诉。那天在葆骑着我的破自行车从北影出发直奔府右街，中南海西门。凭着耀邦同志亲民爱民的好作风，加上在葆的明星面孔和好口碑、好人缘，居然很顺利地就见到了耀邦同志的秘书把信递了上去。没过几天，耀邦同志的批示就传达下来了，大意是：“这部电影我看了，台词有点刺，有什么了不起？比那些跟四化不沾边的电影强多了。”有了这个批示后，《代理市长》在全国一路绿灯，顺利公映。

耀邦同志是我们心目中最受尊重的领导人，我们对他怀有良师益友，甚至兄长般的感情。《代理市长》得到他的支持和肯定，我们心里是高兴的。但是我们并没有从中得到过多的“胜利的喜悦”。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如何领导文艺创作，以及如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简单说，有两种领导方式。一种是夏衍身上所体现的，平等、尊重、理解、宽容、探讨、批评、提醒；另一种是长期执政形成的官气十足的衙门作风，我审你改。哪种领导更符合文艺创作的规律，有利于创作的繁荣呢？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瑜兄曾两度侨居港、美、加拿大。有人曾以“唐瑜还会回来吗？”请教夏衍。夏衍第一次回答：“他为什么不回来？”第二次回答：“他为什么要回来？”仿佛是在打哑谜，包含着什么禅机。其实不然，只要联系一下时代背景就很清楚了，前一段是思想解放，奉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一段是思想禁锢，对提倡宽容的人也不宽容。这期间夏衍给唐瑜的信里说：“天要下雨，人要内耗，奈何？奈何？”透露出心情上的一丝悲凉。“内耗”就是整人，不容人，就是折腾。像北京时期“二流堂”堂主吴祖光

这样长期与我们共患难同欢乐的老同志,就因为他仗义执言,说了几句真话,就一定要清除、劝退,加以排斥,未免太过了吧!

文学翻译大家杨宪益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钱难进‘二流堂’”。黄苗子说:“一流人物‘二流堂’。”我们对“二流堂”不可小觑。对“二流堂”里的小人物同样不可小觑。论思想境界、事业成就、道德修养,他们并不比什么大人物差。要更具体地比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对真理的坚守,对朋友的诚信,他们比起许多高官显贵,只高不低。就说唐瑜吧,终其一生,说他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事实俱在,他是当得起的。

4. 快乐的天性

达观快乐是“二流堂”衮衮诸公的共同天性,其表现又各异其趣。

黄苗子有一幅自画像:一个胖老头赤裸着上身坐在床上,认真地修改着自撰的悼词。那神情专注,一丝不苟,生怕有所遗漏的神态让人不笑也想笑。此事的缘起是瑜兄与几位老友商定,各自撰写或互相撰写悼词、挽联,集中评比,评出优劣。意在避免那天到来的时候,家属和单位,为逝者贡献大小,评价高低,引起不快。

人说,乐极生悲。瑜兄有本事反转过来,将悲剧演绎成为喜剧。为了逃避“二流堂”专案组对瑜兄实施的跪沙砾、扇耳光的暴行,有一次他出逃了。那年头北京大街上不像如今这般嘈杂、拥挤、眼花缭乱,来往的车辆还比较少。获得暂时自由的唐瑜从东城走到了西城,漫无目的,最后竟鬼使神差地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累了,坐在金水桥畔,盘点自己的一生。弱冠之年,提着大捆的钞票,投奔革命,如今有国难报、有家难投,酷刑之下度日如年,如此革命不革也罢!想着想着不免悲从中来。电报大楼的时钟显示已经过了午夜12点,一天奔波下来,水米未进,怎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所能承受的呢!总不能一直坐下去吧,他突然间灵机一动,有了。他站起身,迈开双脚,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大步跨过宽阔的长安街,走进了公安部的大门。

“我是反革命分子,是逃犯,来自首的。”他的如意算盘是本想借此来个罪上加罪,能晋升一级被关进秦城监狱,逃脱专案组的折磨。谁知第二天就被送回文化部的牛棚。

“你当秦城监狱是你开的?想进就进,又不是‘二流堂’。”多年后,提起这档子事,面对我的揶揄,瑜兄只是抿着瘪嘴嘿嘿笑,也不搭茬儿,一派天真。

倒是有一人未经申请,也未经逃亡,不知怎地便从城里的半步桥监狱转押到了秦城,他就是黄苗子。那天,安排甫定,狱方就找黄苗子谈话,主题是到秦城后的感想。黄觉得没啥好谈的,狱方坚持要他谈。事实上,秦城监狱,较之原来的关押处,在食宿条件上都有所改善。狱方是出于施惠于人希望听到赞扬,还是有“犯人思想动态”之类的报告要写,外人不得而知。黄苗子无可奈何,便操着带有浓重广东口音的官话,拖着长声说:“我的感觉系(是),从一个木头造的笼子里头,搬到了一个金子造的笼子里头来了。”整个儿一股子“二流堂”的堂风、堂气。

顺便说一句,据多事者统计,“二流堂”衮衮诸公,无论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冤,没有一个自杀的,这与他们快乐的天性、乐观的精神不无关系吧!

“二流堂”不是一个什么严密的组织。他们集结在一起,追求光明,鞭挞黑暗,独立思考,服从真理,维护个人尊严,推崇民主、自由、平等;他们个个事业有成,人人达观快乐。难怪许多人心向往之,年老的知名文化人就有启功、王世襄、杨宪益、邵燕祥、姜德明,等等。■

(作者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原厂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稿—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 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张玺一生的几件大事

○ 刘洪声 张林南

张玺,原名王常珍,1912年3月19日生于河北省平乡县东田村一个当辈子发家、当辈子破产的地主家庭。1931年春在邢台河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加入共青团,任四师团支部书记,后任三校团总支书记,从事和领导学生运动。

张玺不仅是鲁西、湖西和冀鲁豫未合并前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合并后的冀鲁豫边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9年3月河南省委成立,张玺任副书记,5月接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1952年底,张玺调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后任专职委员、副主任、常务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协助李富春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抓计委全面工作。

1959年1月8日,张玺因癌症去世,时年46岁。

一、创建和发展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36年,日本侵略军已越过山海关,威胁平津。国内主要矛盾已由阶级矛盾转变为民族矛盾,形势的转折急需大批党的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掀起全国的抗日高潮。然而,此时华北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领导骨干大都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鉴于新形势和党的新任务的迫切需要,提议并得到党中央的批准,采取特殊措施,于1936年秋把包括张玺在内的五十多位同志从草岚子监狱营救出来。

张玺是在1932年被叛徒出卖后进入监狱的,经过四年监狱生活的磨难,张玺从一个年幼稚的革命者,成长为具有一定对敌斗争经验的坚贞共产党人。出狱不久北方局派他到中共直鲁豫特委任宣传部长,后任书记,从事地下工作。

“七七事变”后,张玺继任直鲁豫特委书记,

后任冀鲁豫地委书记、太南区党委书记。他根据党中央、北方局的方针指示,利用国民党军队向南撤退,地方政权瓦解,平汉、津浦、陇海、石德四大铁路之间的广大地区暂时成为真空地带,日军尚未到来的有利时机,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各种抗日团体,掀起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高潮。他亲手建立了磁县抗日民主政府等抗日政权,具体指导组建了以彭城镇磁厂工人为主的河北民军第十三支队和以六河沟煤矿工人为主的抗日第四支队等抗日武装。为解决干部缺乏问题,他组织开办训练班,先后培训了四五百名抗日骨干,一部分返乡作了当地县、区、村的干部,二百余人被输送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工作。他的努力,为这一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0年4月,北方局调张玺到刚成立的冀鲁豫区党委任书记;同月冀鲁豫军区成立,由八路军一一五师344旅代旅长杨得志兼任军区司令员。冀鲁豫区党委领导直南、豫北、鲁西南3个地委,18个县委。随后,冀鲁豫行政公署成立,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到1940年底,冀鲁豫边区向南发展到陇海路,西面、北面接连晋冀豫根据地,东面与山东根据地相邻,成为与华北、华中以及与延安大后方联系的“纽带”、“走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日军对于这块处于平汉、陇海两条铁路干线交汇处的重要地区也志在必得,这使冀鲁豫边区时刻面临严重的斗争形势。

1940年6月10日(农历五月五日),日寇调集日伪军两万余人分12路向清丰、濮阳、内黄合击,妄图歼灭我主力部队机关。杨得志率领机关及时跳出敌包围圈,他和张玺指挥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在外线分散活动骚扰打击敌人,坚持反扫荡,迫使日寇于18日结束扫荡。这次“五五”大扫荡,日伪军初步形成对根据地的封锁包围,把

我一个完整的地区分割成许多小块,最大的一块位于濮阳、内黄、滑县交界的沙区中心区。我地方政权、武装和群众团体的损失相当严重。反扫荡结束后,张玺召开区党委、军区、行署、群团等直属机关干部会议,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教训,部署了各项工作。会后分头抓了正规军的扩大和区、县武装的恢复整顿及民兵的发展,使全区保持了一支机动灵活打击敌人的武装力量;调整配备干部,恢复了部分被打散的县、区组织;进行了一系列善后工作,稳定了群众情绪。

1941年4月12日,日、伪军两万余人,对我沙区进行第二次大扫荡。敌人采用反复分割、包抄和围剿,以及烧光、杀光和抢光等极其残忍的手段,妄图彻底毁灭沙区中心区,歼灭我主力部队。张玺和杨得志坚持在沙区的枣林和沙丘之中,指挥主力部队和沙区游击队、民兵,运用“麻雀战”、“地道战”和“掏心战”等,到处袭击敌人,搞乱他们的部署,打破了他们的“铁壁合围”。在“4·12”大扫荡中,沙区的房屋被烧过半,军民被杀四千,粮食、种子、耕牛和农具被抢大部,群众主要经济来源之一的枣树被砍五万余株。目睹日军的暴行,张玺无比愤恨。反扫荡结束后,张玺立即组织和协调区党委、行署、军区从各单位抽调干部120余人,组成五个工作队,配合当地党、政、军和群团恢复健全组织,调查救济受害群众,向地主、富农借粮筹款,向一些开明的地方士绅进行募捐等等,筹集冀钞九万余元,粮食八万余斤,衣服千余件,以及柴草和大量的锅、碗、瓢、盆、农具、家具等,及时救济了难民,使遭受劫难的沙区人民度过了“生死关”,也使我党政军重新在这一带立住了脚跟。

此后,日寇不断向华北敌后增兵,扫荡更加频繁,敌后抗日形势日趋恶化,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处在敌、伪、顽夹击和土匪、会道门骚扰暴乱的严重威胁之下,加之连年严重的旱灾和虫灾,致使人民生活、部队供给和边区财政经济极端困难,边区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为了统一和加强冀鲁豫平原抗日斗争力量,1941年7月1日,北方局决定,冀鲁豫与鲁西区党委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区党委,张霖之任区党委书记,张玺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玺与张霖之配合默契,他们领导边区军民粉碎了日军多次



冀鲁豫区党委书记时的张玺

“扫荡”和日伪军上百次“围剿”,打退了国民党顽军的挑衅和进攻;及时抓了善后工作,发救济粮、贷款和种子,组织生产自救,帮助群众度过灾荒,重建家园;并对乘机骚扰之土匪、反动会道门给予坚决镇压,稳定了社会秩序,硬是在敌人图谋毁灭的这块土地上坚持下来,保住了这块重要的平原抗日根据地。

1942年10月20日,北方局调黄敬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力量。1942年底,中央决定将湖西区及豫皖苏水东区划归冀鲁豫边区。在年底召开的全区高干会议上,黄敬传达了党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总结了几年来边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了今后的任务。

张玺一直认为,出狱后就担负了一个地区的领导工作,未从最基层、社会的最深处开始工作与斗争,他多次向组织要求到下面去锻炼。1943年初,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要求,派他担任了冀鲁豫边区四地委书记。在地委工作近一年,他深入基层的时间约占三分之二以上,不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总结了不少典型经验,适时地指导

了各县、区工作的开展,有的经验还推广到全边区,而且结合实际,有选择地学习了毛泽东著作、彭德怀(时任北方局书记)报告和北方局指示等,写下7万多字的日记,内含多篇读书札记和调查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和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冀鲁豫边区根据地的建设和工作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945年1月23日,党中央指示称:最近冀鲁豫根据地有极大发展,为抗战的全面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春夏,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展开反攻作战,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浴血抗战终于取得辉煌胜利。冀鲁豫根据地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平原抗日根据地,面积达10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2000万,控制县城75座。作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负责人之一的张玺,对这块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倾注了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坚持游击战争,支援刘邓大军作战

1945年8月20日,中央决定:合并冀鲁豫中央分局和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区党委和军区,邓小平任书记。同日,晋冀鲁豫军区成立,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9月19日,党中央明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要求晋冀鲁豫军区竭力阻止国民党部队北上。冀鲁豫地处平汉、陇海、津浦三大铁路干线之间,是御敌北犯的南大门,是刘伯承、邓小平所率野战军作战的主战场,也是刘邓大军揭开战略反攻序幕、挺进大别山的基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1946年6月,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大举围攻我中原等解放区。为配合中原和苏中解放区的作战,8月10日,刘伯承和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发起了陇海战役,迫使蒋介石将追堵中原解放军的3个整编师和已投入及准备投入华东战场的精锐部队调到冀鲁豫战场上来,打乱了国民党南线作战计划。时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张玺同行署领导组织了10万农民随部队开往陇海线,昼夜突击破路,使陇海线瘫痪。还组织十几万民工给部队

送弹药、运粮食、抬担架,深入前线和敌占区,胜利完成支前任务。

陇海战役胜利结束后,蒋介石于1946年8月28日调集14个师、30余万兵力压向冀鲁豫所属黄河南岸地区,妄图消灭我军主力,占领鲁西南,再在3周内打通津浦、平汉铁路交通,席卷华北解放区。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反攻倒算,无恶不作,我黄河南岸地区受到严重损失。刘伯承严肃批评冀鲁豫区党委,工作不扎实,缺乏战争准备。张玺从思想上接受这一批评,深感自己对局势发展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在撤退中所受损失负有责任,决心挽回局面。

9月中旬,张玺召集区党委紧急会议,建议并经讨论决定,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组成两套班子,一套插入黄河以南敌占区,领导对敌斗争,一套留在黄河以北地区,抓土改和支前等工作。会上,他果断提出:“在紧要关头,干部的行动就是方向,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插入敌后,直接为群众撑腰。”会后,张玺与军区司令员王秉璋、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赵健民、区党委组织部长徐运北等率军区独立旅,同各分区组成的游击集团,县、区组成的武工队,分批插回黄河南岸地区,紧紧依靠群众的掩护和支持,通过发动群众反地主倒算,保土改果实,镇压还乡团等斗争形式,坚持农村阵地,站住了脚,并不断袭扰打击敌人。

1946年9月3日,刘邓大军胜利结束定陶战役之后,黄河南岸地区出现了敌我双方反复大拉锯的局面。我军在大踏步进退中,抓住有利战机,曾在这里进行过七个重大战役,歼敌近25万余人。每当我歼敌一部后,撤出休整,敌人便到处追寻我主力军作战,并对黄河南岸地区频繁进行“清剿”、“扫荡”、“蚕食”。黄河南岸时而大片收复,时而大片沦陷。为使全区干部认识这一基本特点,张玺几次返回区党委,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和敌我斗争态势,总结经验,部署游击战争。他强调:要在较长时间内,坚持自力更生的游击战,抓紧壮大武装拳头,巩固农村阵地。对野战军要依靠而不依赖,大军来了就配合大军作战,大军休整就独立坚持。要以战争保护群众利益,群众就会支持战争。等等。这些基本经验的贯彻实施,使游击战争广泛而又深入地开展起来。为指导全局斗争,张玺始终

亲临第一线,及时总结典型经验,进行分片指导。经过九个月的艰苦斗争,黄河南岸地区39个县有30个县坚持下来,牵制了敌人4个师以上的兵力,控制了70%以上的农村阵地,直接为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准备了战场,创造了条件。刘伯承鼓励说:你们工作得很好,冀鲁豫人民对敌斗争很得力。

1947年6月,党中央决定,以我军主力打到外线,调动敌军回防空虚的后方,彻底粉碎敌军对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继而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将解放战争推向战略反攻阶段。据此,中央军委向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发出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陈(毅)粟(裕)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指示。根据中央军委的具体部署,刘伯承、邓小平对渡黄河作战作了一系列充分的准备。与此同时,张玺和冀鲁豫区党委、行署的领导同志全力配合刘邓大军,做好各个方面的安排和渡河的准备:成立黄河河防指挥部,负责南北交通和河防安全,挑选熟识水性、能撑船、思想进步的积极分子分别在7个渡口组成7个航运大队,全部实行部队编制,集中驻守、集中训练,随时待命;将造船任务下达给沿河各县,要求沿河群众整修道路、安全运输、保护物资;动员根据地人民组织起担架团、轮战团,并为部队腾房安排住处,为部队做鞋、磨面、准备吃穿;还掀起了参军热潮,给部队补充兵员。

1947年6月30日晚9时,刘邓大军按照预定计划,在从濮县至东阿县300华里的黄河防线上,同时发起渡河战役。渡河部队在强大炮火掩护和先期渡河部队接应下,300只船齐发,一举突破蒋介石的黄河防线。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后,接着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张玺亲自随同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动员全区军民全力配合鲁西南战役的胜利进行,欢送王秉璋等率冀鲁豫子弟兵,升编为刘邓大军第11纵队,同时,输送了大批冀鲁豫的干部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开辟江淮河汉新解放区。邓小平赞誉:冀鲁豫是个好战场,到处都有翻身农民的支援,走到哪里都有饭吃。他还说,我军取得的胜利是和边区人民的支援分不开的。

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战争形势虽然险峻,

冀鲁豫根据地的任务十分艰巨,但张玺和他的战友以大无畏精神勇挑重担,与根据地人民共渡难关,深入第一线指导游击战争和群众运动,从各方面配合与支援大军作战。

三、开展河南省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

1949年3月1日,河南省委成立,李雪峰任省委书记,张玺任副书记。5月,张玺接任省委书记兼河南省军区政委。长久战乱将中州大地糟蹋得满目疮痍。尽快改变这种面貌,解决从战争到建设的一系列问题,是省委的当务之急。

首先是搞好农村土改,迅速恢复经济。许昌地区的后七县解放较早,工作基础较好。张玺一直把这里作为省委群众运动工作的一个“点”来抓,总结出不少具有指导性的经验。全省土改具体实施方案的雏形,就是他带着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干部,到这七个县考察后,同地委领导一起研究形成的。又通过反复座谈、协商、修改并经全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形成正式方案。1950年1月20日,政务院批准了河南省的《土地改革条例》。全省的土改即按照这个方案进行。在全省进行第二批土改时,张玺从各地所写的材料中发现,某些政策界限尚不清楚。于是,他又同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韩劲草等到襄城县,用两周时间摸清情况。回到省委,就土改前必须训练好干部,使干部真正掌握政策,弄清方法步骤;划阶级必须搞清鳏寡孤独、小土地出租者、自由职业者、地富过继子女的成分变更等政策界限,又作了具体补充规定,促进了全省土改运动的顺利开展。

豫东有波及20个县的黄泛区,被淹土地达一亿亩。黄泛区地广人稀,泛区与沿泛区、老区与新区差异很大。1951年春,张玺同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干部几次去查明情况,制定了不同于一般地区的泛区土改方案。方案规定:除黄水泛滥不重,阶级占有关系基本未变的地区,仍按一般地区搞土改外,对搞过“急性土改”和谁垦谁种谁收的地区,则主要是调整土地,尊重劳动,鼓励外地农民乃至土改后的地主、富农到泛区定居,开荒种地,3年不收公粮。这既极大地鼓舞了当地和外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又促进了泛区的开发

和建设。

正当土改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张玺已经开始考虑经济恢复问题。他在河南四年,一直坚持每年约4个月到中央和上级开会,4个月统筹安排全盘工作,4个月深入基层的工作方法。1950年12月,他到许昌地区考察了20天,听取了地委和有代表性的县、乡、村土改后转生产的汇报;又用7天着重了解郟县李口乡土改后转生产和互助组发展情况。他了解到贫下中农分得土地后,缺乏耕畜和大型农具,是需要互助的。但互助组的发展,必须靠群众的自愿结合,同时允许并保护农民单干的积极性。他利用到中南局开会的机会,同已调赴中南局工作的刘杰就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951年1月12日他写了《关于土改后农村情况向中南局的报告》,建议土改后应转向抓好生产,提倡发展农业互助。中南局对这一报告很重视,即作批转这个报告,不仅对河南省土改后转生产和农业互助运动的开展起了引路作用,而且给中南各省提供了示范性的经验。

为促进城市工业、交通事业的发展,他于1951年2月和6月两次到郑州就民主改革和工商业恢复问题调查约半个月,充分肯定了工人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要发挥资方和劳方两个积极性,做到劳资两利,促进生产的发展。他亲自为《河南日报》写社论,号召每个城市都要搞好民主改革,促进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1951年6月,他用10多天时间到供销社和信贷社发展较早、搞得较好的洛阳平乐乡摸索经验,用令人信服的事实阐述了信贷社有互通有无,解决农民生产资金短缺,供销社有沟通城乡关系,买卖公平等优越性。他认为,这两种新型的经济形式有着国营、私营商业和国家银行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必须大力扶植。他专门就此事召开省委会研究,责成省委组织部配齐干部,省政府做好准备事宜,使供销、信贷系统很快形成网络,普遍开展了业务。

在此期间,他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城乡经济梗阻,工业品下不了乡,农产品进不了城。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亲自下去调查,请人上来开座谈会,责成省政府组织了大规模、多层次、跨省市的物资交流会、骡马大会、庙会、土特产会,调

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疏通了城乡渠道,活跃了市场,繁荣了经济。

仅用了3年时间,张玺就领导河南全省人民完成了民主改革的各项任务,恢复了经济、发展了生产。1950年到1952年,粮食总产量增长50%,国营、合营和私营工业总产值增长九倍,全省工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战前最高水平,人民群众生活得到不断改善。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我军在中原地区战略反攻的节节胜利,党中央陆续抽调大批干部来到河南,形成“八方风雨会中州”、“五湖四海涌中原”的宏伟场面。既要使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干部形成一支团结战斗的队伍,很好地担负起本地区的工作,又要培养输送大批干部,适应新解放区迅速扩大的需要,这确非易事。

他强调集体领导,从思想上尊重每位领导成员,遇事同大家商量,从不自作主张,赢得了省政府主席吴芝圃、省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省委副书记刘杰、杨一辰、裴孟飞等人对他的尊重和信服。

他关心爱护干部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能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他总结了一条经验,就是在运动的“火头上”,对被“烧”干部不能作“热处理”,待到运动后期,核实材料后,再作“冷处理”,这样就可避免偏差。对犯错误的干部,他历来主张以教育为主,只要能挽救的,尽量不给处分。对因形势所迫或受“左”的影响,处分错了或处分过重的干部,他勇于承担责任,主动予以纠正。

1952年10月29日晚,张玺和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去兰封迎接毛泽东视察黄河。一见面,毛主席就风趣地说:何劳大驾,还到这里来接。接着,毛主席询问了许多问题后说:好嘛!我从一些材料上看到和听邓子恢说,河南这几年的工作搞得满不错哩!

河南人民和广大干部把这几年誉为解放后河南最好的时期之一。

四、建立和开展我国计划经济工作

1952年底,张玺调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后任专职委员、副主任、常务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

当得知这次调动时,他意识到这是工作上的一次大转变,深知自己对全国经济情况生疏,业

务知识缺乏。为此,他每天业余坚持自学,并请秘书把全国的基本经济数字汇集成册,熟悉到了有问即答的程度。他还请几位高级工程师给他“开小灶”,上技术业务课,即使有一个问题弄不明白,也不肯罢休。同时,他曾赴沈阳、抚顺、本溪、鞍山、吉林、大连、长春和哈尔滨,以及天津、塘沽、开滦、唐山和北京的门头沟、石景山等地,到一些冶金、机械、煤矿、电力和化工等企业参观学习,坚持白天看,晚上谈,看一个单位,谈一个单位。只用一年多时间,他就肩负起协助李富春主任抓国家计委全面工作的重担。他具体组织计委各专业局,会同国务院各部、委,研究编制了1954年到1957年的四个年度计划。在周恩来、陈云亲自主持下,组织编制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为确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援建项目,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于1956年7月8日赴莫斯科,同苏联方面进行了为期43天的谈判。

1954年春,国家计委从中财委接过“一五”计划草案,着手正式编制“一五”计划。同年夏,陈云、李富春继续主持编制“一五”计划,张玺组织具体工作班子,随同到了北戴河。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李富春、张玺请示周恩来、陈云后,将工、农业生产原定平均每年递增20%和7%的速度,分别调整为平均每年递增14.7%和4.3%。实践证明,“一五”计划是一个借鉴苏联经验,体现我国实际、编制得比较成功的五年计划。

1956年8月下旬,张玺从苏联回国后,周总理正在亲自修订“二五”计划的建议,他立即投入这项工作。周总理指示:“一五”计划的实现,使各方面的基数增大,“二五建议”的增长指数更应留有余地,要稳妥,特别是农业,主要还是靠天吃饭,指标定得不可过高,要以平收年为基数。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张玺同其他分管副主任及各专业局,又把“二五建议”调整了一遍,将周总理的意图全部体现在了“二五建议”的各项具体指标中。《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是既积极、又稳妥,符合我国国情的一个好“建议”。可惜,这个“建议”由于“大跃进”而夭折了。

在国家计委工作,上面领导多,外部关系多,内部单位多。要把这些都办妥帖,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因此,张玺每天工作不下十三四个小时,往往一天

参加或主持几个会议,还要处理大量的日常工作。在长年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他忘掉了劳累和困倦,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和充沛的精力。他在协助李富春工作期间,对计委全面工作安排得仔细周到,对各方面关系处理得稳妥协调,主动挑起日常工作的重担,有大事就及时向李富春请示汇报。李富春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张玺对其他分管副主任都很尊重,常和他们谈思想,研究业务,学习他们的长处,支持他们的工作,还常同各局局长乃至一般干部谈心,使国家计委机关形成了一种气氛民主,上下团结,关系协调,工作积极的良好风气。

从1956年4月起,张玺就感到身体不适,鼻孔堵塞、低烧不退等症状时常发生,但他照常从事着繁重的工作,通宵达旦地连续干了好多天,还带病参加了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直到这年11月底,他才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再三催促下,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鼻咽癌晚期。周总理获悉,立即送他赴苏治疗。在苏联住院的近3个月中,他忍受着放疗的剧烈反应,坚持锻炼身体,读书报,学俄语,思考计划工作中的问题。回国后,他自以为病已痊愈,立即投身工作。实际上,转移部位的肿瘤正在扩散,医院又给他做了一次大手术。从此,他同病魔进行了长达两年的顽强抗争。在这两年中,他从未间断过工作和学习,医院和家里都成了他的“办公室”。他曾几度面临绝境,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医院看望过他,周总理还经常询问他的病情,让卫生部请最好的大夫,进口最好的治癌药为他治疗。这使他感到无比温暖,更增强了战胜病魔的信心,一次次奇迹般地转危为安。1959年1月7日,张玺处于弥留之际。周总理得知,派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一直守护在他身边。晚10时,李富春专程从广州赶回探视,薄一波、安子文也赶到医院。薄一波再三问他:“我和富春、子文都在这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直到这时,张玺仍未向病魔服输,反问道:“这就算完了吗?!”

1月8日晨,年仅46岁的张玺怀着壮志未酬的最大遗憾与世长辞。他为我国的经济计划工作和建设事业奉献了全部精力和智慧。■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王缙绪辞官抗日

○ 王宇知

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上将)总司令王缙绪,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抗日名将,曾获抗日英雄的称号。

王缙绪(1885-1960)字治易,四川西充人。幼年受业于举人,考取秀才。爱好收藏,喜好书法,善作绝律。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同志军”。

1908年,王缙绪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杨森同窗。从事军政40年,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1932年任刘湘部北路总指挥、第三路总指挥,助刘湘统一四川。1936年国民政府授予王缙绪中将军衔。

1938年,王缙绪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同年5月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40年加任陆军上将军衔。1949年王缙绪拒蒋去台,同年12月14日在成都通电起义。

1949年,中共中央任王缙绪为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文史馆馆长等诸多职务。

弃省主席之职,重返抗日前线

1937年卢沟桥事变,王缙绪率第44军(编入第二十三集团军)开赴前线,由川鄂大道出发东下,向宜昌集中,增援平汉铁路沿线。因战事需要,44军从第二十三集团军中抽出,与67军合编为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缙绪任该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20日,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刘湘出川抗战因病去世,围绕着谁接任四川省主席一职的问题,在中央政府与四川军政之间、四川军政各派系之间展开了非常激烈而复杂的斗争。

4月26日,行政院公布决议王缙绪代理四川省主席。次日,王缙绪致电蒋介石,恳请收回代主川政成命。5月3日,蒋致电王缙绪:“成都王

主席治易兄,感电悉,情殷抗战,具见忠怀,至深嘉佩。惟此次决定川中军政人选,以此最为相宜。吾兄应即遵令就职,勿再谦辞。”不久,国民政府任命王缙绪为正式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兼任四川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督办。

1938年8月11日,时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信王缙绪,信中写道:“抗战军兴,吾川对国家民族,殊多贡献。省中健儿在南北各战场与全国友军携手并进,以头颅捍卫国土,以鲜血换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川人增加许多光辉。西望故土,殊令人兴奋鼓舞。……在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任务中,今后四川将肩负更重大之责任。吾兄领袖群伦,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资,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与蒋委员长之历次指示,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

1938年,抗战局势最为紧张,我国一些省市已沦陷。四川省将定位全国抗战的大后方,时任四川省主席王缙绪不仅要征兵供粮支援前线,还要接纳汹涌而至来自沦陷区的难民,更要确保后方政局稳定。此时四川民众担负加重,各种矛盾激化,群体冲突事件时有发生。王主席体念民苦,对群体事件采取“理喻式和平方法”予以化解。当年,新都实验县乡民,受地方哥老及土豪劣绅之鼓动,集合团丁围城反抗,附近各县团丁亦纷往参加。王主席取消了实验县名义,撤换县长,事件始获和平解决。同年“中江事件”又起,乡民二千余人,包围县城。王主席追查事件起因,其结果是县政人员征兵征粮舞弊,引起民众公愤。他亲自宣慰处理,亦幸获解”。王缙绪以“国难当头,号召与带动所有公务员洁身自好,力除浮华,为民表率,通令昭示”。要求各级公务人员“凡因新职以及因公来省者,对于长官或同僚,概不准应酬;不准借婚丧庆寿大摆宴席,收受礼物;对卸任人员,当地士绅民众发起送万民伞或送功

德碑等类事件,应设法制止,决不可迁就”。

王缙绪自担任省主席起,他推行了一系列新政:裁撤冗机关,节省公帑;整理财政,彻底清查过去账目,严惩贪污;减征田赋。他制定了《县长守则》、《兵役科干部守则》、《常备队干部守则》;对县长提出六条要求,一、巡查认真,督促彻底宣传;二、随时到常备队点名,严查空旷,慰问疾苦;三、随时慰问贫苦壮丁家属;四、依期欢迎送出征壮丁;五、彻底实行壮丁优待;六、严厉查办舞弊人员。指示督办公署督办禁烟宗旨:肃清私土,绝毒禁种。

1938年9月,参政员张澜为征调壮丁问题致函省府,请求改善办法。王缙绪复函张澜:“……征调壮丁为目前第一要政,而办理不善,亦为丛弊之尤,前线后方,胥受影响,审思竟夕,焦灼莫名。承示五项,洵为扼要之图,一四两项当嘱主管厅遵办,二项亦当悬为厉禁,随时调查严究,三项迭经通电飭知,五项亦由军管区司令部与民厅议有切实办法,不日见诸实施。先生体国恤民,盖虑所及,罔不切合实际。绪虽不敏,尤当敬谨遵行,期无限越,尚乞释念为叩。”10月,王缙绪聘请社会人士分四路到全省各县指导监督兵役办理情况,“胡文澜负责东路,张表方(澜)负责北路,邵明叔负责南路,周奉池负责西路,以改善兵役”。当时,王缙绪着力清理川省历史旧账。他在省财政整理委员会议上说:“……个人认为刘航琛任内支付各款,凡有甫公(刘湘)亲笔条令,数目吻合者,全川民众均应感于甫公为民为国之苦心,将其承认;若既无亲笔条令,及无其他可靠证据,即应彻底清查,究明真相,以便依法追赔。……此举全在铲除川省历年来财政上种种积弊,使之趋入正轨,以表现公开财政,昭示大信之精神,决不至如过去之敷衍了事。”王缙绪还亲自到各县视察,除考察吏治、兵役、保甲、禁烟及地方建设外,对民间疾苦亦极关怀,走访入伍士兵家属,并支助慰劳金。

王缙绪任职前,四川处于极度无序的状态,在他的各项川政推行之下,全省川政已上轨道,治理完善有序,在保证前线的物资供应上,全面推进了抗建工作。当年媒体报道:“王主席在短短一年零五个月时间里,因减征减少1400多万粮款收入,另外还偿还了一亿多的债款;库存

增加余额1000多万现款。这组数字最能体现他的政绩。”

王缙绪在推行新政处理积案中撤了大批的贪官,严重触犯川系实力派的既得利益;原川系实力派以为王缙绪当了省主席,还指望能得到好处,曾合伙到省政府拜见,哪知王主席严肃地告诉他们:“现在拍捧不行了,不要来这套。当军人就该上前线,在后方干什么?保安团长我已撤了五个去打日本。你们不去打日本还向我要功,我呈报委员长撤你们职!”于是三个师长怂恿七个师长联名“反王主川”。

1939年8月,正值全国的抗战转入战略攻势的关键时期,一场“倒王运动”也进入高潮。王缙绪所治理后方各项工作都已让他满意,为保全抗战后方工作正常运行与安稳,他以挽救国难为重,主动恳请辞去省主席职务,要求出川抗战。9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四川省主席王缙绪,恳请辞退主席职务,志切抗战,请缨出川,英勇卫国,殊堪嘉尚。应准王缙绪率部驰赴前线,悉力御敌。他出征期间,四川省主席职务,由委员长蒋中正兼任,任贺国光兼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

王缙绪致电所属:“今日之势,我辈若舍去出兵抗战之一途,不惟国家民族无以生存,即吾川省格与乎小小团体,亦将难保。且现在后方军人,必深负亡国之罪,纵不被国人唾骂,亦无面目以见抗日诸将士。绪已抱定坚决之决心,不问一切机构,专以集团军名义,率部出川抗敌。即使七千万人拥我为主席,我亦不屑为,弃之若敝履。惟望兄等迅将本集团军各军师旅部队,调集相当地区,加紧整顿训练,积极准备出师。……切勿瞻前顾后,国家幸甚,团体幸甚!”

“大洪山老王推磨”

5月初,王缙绪率部离蓉出川,月底到达第二十九集团军驻扎地湖北襄阳、樊城、大洪山一带。

1939年4月,日本侵略者为巩固武汉外围,在湖北随县、枣阳一线向我发动侵略攻势。日军冈村宁次拟定的作战计划是“日军决定以强有力的一部在主力发动攻势之前从大别山南麓地区突破敌军左翼,把敌人的主力牵制在这深长的东

南面,主力概由安陆及其以东地区前进,向枣阳南侧地区及该地西北地区一线突进。同时以机动兵团纵深的纵深以南地区迂回,切断向南阳方面的退路,在枣阳附近捕捉敌军的重点兵团,予以歼灭。”为了使冈村宁次的计划破产,我第五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的要求,制定的作战方针是“战区决以长久保持桐柏、大洪两山地带,以攻为守,予敌以打击”。具体兵力部署中,指示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缙绪)、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组成右集团军,担任大洪山南麓、京(山)钟(祥)公路、襄河两岸防务,置重点于汉(阳)宜(城)公路方面。并要求“竭力增强襄河东岸部队,以纵深配备,阻止敌之北上,掩护我左翼兵团之右翼”。

1939年冬,全国发动冬季攻势,二十九集团军参加第五战区之冬季攻势,协力右集团军张自忠部,拒止北进之敌。12月中旬,于襄河东岸南下攻击钟祥洋梓日军据点,占领王家店。

1940年1月,日军13师团增兵猛烈反攻,窜占长寿店、王家店,友邻部队增兵逆袭,将王家店收复。王缙绪率集团军奋勇猛攻,因敌我双方伤亡均重,形成对峙。至3月终,冬季攻势结束,二十九集团军推进鄂中京钟公路大洪山,在该区攻防作战。就在此地,日军重兵两路向我军进攻,北犯襄阳、双沟,西犯随县、枣阳。致使王缙绪的集团军总部驻地张家集受敌猛攻。王缙绪率第二十九集团军向进犯大洪山的日寇出击,坚守大洪山西北要隘。他亲冒矢石,身先士卒向敌人做外侧包围,经过数日的激战,他率部奋勇收复了张家集并向后方流水沟之敌猛烈攻击,打开通路,歼灭日军5000余人。5月1日,日军从信阳、随县、钟祥3个地区同时发动对枣阳及襄河东西两岸的攻势。5月15日,张自忠在战斗中殉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嘱王缙绪集中主力,从大洪山北上尾击日军。王缙绪指挥第44军中将军长王泽濬(王缙绪长子)所部和第67军的第161师,出板桥向日军尾击。6月,日军两路兵力在双沟会师,迅速组成几个梯团南下。44军军长王泽濬尾击日军3个师并遭到猛烈攻击,不得不向王缙绪(父亲)坚守的大洪山区及张家集方向紧缩阵地。日军第八师团长谷川,指挥南下的两个梯团,四面猛烈围攻大洪山,并派日机狂轰

滥炸。王缙绪率部顽强地固守在大洪山西麓、南麓一线与日军艰难地激战20余日,击伤日军第40师团长天谷直次郎。此战役双方伤亡惨重,仅日军将校即有10人被毙伤。王缙绪也督战负伤,在经历了武汉外围保卫战后,人员、武器损失过半,原有8万多官兵经过整编尚余5万多人(辖两个军、四个师、十二个团)。而且武器装备简陋,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多数是四川造,除161师有部分捷克式机枪外,其余是野炮、山炮、高射炮、平射炮,总司令部直属迫击炮营只有大炮四门,每炮仅配有炮弹十发;粮食补给更是十分困难,经常是“吃了这顿麦粒粥饭,不知下一顿吃什么”。由于军队现状和装备落后造成要隘失守,此后王缙绪利用山地隐蔽与日军在山区旋磨打转,数次率部对日军13师团进行反扫荡战斗,夺回了阵地。至1941年秋,日军又派飞机大炮掩护,企图夺取大洪山南麓青峰山,直入大洪山核山寺。王缙绪采取斗智斗勇与日军争夺青峰山,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坚持奋战了一年四个月,最终拖住了日寇西进,粉碎了日寇作战计划。王缙绪因此得名被称为“大洪山老王推磨”,轰动全国。

他创办的巴蜀学校是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心

1930年5月8日,国民政府任王缙绪为财政部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盐商们对新上任的盐运使例有一笔馈赠,王缙绪用馈赠贺礼10万银圆购买张家花园旧址,并实施与创建巴蜀学校计划。

1933年2月,王缙绪创办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正式开学。他将张家花园之街房地产租金全部交给校方作为办学经费。教学仪器、教具、动植物标本、挂图及史地图籍,以及校图书馆上万册图书,他另行筹款从上海购置,所有设备堪称全川乃至西南首屈一指。

王缙绪创办巴蜀学校,以实现他改变西南落后教育面貌,“创造新的教学制度,实行新的教育理想”。经黄炎培介绍聘用教育家周勛成担任校长,以及孙伯才、卫楚材、卢作孚、康心如、何鲁等教育专家主持教务,王缙绪任董事长。共同制定

“公正、诚朴”的校训,重启发和实践的教育目标,采用“手脑并用,身心互通”的方法,以“儿童本位”教育原则及“教养兼施”的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能力。几年后学校由幼稚园和小学扩展办起了初中和高中,当时在全省乃至全国就已被公认为著名的学校。

1936年,巴蜀学生的生活照片和学业成绩代表中国参加英国伦敦国际教育博览会,获得嘉奖。著名教育家、作家叶圣陶曾任学校国文教员,为巴蜀学校作词,谱写了校歌。

“七七事变”爆发后,学校礼堂挂起了大幅中国地图,书写着“国破山河在”,让全校师生警醒。

抗战期间,巴蜀校园曾是陪都重要的文化宣传教育中心,王缙绪在校内接纳和安置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还有黄炎培先生主办的“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那段时期,周恩来曾到巴蜀学校作了《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专题演讲,吸引了众多听众;黄炎培先生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巴蜀校园组织了数十场演讲;众多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宗白华、马寅初、章乃器、老舍、郭沫若、邵力子、邹韬奋、沈钧儒、陈立夫、罗隆基、潘公展、齐燕铭、田汉、翁文灏等都曾先后在巴蜀学校作过演讲。

1939年5月,重庆遭到日本飞机的大轰炸,社会局命令市区所有学校于6月底以前迁出市区。重庆巴蜀校园连续三次被日机轰炸,毁坏了礼堂、教室、宿舍以及校园,曾有六名校警被炸死。但是,巴蜀学校从没有停止抗日救国活动,坚持对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并组织军事训练,早操跑步时高唱《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学校将各班级全部以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省区命名,提示不忘收复失地之志。第一班为辽宁级、第二班为吉林级、第三班为黑龙江级等。校董事长王缙绪题赠“毋忘国耻”铭刻在巴蜀学校毕业纪念品(墨盒)上,发挥了深刻的教育意义。

当时,四川是抗战的大后方(尤以成渝两地为甚),日机轮番轰炸,无有宁日。校董事长王缙绪他明确指示“为保师生安全,避免无谓牺牲,迁校应当从速进行”。经校方决定将重庆巴蜀学校迁往四川省西充县——王缙绪家乡。据统计:学校转移物资有500多套校具(桌、椅、床)、2万余

册图书、2000多件教学用具(钢琴、显微镜、动植物标本、实验仪器)等,满满装了16艘大木船,从重庆嘉陵江运达南充,又动员上千余人,靠人力一件一件搬运到西充。

1939年9月巴蜀学校(西充)完成了搬迁和重建,校址定在西充东门外大佛寺原西充县立中学所在地,9月正式开课。

1942年,抗日战争局势变化,校长周勛成与正在抗日前线指挥作战的校董事长王缙绪通电商定,将巴蜀学校迁回重庆张家花园,保留西充巴蜀学校为分校继续开办。于是周勛成辞去西充学校校长职务携部分教师返回重庆。王缙绪将全部教学设备留在西充,继续促进西充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他电令侄女王君素(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接任巴蜀学校、西充分校校长职务。自王君素任职期间,王缙绪不遗余力地支持她继续筹资扩建学校,申报并通过了四川省教育厅批准,增办了高中。

1945年,巴蜀学校(包括西充分校)已发展成了(小、中、高)完整的教学体系,学校设有助学基金,资助孤贫学生,充实了学校图书、仪器和其他设施;又聘请了著名的教育家,集众多智慧共同谋划出严格的管理制度,确立了严格的招生制度和升降级制度,设有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经常组织各类竞赛,扩大知识境界;建立劳动观念和卫生习惯;并结合物理课学习的知识成立了无线电小组,装了一部矿石收音机,每天师生轮流值班,把电台的消息,抄写成大字报传达全校师生和民众,让他们及时了解抗日前线的战况;并且将班级和重庆巴蜀学校统一,以当时沦陷的国土省区命名,有绥远级、宁夏级、热河级、哈尔滨级等,以激励学生发奋读书,报效祖国。

自1942年周勛成校长及教师员工由西充返回重庆之后,很快在张家花园恢复了巴蜀学校正常开课。在此期间,王缙绪派请了军政商学各界知名人士到校作公开演讲,巴蜀校园仍保留了抗日救亡活动中心的地位,解放前夕,重庆巴蜀学校经校方多年的共同努力已发展成为集幼、小、中、高的完整教育体系,已占据四川教育的领先地位。新中国建立后,王缙绪将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和西充巴蜀分校捐献给国家。邓小平为此发表过指示“只许办好,不许办坏”。

民族英雄被消溶于“反右运动”洪流之中

1949年,王缙绪拒蒋去台,同年12月14日,他授意新编44军代理军长周青廷发出起义通电;王缙绪自行取消了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一路总司令职务,成立了“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简称“治总”)自任司令。王缙绪以“治总”名义接管成都。他担负起保护四川省城市的完整无损以及7000万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12月24日,王缙绪以“治总”总司令名义致函解放军四川军区委员会,表示“为了人民的和平愿望、父老的要求,不忍重苦人民,现在严率所部,勉维治安,静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编调遣”。25日,由王缙绪出面在成都召开各界各人民团体会议,正式宣布四川和平解放。1949年12月31日,贺龙率部进入成都。1950年王缙绪解除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职衔,他把掌控的军队和全部武器移交给贺龙、李井泉为首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他的部队也分别由解放军第60、62军和第7军进行整编。

早在1923年,王缙绪即在上海加入于右任等创办的“海上亭云书画社”,是第一批成员之一。他喜好书法、诗词和收藏,主要以格律诗为主,而收藏字画是其最爱,其藏品品位在当年亦属首屈一指。1949年蒋介石离开成都时,曾派蒋经国、俞济时到王缙绪家中,嘱其迅速收拾资财家小离开大陆,同飞台湾。王缙绪没有听从蒋的安排,坚持不去台湾而留在大陆,因为当时他对国民党政府已失去信心。而王缙绪的长女王泽瑜当时在香港,知其父极其珍爱自己的收藏,电告他“速携物去港”准备移民。他同样没有采纳女儿的建议,他说:“不要把我说得那么撇(忝)哟,这些文物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带出国,最后落入洋人手中”。

1951年10月10日,王缙绪将其毕生收藏珍贵文物分别(3次)向川西人民博物馆(今四川博物院)和西南博物院(今中国重庆三峡博物馆)全部捐献,他捐赠的文物现藏四川博物院的有字画23件(套)、印章100枚(主要为齐白石、曾默躬、姚石倩所刻)、瓷器8件;现藏三峡博物馆的历代

字画、碑帖395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46件、二级116件、三级233件;图书360余种,另有拓本及印谱等230种,包括《黔南丛书》、《汉魏丛书》、《惠风丛书》、《邵武徐氏丛书》、《槐庐丛书》、《湖海楼丛书》、《文渊楼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粤雅堂丛书》、《海山仙馆丛书》等。据档案记载,1951年王缙绪曾先后三次向川西人民博物馆捐赠了文物,据当时接受捐赠的工作人员孔叔苑、何域凡在“捐赠目录”中特别注明“精品字画较多”。

重庆三峡博物馆在“景仁怀德”展览前言中说:“王缙绪先生捐的300余件(套)书画,几乎全为珍贵文物。”

1957年“反右运动”初期,这位具有正义感的将军对这场运动持有不同观点,他身边故旧、好友先后划为右派,如台盟谢雪红、民盟章乃器、罗隆基、民主人士鲜英、起义将领龙云等,这些现实情况造成他很大的震惊,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回避的方式暂去香港。途中经深圳边防扣押至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随身携带物品57份“反右运动”剪报和约52万字个人日记。在此关押3年期间,既未提审定罪,也没判刑。事发后只有《四川日报》发表过“反革命分子”王缙绪“偷越”国境被捕的消息后,就再没有任何媒体作过后续报导。王缙绪在看守所内被迫与世隔绝关押3年,于1960年终因绝食死于看守所内,至今没有公正的结论。■

(作者为新华社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启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
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
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邮政编码:102488 收款人:崔秀岭

子虚乌有的“寻找伍豪启事”

○ 马雨农

说到周恩来与张冲的关系，离不开“伍豪事件”。与此相关的，还流传着一个所谓1936年4月张冲在上海《申报》刊登“寻找伍豪启事”的故事。后者一直被作为张冲与周恩来恩怨人生的转折点描写，看作是“国民党抛出橄榄枝”，派张冲秘密联络周恩来，开启国共谈判、走向第二次合作的标志性事件。都把它与张冲四年前炮制的“伍豪事件”相对应，凸显他与周恩来化敌为友传奇人生的戏剧色彩。但笔者考证发现，这个“寻找伍豪启事”的故事，实际上是个误传。

一、对这个故事的质疑

有关“寻找伍豪启事”的故事，30多年来不断被重复讲述。基本雷同的版本是这样描述的：

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忽然又刊出一则醒目的寻找“伍豪”的启事，要求被寻者见报后务必于5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某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谓有要事相商。这则“寻人启事”仍然出自张冲之手，但却不是故伎重演，而是出于民族大义，为国共合作之计。

……启事登出后，张冲便派员昼夜守候在这家酒店的房间里。鉴于几年前的教训，中共经慎重考察，几经曲折，终于由潘汉年出面与张冲取得了联系。潘汉年与张冲及陈立夫等在上海、南京经过多次接触，商谈了有关国共合作的问题，取得了一定的谅解。

这类文章，抄来转去，大同小异。但近年来，在继续重复中，出现了颇为离奇的演义。2011年6月，一本记述张冲的新版书，以“寻找伍豪”作为首章开篇，这样写道：

1936年4月，上海。

内乱与外辱，让岁月变得阴冷。

一天，上海第一大报《申报》忽然在显著的位置，刊登了一条醒目的“寻人启事”。

寻人启事：

伍豪兄，家有要事相商，请见报后，务必于5月5日，在北四川路新亚酒店24号房间，与吾一晤。

黄毅

第二天，《时事新报》、《时报》等多家报纸，也在同样显著的位置，刊登了相同内容的“寻人启事”。

这则寻人启事，马上引起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陈云等人的警惕。他们买来各种报纸，密切关注动态。黄毅是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寻找伍豪呢？

……

陕北，风雪交加，乍暖还寒。

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份紧急情报，秘密送到陕北瓦窑堡。……

周恩来仔细看过“寻人启事”的内容后，不禁皱起了眉头：这则“寻人启事”似曾相识，估计来者不善。经过分析，周恩来推断，这则启事，是出自国民党特务之手。……

如周恩来所料，1936年4月这则“寻人启事”，正是出自国民党特务之手。其策划人也即启事落款人黄毅，正是张冲。

但是，今非昔比，4年后，张冲如法炮制的这则寻人启事，却并非顾顺章事件的延续，而是另有玄机。实际上，这则寻人启事，是他奉陈立夫之命，放出的一只探测性气球。……目的是主动议和，所图的是联合抗日的大计。……

启事刊登后，张冲派人在约定时间地点，开始“守株待兔”，昼夜守候在这家饭店。但是，一周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两周过去了，共产党这边仍没有任何消息，张冲明白，前方还在追着共产党的军队打，后方却要约人家见面，这里面的玄机，谁又能搞清楚呢？这种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正当张冲抓耳挠腮无计可施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1936年5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

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声明愿意与一切进攻红军的武装部队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而这一天,正是张冲带领国民党特务,在约定的地点,焦急地等待中共的人员来接头的时刻。伍豪虽没有出现,但共产党却似乎接过了国民党抛出的橄榄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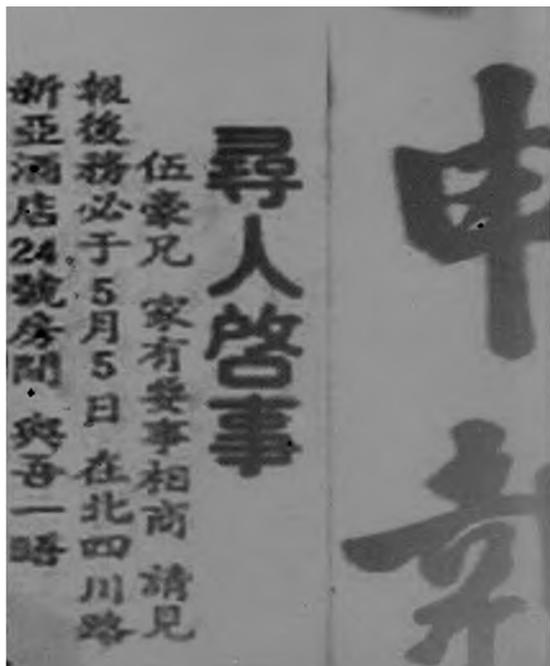
以上写得活灵活现的故事,基本上沿用了流行多年的“寻找伍豪”传闻,所不同的是,作了具体化的描写,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但是演义愈甚,漏洞愈多。为了澄清事实,探寻真相,笔者的质疑先从这个“寻人启事”说起。

为了显示“寻找伍豪”煞有其事,该书的封面上特意刊有一个《申报》上的“寻人启事”图片(见图一)。但此件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明显的造假痕迹。

第一,标题“寻人启事”四个字,用的是圆角体。这种字体,是报纸采用电脑激光照排后才有的,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在30年代的《申报》上,绝无可能会有此字体。

第二,启事正文用的是楷体字。这有悖于当时《申报》均以宋体为正文的惯例。

第三,尤为失范的是,文中“24”两个数字,竟是横向排列的,完全违背了当时的常规常识。那个年代,国人都竖写行文,日期、数字一般均以



图一



图二

“五月五日”、“二十四号”来表示,罕见用阿拉伯数字的;即使要用,也往往是旋转90度来书写。

第四,启事的版式、每行的字数等,也与《申报》时行的规范、风格大相径庭。笔者摄有1936年5月4日《申报》的广告版(见图二),读者参照对比,即可鉴别。

上述的引文,都言之凿凿地声称“1936年4月的一天”,张冲在《申报》刊登了“寻找伍豪启事”,却从未见有人具体指明,这个启事刊登在《申报》4月份的哪一天、哪一版?更没有出示过真实的广告,以作实证。这是为什么?

二、“伍豪事件”与“寻找伍豪的启事”

事情还得从张冲其人说起。

张冲(1904-1941),字淮南,又字怀南,浙江乐清人。幼年丧父,家境平常,但天资聪慧,好学上进,从小就有心忧天下、报效国家的远大志向。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张冲中学时代就积极投身爱国运动,在温州组织发起成立“醒华学会”,当选为理事会主席,成为温州中学生的领头人物。1923年中学毕业,考入北京交通大学俄

语专修班学习。1925年加入国民党。同年,晋升到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继续深造,后又转学中俄法政大学改修经济和法律,期间曾到苏联游学。1927年5月,时任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的张冲,在从事秘密党务活动时,被奉系军阀逮捕入狱。后经中学同学郑异等通过蒋介石、陈果夫等人救助,终于在东北易帜后,于1929年初获释出狱。从此,张冲与蒋介石和二陈结缘,进入了他们的人脉体系,成为CC系的一员干将。

张冲一生经历奇特。他曾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的二号人物,参与过顾顺章案、牛兰案等重大事件;也曾是民国电影事业的主管者,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开拓者。1935年11月,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时年31岁,是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委之一。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密使,张冲受命担负联共、联苏的特殊使命,在西安事变后与周恩来、叶剑英等进行谈判,为促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牵线人。抗战初期,他出使莫斯科,密会斯大林,为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建有殊功。回国后不久,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中将处长。1941年4月,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副部长。8月11日,在重庆不幸病逝,年仅38岁。

蒋介石亲赴张冲追悼会祭奠,致挽联:“赴义至勇,秉节有方;斯人不永,干将沉光”。周恩来也赴会吊唁,含泪致辞,致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并在当天的《新华日报》上发表《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作为代社论,深切缅怀、高度评价张冲的为人品德和历史功绩。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邓颖超七人联名送挽联:“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朱德、彭德怀送的挽联是:“国土无双斯人不再;九原可作万里相招。”国共两党的领导人这样高规格地共同悼念一位国民党人,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也表明张冲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的特殊地位。

张冲在“中统”时间虽不长,但能力超群,为这个特务机构做了不少事情。期间,让周恩来一

生蒙冤的“伍豪事件”就是他一手策划的。起因是顾顺章叛变后,他带人到上海搜捕周恩来等中共要人,都扑了空。后来见中共处于困境,就心生一计,企图以这个谣言来制造“骨牌效应”,招来更多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自首投诚。1932年2月16日至21日,由他一手炮制的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等报纸相继刊出,此即为“伍豪事件”。但由于中共上海地下党及时予以反击,迅即在《申报》上作出辟谣举措,张冲的阴谋未能得逞,他所伪造的这个“伍豪启事”,也未起到什么作用。中共中央在2月下旬,还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公告,揭露此事“纯系国民党的谣言”,为早在上年12月就已到江西苏区的周恩来,作出公开澄清,从而了结此案。

张冲与周恩来并无宿怨。他与周恩来虽分属两党,政见不同,但在民族危亡之际,却能捐弃前嫌,在抗日救国的大义上,存异求同。所以,后来他作为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在与周恩来的频繁交往中,建立起了难得的公谊和友谊,留下了两个阵营对手化敌为友、共赴国难的传世佳话。

上述后一个“寻找伍豪启事”,被认为是张冲奉命寻找周恩来,开启国共谈判的前奏曲,如若确有其事,与当年“伍豪事件”的启事前后对照,当然极富传奇性,也为张冲与周恩来的恩仇人生,架筑起一个绝妙的戏剧结构。但是,历史的真相未遂人愿。

三、查无实证,更无可能

笔者在撰写《张冲传》时,原本是照此传闻去搜寻史料的。但查阅了1936年4月至5月的《申报》,结果始终找不到这样的“寻人启事”。不仅在“显著的位置”没有,就是不显著的版面上也全无踪影。失望之中,顿生怀疑,进一步查证才恍然大悟:原来子虚乌有!不仅查不到实证,而且根本没有这种可能。且看事证:

一、蒋介石为实施联苏抗日的策略,曾在1935年12月24日派陈立夫和张冲秘密出访欧洲,准备在时机适当时前往苏联,与苏方谈判签订中苏军事同盟。后来因条件不具备,秘密又为



1937年春,张冲与周恩来、叶剑英在西安谈判时合影。童小鹏 摄

日本间谍发现,计划就此夭折。张冲和陈立夫在欧洲滞留了3个月,直到1936年4月中才奉命回国。两人从匈牙利布达佩斯启程,分途返回,路上行程约一个月左右。陈立夫回国的时间是6月初,张冲回国的时间在5月底。因此,在4月底5月初,张冲和陈立夫都还在归国途中,根本就不在国内,不可能有上述的故事发生。

二、蒋介石当时为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自1935年11月起,就秘密派遣三路密使,打通与中共的联系。其中两路均由陈立夫属下的CC系要员、铁道部次长曾养甫负责,他联络到了中共北方局的周小舟和长江局的张子华。到1936年4月间,曾养甫已经通过张、周二人,与陕北中共中央建立了联系,并已收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直接来信。在这种情况下,同受陈立夫调遣,同是CC系要员的张冲,怎么还需要刊登这样的“寻人启事”,漫无目标地去寻找根本就不在上海的伍豪?这是有悖常理的。

三、当时,同共产党秘密联络之事,是蒋介石的最高机密,他要求“绝对严守秘密”。据曾养甫介绍,“有一次,他向蒋报告同中共接触的经过,正谈话间,陈布雷进来了,蒋立刻顾左右而言他。”蒋介石一再嘱咐曾养甫,要“特别谨慎”。(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这样“通共”的惊天大事,既然连贴身心腹陈布雷都

不让知道,难道蒋介石会让张冲把“寻找伍豪”的启事刊登到报纸上去广而告之?明言声张几月几号在酒店约会?伍豪就是周恩来,这在当时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1931年11月29日,国民党在上海《时报》等一些报纸上刊登对周恩来的通缉令,其中就公开告示:“共党有名伍豪者,即周也。”如果刊登这样的寻人启事,岂非公开泄密?

事实足以说明真伪。所谓“这则寻人启事,是张冲奉陈立夫之命,放出的一只探测性气球”,是“国民党抛出的橄榄枝”云云,纯属臆想。此外,上述故事中还有一些说法也全无依据,当属编造:

一曰:“这则寻人启事,马上引起中共地下党组织陈云等人的警惕。他们买来各种报纸,密切地关注动态……”

——其实,陈云那时根本不在上海。他在1932年12月底,就去了江西苏区。此后参加了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为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受中央派遣,与潘汉年在9月间到了苏联。从1935年9月到1937年4月,陈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一直在莫斯科。何以有了分身术?

二曰:“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份紧急情报,秘密送到陕北瓦窑堡……”

——上海地下党当时遭受严重破坏,不仅组织尚未恢复正常,红军长征后也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中共中央是在1936年4月中旬才决定委派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上海,以恢复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冯雪峰是6月中旬到上海后,才与地下党取得了联系。5月初何来如此联络热线?

三曰:“张冲带领国民党特务,在约定地点,焦急地等待中共人员来接头的时刻……”

——张冲早在1934年就脱离了“中统”特务机构,转到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门主管电影事务。1935年12月后,张冲的正式身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宣传部电影事业处处长,正受命作联苏联共的秘密特使和谈判代表。这样

“议和”的“接头”，又不是抓人捕人，为何要“带领特务去”？事实上，由于使命重要、事属机密，张冲此后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潘汉年等人的交往时，除了偶尔有他的助手杜桐荪参与外，基本上都是独往独来的，很多事情连他的秘书朱开来都一无所知，更不要说“带领”什么“特务”之类的人物了。

四曰：“我党经慎重考察，几经曲折，决定由潘汉年出面与张冲联系。”

——潘汉年当时是奉共产国际之命，由莫斯科回国来与国民党接头的。那时，他与中共中央根本还没有接上联系。何来“我党慎重考察”？

既查无实证，又没有可能，演义漏洞百出，就是这个故事的真相。

四、错讹从何而来？

既然如此，这个错讹之说究竟从何而来？

笔者深入查究发现，最早出现应在1976年9月，源于张冲当年的秘书朱开来先生悼念至交好友孙桂籍的一篇文章。文中讲到他和孙桂籍在抗战爆发后，到汉口找到张冲时的情景说：

这时我才知道张先生不但担任对俄外交工作，而且奉命担负对中共谈判的机密任务。故总统蒋公在《苏俄在中国》第73页说：“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随即由周恩来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

当时，张先生在上海申报曾刊登大幅广告，找寻“伍豪”（按“伍豪”即为周恩来的化名），请“伍豪”到上海北四川路新亚饭店晤谈。

（朱开来：《哭孙桂籍兄兼忆张怀南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29卷第3期。）

朱开来这里首次讲到，张冲在申报“刊登大幅广告”，“找寻伍豪”。他依据的是，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一书所说：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五月，”周恩来、潘汉年“到上海与张冲会商”。

但经查证，蒋介石书中此说是错误的。1936年5月，根本就没有周恩来、潘汉年与张冲在上海会商这回事。张冲受命参与国共谈判，确实身负秘密与中共联络的使命。但他与潘汉年的首次接头会面，是在1936年7月，地点在香港。张

冲与周恩来的会谈，最早是1937年2月，地点在西安。周恩来在1936年从未到过上海。

张冲到香港与潘汉年秘密接头时，倒是有过类似的故事。他到香港后，按照潘汉年事先约定的方式，在7月7日至9日的《生活日报》上连续三天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潘汉年此时化名为萧叔安，张冲则化名黄毅。

笔者推测，朱开来先生写此回忆文章时，事隔40来年，可能是记忆有误，把张冲在香港所做的事情，错移了地点、人物和时间。他依据蒋介石此书的错误记述，来与自己的错误记忆对接，便引出了这个所谓“寻找伍豪启事”的讹传。

笔者见到，这个故事，朱开来先生在此后的多篇文章中都有叙说。张冲的助手杜桐荪先生等也曾在撰文时引用转述过。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台湾有名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此说，大概因此而流传。

朱开来先生曾任张冲的秘书多年，与张冲相知甚深，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1987年张冲逝世46周年时，不顾年老体衰，抱病奔走各图书馆，搜集资料，写成了怀念先贤的长文《悲剧时代英雄：神秘人物张冲》。朱先生贡献至伟，精神更令人感佩。但即便如此，也难免会有疏漏之处。人的记忆往往会有偏差。就是亲身经历的事情，几十年后再回忆，难免也会出错，更何况是传闻。

事实证明：所谓张冲在上海《申报》刊登“寻找伍豪启事”，当属误传。

内地对张冲这个历史人物的介绍，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这之前，只是一些有关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著作、文章偶尔提到他，并无专门的文章介绍其生平。改革开放后，禁区渐开，报刊上陆续出现一些回忆、纪念张冲的文章，有了一些涉及他的纪实作品，但有的材料几经转手，颇多差错。其中有关张冲刊登启事“寻找伍豪”的故事，可能就引自台湾朱开来先生的文章。

但愿这个误传了30多年的故事，就此得以纠正，不使演义愈演愈烈。

（本文系作者根据其新著《张冲传》有关内容改写。《张冲传》由团结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中原突围：四位女性的人生

○ 乔海燕 傅 苓

抗日战争胜利后，武汉成为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进军华东、华北和南下湘粤的枢纽。但此时，就在武汉的上风口，鄂豫皖边界，有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原解放区。在日军投降前，中原军区的部队已发展到两个纵队、3个独立旅、3个军区，共6万余人，根据地也扩展到60多个县。显然，这支武装力量对武汉形成了一种战略态势。

中原解放区成为武汉这个卧榻之侧伏着的一只虎。蒋介石先后调集部队，加紧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企图消灭中原军区的部队，打通国民党军向华东、华北进军的通道。

1946年5月，国共双方代表虽然就中原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签订了《汉口协定》，但国民党军队的小规模进攻与蚕食并未停止。至6月，国民党军队已将中原军区的部队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的一条狭长地带，中原解放区的面积也被压缩到只及原来的十分之一。为了避免内战，中共中央多次与国民党谈判，表示愿意让出中原解放区，将部队转移至其他解放区去。但蒋介石却加紧调动部队，至6月下旬，蒋介石用于包围中原军区的兵力已增至10个整编师，近30万人。

1946年6月中旬，蒋介石任命刘峙为进攻中原解放区的总指挥。刘峙限所属部队于6月22日前完成对中原军区的包围态势，26日开始围攻，7月1日发起总攻击，计划在48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中原军区主力。

此时，中共中央已经同意中原军区的突围计划，该计划是，主力向西突围，经伏牛山北渡黄河到太岳；万一不成，即在武当山、伏牛山、秦岭打游击；必要时转至甘（肃）南创建根据地，或到陕甘宁边区会师。具体部署，由皮定钧率一纵队一旅向东突围，造成主力东进态势，以迷惑敌人，转

移敌人的视线；中原军区的主力则分为南北两路向西突围。

6月23日，中央复电中原军区，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随即，中原军区命令部队从26日开始秘密集结，抢在国民党军发动总攻击之前，按预定部署于29日冲破国民党重兵封锁的平汉线，实行战略转移。这样，以中原突围为起点的全国解放战争便开始了。

30万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围剿中原军区的6万解放军，其中还有不少后勤人员、学生、家属，其结果可想而知。这是一场惨烈的战役，突围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遭受很大损失。

本文所讲述的四位姑娘，黄琪、李薇、陆方、孙卉，便是参加中原突围的“中原民主建国大学”的学生。



孙 卉(王慧娟)

中原民主建国大学是中国共产党1946年春天建立的,校址选在现在的湖北大悟县宣化店附近。这所学校成立的背景是当时正在进行的国共合作的谈判,更深层的背景则是中共“七大”制定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建立民主新中国”的建国方针。“民大”成立仅三个月,形势紧张起来。国共合作谈判破裂,“民大”随即停办。同学们有三个去向可以选择:第一,少数身体不好的人,还有女同志,可以随伤员乘火车撤退到华北老根据地,据说,这是周恩来根据北平停战协议亲自向国民党当局交涉来的条件;第二,少数有比较可靠社会关系,化妆回国统区潜伏隐蔽,待机而动;第三,大部分人都被分配到战斗部队,担任文化教员、秘书等工作。

黄琪、李薇、陆方、孙卉四个姑娘表示坚决随部队行动。她们被分到中原军区一纵队文工团。在突围前夕,她们又被分配到战斗部队,随部队行动。

先说黄琪。黄琪原名黄辉蓉,1925年出生在北平,是燕京大学外语系学生,因为她个子瘦小,头发有些发黄,燕大同学都称她“黄毛”。

据与黄琪相识的同志介绍,黄琪是在1945年从大后方徒步到中原解放区的,一路上风餐露宿,艰难跋涉,还要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黄琪体力虽然不好,总是挣扎着向前赶路,从不要别人帮忙。

中原突围前,黄琪从一纵队文工团分配到战斗部队的团部做秘书,随部队突围后,她又分配到鄂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做秘书。

中原突围的解放军部队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进入鄂西北的深山老林后,蒋介石仍严令部队尾随进击,多次组织大规模搜山、围剿,欲将突围、失散部队斩尽杀绝。

到了1947年,形势愈加紧张。三军分区虽经常变换驻地,还是经常遭地方保安队和国民党军队的袭击。1月中旬,军分区驻地又一次被敌人发现,敌人派出正规部队围剿。22日早晨,枪声响了,敌人包围了军分区驻地。部队马上组织突围。黄琪和战士们一起冒着枪林弹雨向包围圈外面冲去,她已经冲到一座山冈,再往下,就可以冲出包围圈了。这时,一颗子弹打中了黄琪的左腿,她跌倒在山冈上。四周没有一个自己人,

她手里也没有任何武器。敌人看见一位中弹的姑娘倒在雪地里,号叫着围上来,想活捉黄琪。

黄琪没有任何惊慌,也没有任何恐惧,她心里十分清楚,如果被这些国民党士兵俘获,等待她的是什么。她下定了决心,宁死也不能被俘,宁死也不能受辱。她倒在雪地上,赤手空拳与冲上来的国民党士兵肉搏,用手撕,用拳打,用牙咬,用尽全身力气,拼死挣扎、搏斗。国民党士兵残暴地杀害了黄琪,砍下她的头颅,挂在树上。黄琪的鲜血染红了白雪,

一个月后,鄂西北军区的部队与一股敌人有过一次战斗,缴获一名敌军排长的日记本。日记中写到:围剿他们几个月了,在深山老林中周旋;我们许多人都被拖垮了;到处找不到他们,又到处有他们;好不容易有机会包围了他们,又逃走了,只打死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竟敢搏斗,真不怕死,不可思议……

四个姑娘中的李薇,在突围后的人生经历,却有着一番与众不同、可叹可惜的遭遇。

李薇原名刘钦瑜,四川江津人,1942年入复旦新闻系,1945年春天到达中原解放区。中原突围后,随部队进入鄂西北深山中。

1946年10月间,李薇在湖北房县一带活动,身染疟疾,又加上妇女病缠身,实在不能与部队一起行动,只好被留在当地老乡家休养。等到她身体基本复原时,部队早已不知去向。她曾几次想返回四川,想通过复旦大学同学的关系,继续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但是,从鄂西北的深山走出去,再走到四川或者其他解放区,几千里崎岖山路,一路上还有蒋军和土匪的层层关卡,她一个单身女青年,很不安全,也几乎不可能。考虑再三,她只好留在当地。

李薇在当地停留时间长了,身份也基本公开,她在穷苦百姓中宣传革命道理,许多老乡都知道这个“新四军婆娘”。地方保安知道后,就到处抓她,还放言:以后发现这个新四军女人,就地格杀勿论。

险恶的处境,李薇知道不能继续在老乡家隐藏了,为了不连累群众,她住进了没有人烟的深山,在山洞里度日。全国解放后,曾在当地担任过县委书记的刘瞻介绍李薇的情况说,李薇当时的生活苦不堪言,有将近一年时间在深山度过,

根本没有粮食,长期吃不到盐,只是用糠稗、野菜充饥,头发全白了,与“白毛女”一模一样。

尽管如此,当地还是有一些知道李薇的老乡,同情她的遭遇,偷偷接济她。这其中就有一个叫贺长运的农民,时常来帮助她。李薇与贺长运在患难中有了感情。1947年底,两人在一个山洞里举行婚礼,结为夫妻。当时,洞内虽有几分温暖,洞外却是寒风怒号。

1948年春天,李薇与贺长运曾经试图穿越大巴山回四川,半路还是被当地政府的保安队抓住。两人逃脱后,只好又回到原地,仍栖身湖北房县的黄龙山。

但是,由于李薇的行迹已经暴露,当地保安队加紧对她的搜捕,在房县居住已经很危险了。李薇听当地老乡说,解放军已经到了300里外的均县,于是,她与贺长运跋涉几百里,来到均县。到了1948年年底,均县解放,李薇才找到当地中共县委。她先是在县委做民教、妇女工作,后又调进报社,开始新闻工作。贺长运则被安排在当地的书店工作。

李薇又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往——俱往矣!那些“坚壁”的日子,常人无法想象的身体和心灵都痛苦不堪的日子!

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解放军已经开始准备入川,大批干部也将随军入川。李薇与贺长运都被调到四川干部大队。部队行军到湖北襄阳,贺长运心神不定,他深恋故土,不愿意离开家乡。但是,革命队伍是李薇的生命所系,她必须跟着自己的队伍,跟着解放军向前进。这在当时是无法调和的矛盾了。两个在患难中结为夫妻,共同生活了一年多的人,就这样分手了。两人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李薇也只能忍痛留给贺长运,留在鄂西北。

1949年以后,李薇长期在四川省妇联工作。到了是非颠倒的文革期间,她在鄂西北深山艰苦卓绝的经历,本来是一段异乎寻常的光辉经历,是一个革命者的传奇,却成了她的“罪状”!在为人民解放,争取民主共和国,与封建专制做殊死斗争的年代,无论怎样的苦难她都可以忍受,可是,在宣称人民已经当家做主的年代,却以“无产阶级”的“大革命”的名义,蛮横地把屈辱加在她身上,年复一年地折磨她,迫害她。在国民党的

迫害下,她能忍受,现在,她再也忍受不住了。在成都郊外的五七干校,在一次挨斗受辱后,路过一条河时,趁旁人没有注意的瞬间,她纵身跳进奔腾的河流,结束了坎坷的一生。

四位姑娘中另外两个,孙卉与陆方,自突围起,两人始终在一起。其中的孙卉,还是我们的小姨。

孙卉,本名王慧娟,生长在富裕家庭,家里在河南鹿邑县有良田、庄院,在郑州德化街有连片的商铺与房产。1942年,小姨还在郑州念中学,那时郑州已经沦陷。她的姐姐,即我们的母亲王静娟,从西安写信给她,叫她到西安读书。小姨是她唯一的妹妹。小姨接信后,毫不犹豫离家出走,只身来到西安,进兴国中学念书。在兴国中学期间,小姨开始参加革命工作。

兴国中学毕业后,小姨在西安图书馆工作,后追随革命,去了重庆。

1946年初,小姨与一批青年学生响应中共的号召,从重庆来到鄂豫边区。她先在七七报社工作,后又进入中原民主建国大学学习,满怀着理想与憧憬,准备迎接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民大”建立仅仅三个月,形势紧张起来。国共合作谈判破裂,“民大”随即停办。小姨与几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中原军区一纵队文工团。小姨是个漂亮姑娘,那年才22岁,正值青春年华。富裕的家庭以及所受的教育,使她具有很好的个人品性与文化修养。小姨平时说话不多,但她多才多艺,唱歌、唱戏、话剧、乐器,又能写,又会画,还能下厨做一手好面食,很为几个有才华的男生心仪,是暗恋的对象。其实,小姨在重庆曾经有过一个男友,两人感情很好。男友叫王先民,也是热血青年。可惜,王先民在一次国民党特务制造的沉船事故中遇难,在小姨心中留下难以弥合的伤痛。

中原突围前,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形势越来越紧张。为突围,文工团解散,小姨被分到三旅七团,随部队行动。小姨这时候虽然穿上了军装,毕竟还是学生,既无战斗经历,更无军事常识。

1946年6月25日,中原突围战打响。

小姨随突围部队日夜行军,进入鄂西北的万山葱岭中。此时已到1946年年底,隆冬时分,大家全是单衣单裤,境况愈加艰苦。

过了1947年元旦,大雪封山,天寒地冻,小姨这时正患病疾,部队决定她与陆方一起,留在当地“坚壁”,野外谋生,自寻出路。无奈之下,陆方带着小姨离开部队,东躲西藏,苦苦度日,最后消失在茫茫大山里。

上世纪50年代,当年与小姨共患难,以后幸存下来的陆方,遇到西安兴国中学时的同学宋琚(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向宋琚细说了小姨牺牲的情况。

按陆方的叙述,她与小姨所在突围部队曾被国民党军冲散,两人在大山里辗转数日,遇到鄂西北军区二军分区的一支部队,又随他们行动。此时天降大雪,部队为不被敌人发现,专拣荒山野岭驻扎,又远离山村,所以根本没有粮食。部队要求小姨和陆方就地“坚壁”,说要“保存自己,随时与部队取得联系”。

无奈之中,陆方带着小姨离开部队。离开部队后,陆方与小姨曾商量,当时她俩有两条路,一是摸出包围圈,走出大山去寻找部队。陆方说,孙卉离开部队后,患病日重,身体非常虚弱,我不能抛弃她不管,自己走。第二条路是就地隐蔽,再设法与部队取得联系。两人商量结果,决定采取第二个办法。

陆方说,我们两人脱下军装,换上便服。可是,从口音神态,言谈举止,很容易辨别我们不是当地农民,而是突围过来的新四军。蒋军和地方反动政权日夜清乡搜山,到处捉拿流落在敌后的新四军。我们俩只好在十分偏僻的荒山野岭中寻找略能避风避雨的山洞暂时安身。下山去当然十分危险,可是藏在山上却无法生存,我们只得冒险试探着躲开敌人,到山下的村子里,悄悄到贫苦老乡家买点食物,探听一下情况,试探着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在村子里隐蔽。在村子里不敢多逗留,找一两个看起来老实的农民探探口气,买点吃的,就赶紧回山洞。这里不是根据地,没有群众基础,没有人敢收留我们。我们两个女孩子,只能在山洞里互相依偎着,度过一个又一个凄苦的长夜。无依无靠,无医无药,无火无灶,冷食冷水,野菜野果,缺营养,不卫生,孙卉的病越来越重,发烧不止,拉痢不止,再也无力与我一块行走。我只能把她自己留在山洞,单独一人下山寻食。

陆方说,孙卉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发烧发冷,四肢疲软,根本起不来。我们俩不敢在一个山洞久住,经常转移,寻找可以隐身的山洞。在转移到第四个山洞时,她终于支持不住了,年轻的顽强的生命之火渐渐熄灭。眼看着相依为命的战友在自己的怀抱里痛苦挣扎,渐渐停止呼吸,当时我的感情似乎麻木了,流着泪,却不知道悲痛。我把再也不会醒来的孙卉放在山洞里,擦干眼泪,独自一人茫茫然走到山下一个村子里,找到一位好心的农民,帮助我在山坡找到一块比较适宜的地方,用树枝、石块和双手挖了一个坑,手指都磨出了血,也不觉得,把孙卉抬到那里掩埋了。

当时陆方记下了掩埋小姨遗体的具体位置,记下了那位帮助自己的老乡,还记下就近处村子的名字。

陆方随即被当地民团抓捕,关在县看守所。后多方托人,才被释放出来。后来,她又辗转到解放区,重新参加工作。

陆方,原名陆菊如,原籍苏州,抗战前随父母到了西安。陆方的父亲是中旅西北分社的负责人,西安西京招待所的总经理,家里比较富裕。陆方在西安兴国中学毕业后,考进武汉大学。1945年夏天,还差一年就要毕业,她却放弃学业,到了中原解放区。中原突围前,本来她的条件比较适合回武大继续念书,但是,陆方认为自己出身富裕家庭,需要在艰苦环境中锻炼,下决心随部队参加突围。

与陆方同在西安兴国中学念书的宋琚回忆,陆方初进兴国中学时,满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和追求自由民主新社会的理想,对国民党当局抗日不力、法西斯统治十分痛恨。学校生活十分艰苦,有时候连青菜叶也吃不上,有一小碟辣椒,甚至一小碟咸盐,就是副食了。陆方在西安有一个富裕的家,她父亲当总经理的京西招待所,是当时西安最高级的宾馆,房间有抽水马桶和席梦思,她家就住在招待所里。但陆方很少回家。她性格内向,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却在悄悄锻炼自己吃苦耐劳的能力,准备将来投入到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她的哥哥姐姐们衣着光鲜,她却只穿一身灰土布制服,有时甚至穿草鞋,从家里进出。

陆方和孙卉被“坚壁”后,孙卉病逝,陆方也被

当地保安抓住，关进兴山县看守所。陆方在看守所托人给家里捎信，告诉自己被关押的地方。家信辗转到了陆方父亲手中，家里即商量叫陆方的大嫂傅倩前去解救。傅倩说，我到了兴山县看守所，很快就看到陆方，她睡的是不到一尺宽的木板，没有枕头和铺盖，穿着满是虱子的土布短衫，破烂不堪，一条单裤，露着膝盖，鞋子露着脚趾头。傅倩见小姑子出身温柔富贵乡，此时简直像个叫花子，忍不住哭出声来。陆方当即喝声，叫大嫂不要哭。傅倩说，我知道她的脾气，很硬气的，平时沉默寡言，为人正直豪爽，待人厚道，我很尊重她，喜欢她，听她这么一说，我就不哭了。

陆方被解救出狱，回到南京家中疗养。此时，她五内俱病，满身创伤，光蛔虫就打了很长时间。

后来，陆方找到地下党，重新参加了工作。全国解放后一直在湖南省团委工作。

谁知躲过了敌人，却躲不过自己人。自上世纪50年代起，政治运动频仍，陆方就因为中原突围时被部队留在当地“等待解放”，却屡屡遭受不白之冤。百般求证不得，怎么解释也无人相信。家庭、亲人又受株连，为此遭受的苦难，绝非几页回忆能尽诉。到了文革中，又是因为这段历史，陆方竟被关押进监狱，受尽折磨，以至于最后含冤自尽。

待到尘埃落定，各人大限所至。四位姑娘，两位死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两位死于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

得到小姨牺牲消息的宋琤，恰好是我们的母亲王静娟的好友。她立刻把从陆方那里听到的消息告诉了王静娟。

但是，当一切都逐渐清晰时，正是人们开始糊涂时。

自从小姨离开重庆奔赴鄂豫边区，将她从家里带出参加革命的姐姐王静娟，很长时间得不到她的任何音信，无从知道她的下落，内心承受很大的压力。可以想到，自己的亲妹妹，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自己把她从衣食无忧的富裕家庭带出，有心叫她参加民族解放事业，走上建设民主国家的革命路，谁知领上的却是硝烟弥漫的战场，以至不知所终。那是一奶同胞的妹妹啊！她心里的煎熬可想而知。

中原突围战役结束，部队受到损失的消息在

悄悄流传。王静娟就听说妹妹可能遇难。但是，她在何处牺牲？遗体掩埋在哪里？临终的情况又是怎样？是不是有人在身边？没有丝毫音信。

前面曾经提到过，王静娟的家庭，是个有偌大资产的富裕之家。这样的家庭虽然出了叛逆，走出几位跟随中共革命的战士，但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为当时政权服务的人。1949年以后，新政权以“镇反”手段清算旧政权，以运动的形式铺天盖地进行。在不由分说、无从申辩的情况下，王静娟的家庭中有成员被镇压。从此，这个家庭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在历次政治运动、清查运动中，都被列为打击对象。这就给那些背叛了这个家庭的人，给那些放弃了财产和舒适的生活，将自己的青春、热血献给为穷人翻身解放而奋斗的人，如我们的母亲王静娟，增加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本应该寻找小姨的下落，将她应得的荣誉和光荣写进革命历史，却因为自己家庭遭遇，不敢放手打听，在心中的不解、迷茫面前止步，悄悄关上了寻找的大门。

现在的人看影视剧，以为那时候富家子女参加革命，就是喝红酒，穿貂皮大衣，西装革履，开飞车，男欢女爱。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革命，说起来是一套，干起来又是另外一番情景。那时候，富裕人家的子女参加共产党，献身推翻当时政权的革命，不仅要面对亲人的责问，昔日同窗好友的追杀，自己的心里还要承受很大的负担。这种负担，一方面来自革命阵营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瞬时间就能转为血淋淋的人头落地，或牢狱之灾；另一方面的心理负担，就是自己对革命的理解。这种理解也随着革命队伍内部残酷无情的斗争，形成很重的迷茫。

到了1949年以后，随着各种政治运动层次展开，这种心理负担逐渐形成了一种自我封闭，所有的愿望都被深深埋在心底。我们的母亲王静娟亦是如此。由于富裕家庭出身，由于出身的家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株连、冤案的伤害，因为担心和惧怕，因为不解和迷茫，也为自己的家庭，丈夫、孩子担心，怕受到牵连，所以，王静娟只能将对妹妹孙卉的思念藏在心底。

这一藏，就是半个世纪。

到了本世纪初年，王静娟的好友宋琤与何燕凌夫妇，在撰写《红岩儿女》一书时，又一次查寻

到陆方的下落,那已经是她不屈的冤魂了。陆方文革期间被关押在湖南某监狱时,写了一份自述材料,详细叙述了她和孙卉两人辗转神农架荒山野岭间的情景。其中有小姨牺牲的地址:兴山县坪水乡村龙潭村;还有那位帮助她掩埋小姨遗体的农民:牛明松。

宋琤与何燕凌夫妇看到陆方的狱中自述,将材料复印下来,交到王静娟手里。

这样,我们开始寻找小姨最后的足迹和牺牲地。

我们手头还有一条线索,就是陆方提到的,她与小姨最后一个藏身的山洞,那个山洞离小姨遗体掩埋地不过十数米远近。

经过多方面探寻,我们得知龙潭村已经不属于兴山县,划归到神农架林区的新华乡。陆方留下那位与她一起掩埋小姨遗体的农民牛明松,也被新华乡一位公安派出所所长从户籍本中找到。

我们很兴奋,从武汉开出一辆越野车,直奔神农架林区。

到达新华乡的那个晚上,车似乎迷了路,在黑黢黢的大山里绕圈子。当车停下找寻路标时,我们下车,侧耳听着呼啸山风;眼见一片黑压压的竹林在风中翻滚、摇动;黑沉沉的天幕,隐约露出几颗星;再远处,一声凄厉长鸣,似乎是夜鸟或野兽的嗥叫。我们不由得想到60年前的小姨与陆方,两个年轻的姑娘,虽说她们被激情和信念指引,怀着理想走上革命之路,但在这样的黑夜,在这样的环境下,她俩无果腹之食,无御寒之衣,耳畔是风啸、狼嚎,眼前是茫茫黑夜,她们什么都

没有了,只能相互紧紧依偎。在这种情况下,她们的理想还存在吗?她们还会用激情、信念相互鼓励吗?

当我们找到龙潭村,向当地的一位农民讲述小姨六十年前参加中原突围,因病在当地逝世。那位农民连声说,有……有这个人!他说,当地人过世,都用棺木埋葬,外来的过路人去世,就地掩埋,没有棺木。他说,他家的承包地上,曾经见到过有人的尸骨,他父亲曾交代说,这是一个新四军埋在这里。父亲还说,新四军是病死的,个子比较矮。可见是小姨了。说完,那个农民提着一把锄头,带我们来到一座大山的坡下,指着一块大青石说,新四军就埋在这块石头下面的坡地。——那块巨石之上,一座青山巍巍,一片松林阵阵;抬眼望去,十米开外,一座山洞静静的卧在那里,一片茂密的灌木丛遮挡住洞口,洞口隐隐,似乎正等着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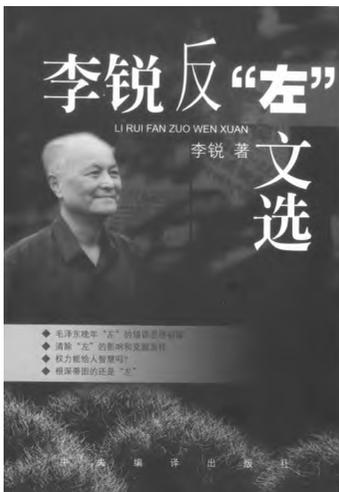
前来帮忙的老乡在山洞旁边找到一块平整的石板。我们给小姨立了块石碑,碑上刻着我们代表家人献给她的题字:这里安葬着一位年轻的姑娘,战争年代,她为了自己的理想,献出年轻的生命。

小姨就在我们面前,就在我们心里。漫漫搜寻路,竟至六十年。■

说明:本文写作过程中,参阅了陆方的狱中自述,何冰、刘子久的回忆文章;参阅并摘自《红岩儿女》(燕凌、童式一、穆广仁、宋琤编著,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书的材料,在此向作者致谢。

(责任编辑 杨继绳)

1957年至1978年20年来,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至十年“文革”灾难。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分阶级;1957年前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地方主义,尤其反右,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中多为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380万人;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如山冤案,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1978年后,平反了一切冤假错案,才基本结束自己



整自己的漫长历史,直到现在,“左”的阴魂从未散去。

为什么会这样的历史情况?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长期存在“左”的错误,产生其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是思想认识和理论问题,除此之外,根本问题还是体制问题,是民主和法制化的问题。本书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庐山会议的教训,“大跃进”失败教训何在等问题,进行了披露和反思,提出了反“左”的感想和意见。

定价:22.8元,邮费6元,地址及邮编见版权页

八十年代关于《资本论》的学术风波

○ 王恩重

《社会科学》杂志于1979年出版,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对国内外公开发行的院刊,除发表院内的稿件外还吸收外来稿。

副主编温崇实从一沓经济类来稿中发现其中一篇署名熊映梧的题为《用发展的观点研究〈资本论〉》的文章,当时理论界无人敢于触及的一个问题:如何用改革开放的发展观点来研究《资本论》?熊文认为,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不能用几十年不变的方法和材料来讲解《资本论》。

熊文从四个方面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其一,《资本论》的某些原理,是从资本主义前期的实际情况中概括出来的,它们未必适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阶段;其二,《资本论》的某些个别结论,根据不足,未必能够成立;其三,《资本论》及其他一些著作对未来的某些预测,尚属于“未来学”的范畴,有待今后的社会实践来检验;其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取的方法基本上是“静态分析”,因而不免有局限性。文章还对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作了具体阐述。

“文革”刚结束后的理论界曾有对斯大林、毛泽东及列宁的个别观点大胆提出过质疑的,但还未有对马克思经典原著进行商榷的文章出现。《资本论》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圣经”,是不能冒犯的。

编辑部的同仁思想很解放,熊映梧的文章终于在《社会科学》杂志1983年第7期上正式公开发表。

该期杂志正式发行后,温崇实参加了《世界经济导报》在宁波市主办的经济学研讨会,温崇实将刚出版的《社会科学》杂志赠给参加会议的少数比较熟悉的经济学界朋友看,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深学者看后马上不无担忧地对温崇实同志说:你们要闯祸了!他建议对熊文的发表不要太张扬,偷偷“捂”过去算了。

温崇实认为熊文的观点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应该让学术界公开进行讨论,所以他回来后即催促本刊经常写文摘稿的技术编辑往北京的《文摘报》投稿。第一篇投出去了,未见回音,温崇实让他再写再投。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两篇文摘先后都在该报较显著的地位发表了。

文章正式发表后,最先被触动的是境外的一些媒体。日本《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的记者凭着敏感的嗅觉分别自北京和香港往东京发了消息,并在双方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关于熊文发表的消息。他们根据该文在《文摘报》刊登的其中一篇文摘被排在邓小平同志谈解放思想的文章摘要的下方,猜测熊文的发表是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一个步骤,大概是先在北京以外地区的刊物上吹吹风(这是党中央重大方针政策出台时惯常先行采取的方式)。两报消息引起国外各大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新华社的《参考资料》(限局级以上干部阅读)注意到了外方的这一反映,并对此进行了报道。

两个月后,香港的一家杂志以《评〈资本论〉的不足之处》为题摘要转载了熊文的片段。同期还发表题为《喜见突破》的社论对熊文进行评论。在封面上醒目地刊登《中国三十多年来第一篇批评〈资本论〉文章》的要目。

当时国内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领导却以香港杂志的导向来责难熊文和发表单位。他们指出:“是可忍,孰不可忍!”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说,这样一个有影响的理论刊物(指《社会科学》杂志)掌握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让没有党性的人控制了,其他地方没人碰,就上海有人碰!(指熊文中所“碰”的马克思的一些具体理论)上海市一位领导在当地报纸上公开点名批评《社会科学》杂志。有关部门派员对编辑部进行了调查。此刻真使人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一位副部长受命在新华社办的《半月谈》1983年第20期上撰文,他在这篇题为《宣传工作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精神污染》的文章中写道:

有人公然要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论》,对于这种挑战,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保持沉默了。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真理是不怕批评的,也是批评不倒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斗争和实践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观点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但有个根本立场问题,这就是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并结合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在这样的严肃问题面前应当自己问一问:第一,自己写的、说的、主张的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第二,当某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冒出来的时候,你是处之泰然、随声附和?还是挺身而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呢?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也收到了上级指示,认定《社会科学》发表熊文是一次政治事故,要组织文章对熊文进行“讨论”。院党委书记找了院内各所的十几位学者在227小会议室将《社会科学》杂志五年来所发表的文章逐一排查有问题的文章,结果大家得出了“仅此一篇”的结论。院领导组织了两次理论座谈会听取理论界学者的意见和反映。在其中一次座谈会上,本院一位青年学者的发言刚刚对熊文在某些观点上略为表示了些许赞同,当场受到了自己老师的严厉反驳。

上海社会科学院根据市委宣传部的指示,安排了一批与熊文商榷的文章先后在《社会科学》第10和第11期上发表。

院里紧接着又组织了一批以批评为基调的文章,刊登在《社会科学》编辑部所编排的内部发行的增刊《来稿专辑》上。刚刚经历过文革的人,对自己或周围的人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遭受的政治创伤记忆犹新,因而仍心有余悸,有些人难免会采取一些“宁左勿右”的自我保护措施,按照有关部门领导的意见对熊文说一些违心的批驳言辞。有意思的是,不少作者对写这类文章一拖再拖,还纷纷私下来找编辑部同志表白,写这样的文章非自己的本意,是奉命作文,请你们理解。也有的原来说好同意写稿的同志干脆打了退堂鼓。增刊《来稿专辑》在小范围分发的同

时也寄给了熊映梧同志本人,他未作任何答辩。

意识形态主管部门那位副部长在《半月谈》发表文章后不久,全国即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的“活动”,各地纷纷组织了由当地宣传部长挂帅的领导小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同志因病住院改由其他同志挂帅。熊文自然难逃厄运。它被列为上海市批判精神污染的主要靶子,“批评”被升格了。

上海市委宣传部在上海展览馆召开了全市性的理论界清除精神污染动员大会,《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的大部分同仁自发地跟随主编赴会,大家当时都抱着一种共赴厄难的心情。

根据市委宣传部的精神,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对《社会科学》杂志派出了工作组,并对杂志的领导班子作了重组,工作组正副组长留任杂志的正副主编,苗立沉和温崇实两位副主编也因到了规定年龄在不久先后离休。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正常的人事安排,但自此之后,杂志一改此前的走在理论前沿锋芒毕露的风格,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很少再有创见性的文章出现了。

此后,国内的政治形势渐渐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清除精神污染的宣传逐渐走向低调,同样,对熊文的批判也逐步销声匿迹。

难能可贵的是,以当时李力安书记为首的黑龙江省委领导班子顶住压力,对熊映梧教授自始至终都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活动”中,熊映梧本人亦未曾受到过任何政治上、行政上的处理。

之后,熊映梧同志在政治上学术上被得到肯定,经历了这场学术风波,在解除种种不公正的压力之后的他,释放出了的学术创新能力,多年来他硕果累累,他的用发展观点研究《资本论》的看法,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认同。■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炎黄春秋网上书城

网上购书 方便快捷

网址: <http://yh100.taobao.com>

本刊唯一授权网上书店

联系人: 关小姐 淘宝旺旺: zssy8888

元宝山牧场的“挖肃”灾难

○ 原志久 刘凤歧

在文化大革命中,内蒙古昭盟(现为赤峰市)元宝山牧场是个重灾区,四十八天的“挖肃”斗争,90%的人受到伤害(领导干部100%,原场职工90%,原场家属50%)在全场总人口400多人里,致伤、致残的就有40多人,自杀与因伤致死的6人。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无辜的,“挖肃”斗争给大人孩子身心造成的重创久久不能平复。

1966年冬,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展开,大草原上的元宝山牧场虽然地处偏僻,但也紧跟形势,职工家属学生纷纷成立“革命群众组织”,举起“造反有理”“破四旧”的大旗,打破了牧场的平静。在夺权斗争中形成两派,分歧的焦点是:牧场主要领导人以前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当时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牧场的工人尚能坚守工作岗位,农牧业生产没受大影响。

在成立牧场革命委员会时,对结合领导干部问题,两派产生分歧,各不相让,最后,原来的场领导无一被结合,场的革委会正副主任全由上级派,他们对牧场的情况了解不深,群众组织代表进场革委会的(即委员)也是老好人、中间人。

“挖肃”斗争,即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简称,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内蒙古版,由于牧场新班子的主任经常外出,场革委会的工作无形中由强势的副主任孙天祥主持,他是“四十八天”悲剧的导演,牧场的人说到四十八天都会提到他。

场革委会开会,全由孙副主任一锤定音(因为没有不同意见)。久之,造成孙的独揽大权,给他胡作非为创造了条件。此时从旗里分配来一批新毕业的初、高中学生,当时叫“知识青年”,孙副主任通过培训将这批青年中的一部分打造成一支“攻无不克的劲旅”、“挖肃”斗争中的打人凶手。

孙天祥以前是旗里的机动干部,一派群众组织的造反派的头头,他这一派是胜利者,因此被安排到元宝山牧场当二把手,分工专抓“运动”。他编造假案,动用酷刑逼人承认。他利用无社会经验的小

青年充当打手。对牧场的职工、家属、学生、老干部、老领导残酷迫害。在逼供中即使将人致伤、致残、致死,孙天祥以“群众运动”为借口而无所顾忌。对本旗外的人,不管职务高低,对革命贡献大小,他毫不手软的迫害,但对旗境内的人他一边打一边拉,个人竟成了他的心腹干将,也成了戕害人的帮凶。

此时的元宝山牧场暗无天日,受审者在“审讯室”里备受折磨,施刑者声似狼嚎的威逼(“你说不说!”),受审者惨叫呻吟,此情景使人怀疑:这还是社会主义的国营牧场吗?简直就是日本宪兵队。

陈辉民是牧场卫生所的医生,曾经在邻近的红山子公社医院工作过。1968年冬,孙天祥得知邻近的红山子公社医院挖出了“国民党”(都是假的),他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不能落在人家后边,要在元宝山牧场挖出“反动组织”,名扬天下。经过策划,将陈辉民作为突破口,先给陈安上罪名再逼他承认。就在他衣服后背的白布上贴上“国民党员”四个字,在审讯之前例行自报“罪名”时,陈没有自报出“我是国民党员”的罪名,被行刑者狠揍一顿。

开始,陈大呼冤枉,说:“我有错误,可我不是那玩艺啊!”折腾了好一阵,陈承认在距离本场较远的牧区“达里诺尔公社”医院入的国民党,审讯人员说:“你都干了哪些坏事?”陈说:“我不给贫下中牧治病。”又说:“我看不起院长。”审讯者说:“还有!”陈接着说:“我故意骑死过一匹好马。”

此时,督阵的孙天祥插话说:“他还有个发展任务呢,叫他说说他都发展了谁?”接着陈说了四五个蒙族人名。

这时候已经快到半夜了,斗争会将要结束,审讯者中有人说:“他交代的几个蒙族名字,就像汉人的张三李四一样普遍……”

陈辉民屈打成招,但他并未攀咬元宝山牧场的人。但以后就由不得他了,孙天祥让他咬谁,他不咬不行。审讯人员对陈说:“红山医院的康

国玺大夫是地下国民党反动组织的头头,他已经把你供出来了,你是赖不掉的。”

陈辉民说:“我二人确实在红山医院工作过,个人关系并不好,他不可能发展我,我真的不是!”

审讯人员说“你不老实!”打手说“欠揍!”话到手到,各种刑法轮番用到陈的身上,把陈辉民折腾得不像人样,青年们也累了,怕陈死了(因还没有完整的口供呢)就将陈押回临时牢房,严加看管。

牧场因工作时间的原由,历来冬天吃两顿饭,晚饭后无事。但那天例外,晚饭后又提出陈辉民“过堂”,陈身上白天的伤痛还没过去,再添新伤,实在挺不住就“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红山医院的国民党。知青们露出胜利的笑容,让陈辉民写文字材料,他们急急忙忙地向孙副主任汇报“战果”。并表扬陈“回头是岸”,前途光明。孙副主任指示青年要乘胜追击……

青年们向陈辉民指出“你要彻底交代你们的组织机构、行动纲领、人员名单——元宝山牧场内还有谁是你发展的?”

陈辉民挺不住刑瞎编了名单和组织机构。但他想到这样害了别人。

他说“我根本就不是国民党员,不知道组织机构,人员名单和行动纲领。”

青年们一听大怒,说他是“翻案”。因为已经向孙天祥汇报过,并受到表扬,他翻供,成绩全都泡汤了。于是就对陈用了大刑:四个人把陈按倒,在腿肚子上压上杠子(这是19世纪的刑罚,不知他们从哪学来的)。

压完杠子又把炉子升旺,对陈烘烤,当时陈大汗淋漓。在压杠子时陈发出阵阵惨叫,让审讯室外面过路的人听到了,都觉得毛骨悚然。陈辉民想:我这样被折腾死了,以后谁给我申冤?我死后妻子儿女谁管?此时他求生的欲望占了上风,先保住命再说吧。他跟青年要了碗水喝,说“我彻底交代”。就这样他写了些编造的材料,过后又一想这样不对,就又否认。

青年们给他用了一种新的刑罚:把拖拉机上传动用的三角带箍住他的前额至后脑一圈,然后用小木棍上劲,箍得头像要崩裂似的,双睛外凸痛苦难当,陈辉民只得又一次承认是国民党,并且列出名单,审讯者暗示他“咬”谁,他就“咬”谁,他咬了不少人。在他的笔下反动组织就无中生

有的出现了。

在当天的大会上,孙天祥手举假材料,声音提高八度,神采飞扬地说:“大家看,元宝山牧场不是一片净土,是藏污纳垢的地方,这就是证明,我们坚决肃清。我劝失足者赶快惊醒,党的政策……”孙天祥的讲话拉开了四十八天的序幕。

陈辉民供出的反动组织名单里有副场长卢汉林。这可乐坏了孙天祥,他可抓住了反动组织在牧场的大人物啦。此时,内蒙古挖“内人党”的斗争在步步深入扩大,区内报纸、广播也大力宣传。在这样的形势下孙大主任在牧场挖国民党的信心更足。

卢汉林同志此时已年过半百,身体虽不错也禁不住精神压力和身体摧残,青年们对他用刑狠、辣,三角带勒在头上(脑箍)几度用力,老人昏厥几次。实在挺刑不过,在审讯人员的诱导下承认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青年们向孙天祥报捷时,孙要青年们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卢副场长的家人就遭了殃。

卢汉林同志的老伴是全场有名的忠厚善良勤劳的农村老太太,子女多,过日子勤俭,从没和邻居红过脸,身体瘦弱。此时,那些凶恶的打手将老太太抓去不到半个小时就打成了“胖官”,连吓带打,老人已无法活动,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终生未愈。

卢的长女卢风云,被抓时正在经期,被打得昏厥数次,经血不住地顺裤筒流下。身心受到的摧残至今仍未完全恢复。

卢的女婿赵贵是牧场的会计,身体单薄,知青们将他带进审讯室开打,衣服打开了花,背部、头部皮带伤累累,一个小时就昏过去三次,被青年用冰水激醒,浑身水淋淋地扔在地上。

此时场革委会主任(一把手)看见了,找人把赵贵抬到炕上,换了衣服,叫人饮了点水。见赵贵的头部肿得厉害,只能看到嘴和眼成三条小缝。主任找到孙副主任说“不能再这样用刑了,如打死了人怎么交代?”

孙天祥不以为然地说“对敌人就是要狠,你现在同情他们,如果他们翻了天,他们对你就不客气啦,我看咱们班子应当反右……”

此话把主任吓了回去,再不管挖肃的事,任由孙天祥去折腾。

赵贵连连受刑,身体已经垮了,在审讯人员

诱导下把“入国民党”的事勉强说对了茬口。再找他，他对各种刑法确实惧怕，想：怎样能够把这里的情况让上级知道？躺在炕上忍着伤痛苦思冥想，最后找青年说：“我有重要罪行交代，给我一点时间”。青年们向孙天祥汇报，得到批准。赵贵说：“我要交代重大罪恶。”青年们大喜，三个人作笔录，恐怕漏掉赵贵所说的一句话，赵接着说：“我不是才入的国民党，我是在国民党退却时就被发展成国民党了，后来又入了特务组织，在文革前又给我配备了电台。近来牧场挖敌人风声紧，我偷偷地把电台砸碎烧掉……”（当时赵贵26岁，国民党退却时他才多大啊？）

青年们听后大喜，让赵贵回牢房休息，再好好想一想还有什么交代的。就去找孙天祥汇报，孙听后高兴极了，让青年赶快抄赵贵的家。

这些青年到赵家翻箱倒柜，顶棚上、地下找了个遍，结果只找到一片烧黑的铝质薄片，约有36开白纸大小，（实际是一个破印台的底座）他们双手捧着交给孙天祥，孙如获至宝，立刻收藏在柜里，写成材料速报旗公安局。

第二天孙副主任在群众大会上手举黑铝片，高声对大家说“你们看，这是敌特用‘袖珍电台’的残骸，元宝山牧场的阶级敌人隐藏的太深了，他想销毁罪证，结果也被革命小将挖了出来，这是真凭实据，再狡猾的敌人也逃不出人民的法网，我已经叫人上报公安局了。”

赵贵用自己的智慧将元宝山惨案致死人命的信息报给了旗公安局。

在此之前，已“靠边站”的牧场原书记常水站出来，向主持挖肃的孙天祥进言并写一纸条，内容是“……以前牧场工作的错误都是我的责任，但我们场职工、家属除一名新调来的我不了解之外，没有一个国民党，没有一个内人党，我不敢保证”。

此话一出口，常水就招来猛烈的批判，六十来岁的他还被迫弯腰请罪，胳膊被拧伤。同时他也被怀疑是“内人党”，说他长得像蒙族，为何报汉族？其实常书记是冀东人，抗日干部。从口音与行为举止都能看出来，怎么“像蒙族”？

刘凤岐在受刑人群里算是挺刑最久的。元宝山牧场挖国民党的斗争步步深入，刘凤岐在农业组被叫到场部受审，一开始他还与知青辩论呢，说本场没有国民党，后来知青给他用刑，刘宁

死不承认，知青们叫他低头弯腰，拧胳膊，用皮带抽他，他挺过去了。

此时，黄分场也把怀疑对象调到场部。让他们看一看“国民党”们怎样受刑，起杀鸡给猴看的恐吓作用。有一名职工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他曾参加过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一开始他对审讯人员说：“国民党叫我们追击到海南岛，消灭了，这里没有国民党。”

审讯者说：“你是从部队复员后入国民党的！有人揭发你。”让他观看行刑情况，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不吃眼前亏”改口说：“我再想想。”第二天他的背后就缝上了国民党的牌子。

另一名共青团员看到别人的受刑惨状，夜里不能睡觉，一闭眼就出现施刑者们打人那种凶神恶煞的样子。次日一大早就去“自首”说自己是国民党员。

孙天祥在“宽严大会”上“宽”了这两位，说：“你们看，还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觉悟，知错必改嘛，早日回头我们欢迎！有些人顽固不化，我看你能抗拒多久。”

在刘凤岐受刑的第四天，卢汉林老人挺刑不过又按照审讯者的提示写出“反动组织”的名单。其中就有刘凤岐，另外还有王天泉、孙良山、杨山、王发、籍文等人。刘凤岐因不承认继续受刑，有的人头脑灵活，抓进审讯室一打就招。孙良山受刑三天咬牙挺过，白天知青给他缝上牌子，夜晚他自己将“国民党员”的字样撕掉，他连撕三次最后也没挺住，屈认了国民党的罪名。杨山被上“头箍”昏迷过去，青年用脚踢他腰（让他站起）踢坏了腰、肾，也被迫承认是“国民党员”。籍文搞“曲线自救”仅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狗腿子”不承认是“正式的国民党”。牧工戴子斌难抵酷刑，夜间溜出宿舍，自缢身亡。元宝山牧场的“挖肃”踩着群众的鲜血步步深入，以残害人命为代价向前发展。

刘凤岐受刑已经七天七夜，他以《红灯记》中李玉和为榜样坚持挺刑。此时元场挖肃已入白热化，刘宁死不招，青年们也不示弱，变着花样用刑，除了日常的喷气式以外又增加了“白鹤亮翅”“金鸡独立”“苏秦背剑”以及脸朝炉火等等刑法。由于刑伤，胳膊肿得穿不上衣服只好披着，两腿肿得脱不下裤子，昼夜穿着。疼痛使他有时

以头撞墙，把牙咬得咯咯响。

他挺刑到第10天，知青们感到对他“强攻”不能奏效，他们把目光注视到牧工卜玉明的身上，卜是个老实人，已被迫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青年们导演了一出戏剧：让卜当场“检举”刘凤岐，卜怕挨打就同意了，经青年们导演了一下午一晚上，到了半夜才学会。但是到会场见到刘凤岐时，卜玉明干张嘴，吭叽了半天也没说出检举的话，最后说“在羊圈你跟我说来……”刘凤岐问“说啥来？”卜说“就是那个。”刘又问“哪个啊？”此时青年过来拍拍卜的肩说“好啦，你立功啦，回去吧”。于是收场。

刘凤岐受审到第11天。刘明白了：他们执意要整自己，不管真假，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如果被他们整死，谁来申冤？同时他也看到牧场的老职工几乎全被“专政”。经反复思考他对青年说：我承认，但已写不了字，你们写吧，我签字就是。

再说卜玉明与刘俊发二人被释放，孙天祥以“送回”羊组为名，实则是派青年监视他俩。到羊组后那位青年再次套问他俩，他俩说了实话：“我们都是老工人，哪能入什么国民党？我们是怕挨打才暂时承认的。”

这番话被青年汇报给孙天祥，孙立即吩咐：将卜、刘二人抓回，晚间开大会批斗。会上孙宣布：卜、刘两人是破坏挖肃斗争的反动分子，要把他俩打倒、批臭！

一部分“跟风”的家属一哄而上，骑到刘俊发的身上连压带打，刘俊发口吐鲜血，连血带汗流到地上。卜玉明原来怕挨打，现在被打得嗷嗷叫唤。他二人又被关押起来。

孙天祥为扩大战果，向各分场也派了得力干将，天天有捷报报到他面前。郭宝臣的胳膊被拧断，胡景山的肩关节脱位，家属杨怀荣胳膊被青年拧成两截，黄分场大师傅刘选的老伴被收审，不甘受辱服毒自杀。孙天祥得知也有些顾忌，给被“专”的“一小撮”开会，大讲“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运动后期……如何如何”，但他对被审人员用刑的力度不减反而加强，他此时的“成就感”正浓、升官梦作得正香，不顾人民死活，不管政策，一味地强调对敌人要狠，把耕地用的犁铧子烧红，叫受刑人背上——不怕他不招。

打手们用刑的花样翻新，王发的妻子怀孕，

他们不打她就薅她头发，顶部的头发几乎薅光。籍文也被薅，头顶也几乎秃了。王发的岳父留长胡须，青年们先是一根一根的薅，后来一撮一撮的薅，疼的老人直哆嗦。

王发被打得不能走路了，躺在炕上。知青劝他，叫他咬刘凤岐，说刘曾发展他人国民党，王发没咬，因此他们将卧床的王发又暴打一顿。

小学生和家属也是挖肃的突破口，卢汉林、闫学洙、郭义、王发、罗树迁、李宗广、王峻山……都是“反革命家庭”。连10岁的孩子也不放过，身后背着白布牌子劳动。革委会监视这些“反动家庭”，夜间站岗、趴在门缝里偷听。不时地抄家，没收人家的钟表、银元……整个牧场人人自危。

赵贵的“台湾特务案”报到克旗，惊动了旗“公检法军管”，及时组织调查组开进牧场。

此前，杜春景等几位赶大车的工人赶车去赤峰。出发前对场内的恐怖局面曾发表不满言论（被知青们听到）自知回场后也将被“专政”，在途中商量：到赤峰向业务主管部门（昭盟食品公司）反映场内的情况。那时牧场的王久辉在赤峰帮公司修理汽车，王久辉对牧场的挖肃早就不满，他们会合后就向公司领导李德永反映牧场的恐怖情况。

李德永率领王久辉与几位赶车工人到昭盟革委会，那里接访的马俊祥（军人）听汇报后深感事态严重，立即给下乡的盟革委会主任（周明，当时在巴林右旗）作了电话汇报。周听后回电话：一、揪出在清队工作中肆意践踏党的政策的幕后主使人。二、给致伤、致残的人员安排治疗。三、抓革命、促生产。四、把暗藏的阶级敌人挖出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

此四项指示令克什克腾旗革委会执行，而克旗也接到了派赴牧场调查组的报告。即由旗革委会主任（军人，刘国仁）赴牧场，先找牧场原来的书记常水了解，综合三方面的情况，确知元场前段“挖肃”中的问题严重。当晚即召开大会。

在会上刘主任代表盟革委会、旗革委会向受害人致歉（行军礼）此时，在场的群众都哭了。

刘又宣布盟、旗两级革委会的决定：

一、撤销孙天祥一切职务，交给群众审查、批斗。
二、安排受伤、致残人员就医，轻伤在场治疗，重的可到外地诊治。

往事录

三、抓革命促生产,把牧场的生产搞好。

四、将李堂(制刑具者)以及陈辉民带往克旗。

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把孙天祥揪到台前时,群众拍手称快,纷纷发言控诉孙的罪行,(知青们也揭露孙授计害人的阴谋手段)此时的孙天祥低头弯腰,向群众请罪。

此人在“挖肃”斗争后期被上级革委会决定“撤销一切职务,交群众审查、批斗”,最后刎颈自杀(当时被抢救送医院,以后死在医院)

元宝山牧场的惨案从开始到结束,整整四十八天。■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书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 黄宗良等	246.00	20.00
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	42.00	7.00
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孙越生	35.00	7.00
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	金冲及	32.00	7.00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	陈铁健	48.00	8.00
我与第二次握手	张 扬	32.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晖	38.00	7.00
蒋介石初上台湾岛(1949—1953)	李庆 根志优	58.00	9.00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金 雁	68.00	10.00
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 左凤荣等	246.00	20.00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萧功秦	48.00	8.00
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马立诚	39.00	7.00
金正日与朝鲜	高秋福	36.00	6.00
陈布雷与陈伯达——历史转折上的两个“秀才”	张希贤	56.00	8.0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	148.00	18.00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赵 诚	38.00	6.00
孤舟独树	康国雄口述 何蜀整理	38.00	7.00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译	58.00	8.00
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俞可平	45.00	7.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锐著	29.50	7.00
苏北利亚	于 疆	22.00	6.00
《转折》《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吴思 李晨主编	72.00	12.00
亲历记(一)(二)	吴思主编	58.00	11.00
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等	42.00	6.00
中山舰事件: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	张聿温	32.80	6.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19.00	12.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国家记忆(一)	章东磐	98.00	10.00
国家记忆(二)	章东磐 晏 欢	88.00	9.00
可操作的民主	寇延丁	28.00	7.00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	袁天鹏	38.00	7.00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窦应泰	38.00	7.00
邓小平访美那九天	杨奎松	48.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陈天璇	32.00	7.00
黄埔恩怨	李若公	46.00	8.00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	王 晓 华	38.00	6.00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吴 思	28.00	7.00
读史求实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88.00	10.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杨奎松	38.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张 鸣	26.00	7.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六册)	金冲及	128.00	12.00
母亲杨沫	《档案》栏目组编	180.00	20.00
血色黄昏	老 鬼	45.00	6.00
血与铁	老 鬼	39.00	6.00
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老 鬼	39.00	6.00
1911—1912 亲历中国革命	埃德温·J·丁格尔	38.00	7.00
亲历民主 我在美国竞选议员	龚小夏	28.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李冬君	60.00	8.00
1943 一盆红红的火(谢韬日记选编)	谢 韬	49.00	8.00
高尚传	戴茂林、赵晓光	59.00	7.00
西路军——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	冯亚光	126.00	12.00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 黄宗良等	246.00	20.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共和国大审判(二)——特别法庭内外纪实	沈国凡采写	38.00	7.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前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红墙知情录(一、二、三)	尹家民	95.00	10.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I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 李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直言无悔	徐 孔	29.80	7.00

代购代邮

我与《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扬于1963年2月写出《第二次握手》(初稿),后多次重写,“文革”中产生的1970年稿造成全国规模的手抄本流传,为此作者被“四人帮”逮捕并内定死刑。1979年1月在胡耀邦直接干预下才得以平反昭雪。

这是怎样的一本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呢?

丁玲曾评论此书:在“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统治下,成千上万的热心读者们,曾经冒着被批判被斗争的危险,在黯淡的灯光下阅读这本书,传抄这本书,使这本书不胫而走,使有幸读到这本书的人,在冷漠的寒夜里,得到瞬间的温暖。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作者以极为新颖的方法研究现代中国历史,——通过中国革命的一些最引人注目的参加者——那些动荡事件和受其影响的作家、历史学家和叛逆者的眼睛向我们展示了中国革命。本书选取了近现代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知识分子,比如康有为、梁启超、鲁迅、沈从文、梁漱溟、徐志摩、丁玲、老舍等,描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个富强中国的不懈追求,揭示了他们在改良与革命的选择中的心灵痛苦与内心冲突。本书被费正清教授誉为“西方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人类主宰万物,但却难以控制官僚主义对社会的侵害,官僚政治机器对人类的迫害。

官僚主义最害怕在平民悲愤的诅咒中显形,所以最讲究在官样文章的词藻里隐身。它不仅以枪炮和皮鞭、法庭和监狱、收买和贿赂为武器,还利用礼仪和道德、智慧和科学、文学和艺术作手段,以便让专制的镣铐涂上仿金的言辞,好使每一根神经末梢的感觉,每一下善良心灵的跳动都因戴上奴役的金链而自豪。

它让你家破人亡,还教你山呼万岁;它让你妻离子散,还要你感激涕零。皇恩浩荡,就要求人人肝脑涂地,个个甘当螺丝钉;有了个人崇拜,绝对权威,就必然要求人人恪守教规,小心侍奉上帝,灵魂深处闹革命,斗私批修。两者此响彼应,如影随形。

它的政治化学亲和力无与伦比。从天国的神祇,到人间的圣贤,都能请来为它效劳。古往今来多少漂亮的字眼,多少动人的主义和制度,它都能招而纳之,化而用之。

本书在反思中外历史的基础上,探讨了官僚主义的起源及其发生作用的规律,作者对当代中国官民关系的思考,反映了对国家民族爱之深、痛之切的赤子情怀。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海打战役流产的历史真相

○ 夏宇立

发生在1936年的海(原)打(拉池)战役的流产,既是红西路军最终失败的前兆,又是导致红西路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弄清这一历史真相,既可正本清源,又可认知成败得失,发挥以史为鉴的历史功效。

关于海打战役,传统中共党史和军史早有“定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说:中革军委于10月28日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准备组织海打战役,重点打击胡宗南部,“而张国焘却命令红四方面军在黄河以东的第四、第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致使战役计划未能落实”。(《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01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说:“10月30日7时,彭德怀下达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决定在海原、打拉池地区寻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一两个师”,“3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完成集结,担任诱敌任务的部队已与敌接触;红二方面军也进入指定地域。但是,因第4、第31军未能到达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集结地域,海打战役计划未能实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11页)

事实并非如此。

海打战役的背景和过程

1936年6月,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进至黄河以东甘宁边的同心、固原地区。8月上旬,长征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走出草地,向甘南前进。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信张学良,表示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意见,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两广事变”发展以及日本企图进攻绥远等情况,提出与东北军联合发动抗日局面,占领兰州,从西、北两个方向打通苏联设想。(《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出版社2004年第97页)12日,中央又将这

一精神电告朱德、张国焘和任弼时,确定“12月起”,“乘结冰渡河”“占领宁夏”,“打通苏联”。[《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以下简称《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635页]乘结冰渡河,是考虑红军没有渡河能力,希冀踏冰过河。

8月中下旬,红二、四方面军遵中央指示,分别开辟了甘南和甘陕边临时根据地,准备下一步行动,然而,张学良东北军却按兵不动,而此时蒋介石已处结“两广事变”,快速回兵西北“剿共”,局势日趋严峻。

可是,中央和毛泽东等虽然接到共产国际书记处来电“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长征时期》第693页)也已获知红四方面军有造船能力,渡河不是障碍后,却犹豫彷徨,迟迟不作渡河计划,而坚持将红四方面军主力部署到西(安)兰(州)大道,“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长征时期》第695页)继续“等待冰期”。

10月上旬,敌各路大军集结前来,蒋亲自部署“通渭会战”,企图将红四方面军一举围歼在西兰大道上,形势十分危急。11日,中央及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规定渡河部队由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21日,敌军在蒋亲自指挥下发起总攻。23日,朱德、张国焘和彭德怀根据中央意图在打拉池商定宁夏战役渡河部署。24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红30军迅速渡河。当日夜,红30军于靖远虎豹口渡河成功。25日,毛、周致电朱、张和三个方面军领导人,提出宁夏战役分作两步,“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长征时期》第841页)26日,毛致电彭,“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敌为中心”,“一方面军速集同心城休息”。(《长征时期》第844页)27日,红四方面军领导

人徐向前、陈昌浩向军委和总部提议，为“迅速实现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全部渡河”。（《长征时期》第846页）

29日12时，毛、周电示：“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长征时期》第853页）当日下午，红31军进抵虎豹口渡口，晚上开始渡河。当晚20时，彭德怀发布海打战役集结命令，规定红31军参加海打战役。该军遂停止渡河，连夜向打拉池、海原方向转进。正在郭城驿及其以南马家堡等地阻敌的红4军同时开向打拉池。30日7时，彭发布海打战役《作战部署》。31日晨，红31军到达战役集结地干盐池及以东地区。中午，红4军也先后进至指定地点打拉池一线。与此同时，因敌军大举进攻，红一方面军无法进入战场，并实施全面后撤。当日中午，彭宣布战役终止。下午至夜晚，红4军在打拉池一线与追敌激战，11月1日凌晨，撤离打拉池向东转进。

海打战役期间红四军、三十一军正在战役指定位置并未撤走

海打战役，从29日20时发布集结命令起，到31日中午1时左右终止，总共不过40多小时，搞清楚这一时段红4军、红31军动向并不困难。

彭德怀《作战部署》规定：10月31日，红31军“集结于干盐池及打拉池以东”，红4军“节节吸引王均向打拉池前进，最后扼制之”。（《长征时期》第1036页）请看该两军行动：

29日下午，奉毛、周和朱、张命令，红31军开向虎豹口渡口准备渡河。当日夜，彭发布海打战役集结命令，徐、陈即电示该军“今夜全部分两路”“迅速开打拉池”。（《长征时期》第1033页）经过110里行进，30日上午，到达打拉池及西面约10余里的小水。当日黄昏继续开进，于31日晨到达干盐池及以东彭指定位置集结待命。（参见《长征时期》第856页；笔者对红31军亲历者访谈录）

29日夜，根据总部命令，红4军留下小部兵力在会（宁）靖（远）大道及其以南游击阻敌，主力由郭城驿、红堡子等地向打拉池开进。（参见《长征时期》第1033页）30日，于开进途中，分别在会靖大道的红堡子、大芦子、黑城子等地与跟踪追击和

围抄的敌军反复激战。31日，部队边打边撤，分头于当日上午、下午到达小水、打拉池。敌第25师分西、南两路紧追而来。当日中午，彭终止海打战役。下午4时，敌向小水猛攻。当晚，敌集中兵力猛攻打拉池，红4军与敌战至深夜。

为了进一步证实红4军31日在打拉池，笔者再提供如下证据：

其一，11月1日8时徐、陈致朱、张电中有言：“再道率四个营昨12时到打拉池”。（中央档案馆藏红四方面军电报，解放军档案馆复制件第319卷206页）

其二，国民党军第25师《战斗详报》中记述说：“伪四军之11、12两师，经我第73旅跟踪追击，已于10月31日上午超过展家岷，正向小水里、打拉池溃窜中”，“师部、75旅于10月31日上午，由靖远出发沿打通打拉池道迅速前进，截击该匪”，“于晚12时奇袭攻占打拉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附卷》第762-763页）

其三，亲历者证言。笔者访问过时任红4军军长陈再道、军政委王宏坤、军参谋长张才千、红11师政委陈锡联、红12师师长张贤约、师政委胡奇才等，他们都证实红4军31日在打拉池并与敌激战。《陈锡联回忆录》也记述了夜战打拉池情景，“敌人密密麻麻平铺着围了过来”，部队“马上就敌人打起来。战斗中，一位教导员光荣牺牲”。（《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73页）

对所谓“撤走”错误说法来源的探究

所谓张国焘撤走红4军、31军之说法，源头在哪里呢？

第一，《彭德怀自述》该书说：“张国焘司令部到达会宁，我与他直接通电”，告之“你们应全部集结海原、打拉池地区，准备消灭王均部”。“第二天，张国焘到打拉池”，“张说：‘已令徐、陈率四方面军之主力及一方面军之五军团从兰州附近渡过黄河北岸，向武威（凉州）前进了。’”“王宏坤之陈锡联、谢富治师和张国焘司令部，大概是由于西北马家军和王均军的阻拦，未来得及过河。”“张国焘到了打拉池后，敌王均两个师尾追四方面军被截断部分前进。我与张国焘面商，只要被截断部分在正面阻拦该敌前进，一军团即可从追

敌侧后进攻,在打拉池布置伏击阵地。这样,消灭王均部是完全可能的,这样还可与四方面军北渡主力取得联络。张口头同意,却秘密命令王宏坤部向同心城方向撤走,破坏了当时的作战部署。我又与张商,在海原和同心城之间布置伏击阵地,歼灭王均部。他口头又同意了,实际上他又令四方面军东撤了,使伏击计划又被破坏。张国焘多次破坏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军消灭,西安事变就可提早,我军就可能控制兰州和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彭德怀自述》第215-217页)

《彭德怀自述》产生于特殊背景,当时作者遭非法关押,属“逼供信”下的“交代”。这段文字所涉及的每一件事都与事实不符。比如,第一,张国焘在会宁时,四方面军遵军委命令正在西兰大道上抗击敌人,不可能到海原、打拉池集结,也根本不存在彭消灭王均部的计划。第二,会宁到打拉池300多里,朱、张于10月20日从会宁出发23日下午到达,路途走了4天,不是“第二天”到达。第三,朱、张23日到达打拉池后与彭会商宁夏作战部署,这时渡河并未开始,张怎么可能说“向武威(凉州)前进了”呢?第四,谢富治当时正在“红大”学习,且不曾任红4军任职,自然也不存在“谢富治师”。第五,彭的海打战役作战对象是胡宗南部,红4军担负的任务是在打拉池一带阻击王均部,掩护突击部队侧翼安全,而《自述》说“在打拉池布置伏击阵地”,“消灭王均部”,说的并不是海打战役,而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伏击”王均战役,显然不是事实,而所谓张“秘密命令王宏坤部”“撤走”就更是毫无根据。第六,海打战役之后,彭曾两次组织在海原、同心城之间打击胡宗南战役,也曾于11月11日计划组织打王均部一个旅战役,可意图暴露,遭敌重兵压迫,彭不得不连续下令全线后撤,而绝对没有张“又令四军东撤”之事。第七,“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不能归罪于张和红4军。第八,所谓“把王均军消灭”,“西安事变就可提早”,红军“就可能控制兰州和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只能属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

第二,一份电报被误读。10月30日10时半,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电文说:“甲、关敌今可能逼进打拉池,决以一、二方面军主力及31

军集结麻城(春)堡附近,消灭突进之敌。乙、31军、4军均甚疲劳,现已令31军今由打拉池经干盐池向麻城(春)堡进。丙、5军在靖远警戒,已令渡到三角城,同时将新有船只下开三角城左岸。丁、9、30两军即在一条山、五佛寺休息待机。4军经新堡子开同心城。”(《长征时期》第856页)

此电是位于河东的朱、张向位于河西的徐、陈所作情况通报。“甲”是对敌情的判断与歼敌计划和决心。“乙”表示尽管部队很疲劳,仍令执行战役计划。“丙”是关于红5军的处置。复杂一点的是“丁”,人们的误读也在这里。“丁”第一句“9、30两军即在一条山、五佛寺休息待机”,这是传达毛、周电示。当日毛、周致朱、张电,内有河西部队9、30军“暂控制眼井堡大路、三塘驿、五佛寺,休息待机”等语。(《长征时期》第855页)按毛、周此时设想,“只有停顿南敌之追击,方能北取宁夏”,那时河东红军主力从中卫、中宁地段渡河。而在此一阶段到来之前,就决不是三天数日之事了。在这一语言环境下,电文说到的“四军经新堡子开同心城”,也就不难理解了,它同河西部队一样,是一个中期计划,指的是红4军参加完海打战役之后,再作休整的意思。朱、张发此电时,红4军尚未完全脱离会靖大路,若从所在位置算起,到打拉池约150里,到同心城则是400多里。红4军已经“甚疲劳”,即便张真的是以其“避战”为目的,也决不会让它马上劳师跋涉开到同心城。所以,正确理解应该是,开同心城只能是日后,而不是在海打战役期间。

还必须指出,此电是朱、张与徐、陈的联络电,不是“电令”,电中虽然也通报了曾对第31军和第5军的行动作过指示,因而其语言都是“已令”,可是,对第4军却绝无这等语言。此电既非命令,同时,按规矩,其内容作为红4军领导人,也是不能够知道的。如果是张命令红4军开同心城,一定得给红4军首长下命令。下命令无非三种方式:一是通信员送达,二是电话,三是电台。当时朱、张在关桥堡,红4军首长分别在郭城驿、大芦子附近转战中,相距300多里,以通信员和电话方式显然不可能,只能使用电台。若是通过电台下达了命令,当然有电文存在,如果拿不出电文,仅以这里联络通报的一句话,就认定张“下令四军开同心城”,则显得太武断。4军政

委王宏坤在看到《彭德怀自述》中说张秘密命令他撤退,破坏了海打战役,认为不是事实。“我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有电报以来,我也没有单独接到张国焘给我的电报命令。”(王宏坤:《我的红军生涯》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9页)

第三,一份电报的误导。10月31日彭致毛电中说:“张令第4军开到贺家集、兴仁堡,31军开同心城、王家团庄”。(《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一,第825页)此说不足信。首先,红4、31军没开走。彭发此电时该两军分别在打拉池和干盐池及附近。其次,张不会调走部队。朱、张当时在关桥堡,所率总部机关、红军大学、总医院及伤病员共4000余人也驻关桥堡及其附近。同心城、王家团庄在关桥堡东北面六七十里,贺家集、兴仁堡在其西北面约160里,都远处后方。大敌当前,关桥堡接近前线。试想,此种情况下,将战斗部队调到后方,而让领率机关和非战斗人员首当其冲,如果不是真傻瓜或蓄意让敌人消灭,会如此布置吗?再次,彭也明知红31军没开走。彭当日驻麻春堡,红31军若从干盐池东开180里外的同心城、王家团庄,麻春堡为必经之地,7000余人的大部队行动,能瞒得住?

彭其所以要如此说,是否另有用意,故意状告张,以便为实施毛和彭将前线指挥权“集中于”彭“一人手中”(毛泽东语),由彭“统一调遣”,“朱、张不干预”(彭德怀语)的计划造势,则不得而知。不过,其结局的确如此,实现了毛的意图“前线部队统交”彭指挥,“可放手去做”。(《长征时期》第1044页)

彭德怀计划部署失误是海打战役流产的直接原因

海打战役从发布集结命令起,最高首长的失误呈连续和多方面状态。

第一,发布集结命令即出大岔子29日20时,彭发布河东3个方面军“10月31日以前各部队集结位置的命令”,(《长征时期》第1035页)规定了参战部队的集结时间地点。可是,随即就发生了2方面军不能到位的严重问题。因为指定的2方面军集结地红羊房当日下午已经被胡宗南部占领,2方面军北撤。30日,在多路敌军的共同压

迫下,2方面军不得不继续北撤,到规定集结时间31日,全军已后撤到了距离规定集结位置红羊房、王家井和马营等地以北100多里的地方。(参见《红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四,第387页)直接后果是,2方面军无法参加战役,打敌战场留下了一个大缺口。

第二,组织战役却对来敌不甚了了。30日7时,彭发布《消灭胡敌之作战部署》,其中这样介绍敌情:“胡宗南所率之第一师及孔、邹、伍三个师共计18团兵力为右路,其先头纵队以孔、邹、伍3个师共9个团组成之。昨(29)日先头已抵红羊房附近,与我32军对抗中。第一师为后尾纵队,已抵新营、平峰镇之线,估计其孔、邹两师有向古西安州、干盐池并进企图,伍师为预备队,第一师尾进。”(《长征时期》第1036页)

这里错误多多。首先,胡所率部队,并非“第1师及孔、邹、伍3个师”,而是第1师(师长胡宗南兼)、第78师(师长丁德隆)、第43师(师长周祥初)和第97师(师长孔令恂)。“伍师”,指的是伍诚仁曾任师长的第49师,该师原归胡指挥,一年前的包座战役中被红四方面军歼灭后重建(师长李及兰),并未到达本地区。

其次,说“胡宗南所率”部队“为右路”与事实不符。因为在胡部右翼同时推进的还有王以哲两个师。说胡部“先头纵队”为“孔、邹、伍”3个师组成,又与事实相悖。其实走在周、孔两师前面的是胡宗南第1师的李正先第1旅,(参见《第一军战斗详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766-769页)也不存在“伍师”。

其三,说孔、邹、伍3师“昨日先头已抵红羊房附近,与我32军对抗中”。事实是当日在红羊房地区交战的双方为胡部第一师和红六军团。(参见《陈伯钧日记·文选》上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294页;另《第一军战斗详报》,《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附卷》第766-769页)

其四,当时胡部开进队形,并非《部署》所说4个师呈单纵队行进,因而有所谓“先头纵队”“后尾纵队”之分。它的4个师是分左右两路开进的,其右路由第1师第1旅先行,周、孔两师紧随其后;其左路先头为《部署》所“遗忘”的第78师,第1师其余部队和军部紧随其后。左右两路基本为平行开进,其左路第78师又与其左侧的

王均第3军并行开进。(参见《第七十八师战斗详报》，《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附卷》第717-718页)第1旅和孔、周两师的右翼还有一支同样被《部署》“遗忘”的王以哲之“刘、熊两师”，在“掩护胡军之侧背并策应之”。(《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749-750页)可想而知，敌人如此进攻态势，海打战役要从其中专门挖出周、孔两师来“专打”(毛泽东语)，实属不易。

第三，作战部署存有致命盲区。海打战役部署被毛泽东称赞为“作战部署甚妥”，(《彭德怀年谱》第162页)可实则不然。由于“判断”敌“孔、邹两师”在前，因而就以“决首先消灭孔、邹两师”来制定作战部署。要求一方面军“主力6个师集结古西安州、麻春堡、陈家湾地区”，“待孔、邹两师向红井子、七百户、二百户前进时”，“我一方面军主力隐蔽集结于关门山南北地区”；“待敌深入七百户、二百户之线时”，一方面军主力由东向西“协同31军夹击”。(《长征时期》第1036页)可是，执行时立即遭遇严重障碍。一方面军主力发起攻击前的“隐蔽集结”地点关门山，在“古西安州、麻春堡、陈家湾”等战前集结地以南六七十里，处于敌人来路方向，敌军兵力众多，几个师紧靠行动，还有后续大部队，很难存有让红军插入其纵深“隐蔽集结”的机会。而按此一部署，一方面军主力若失去关门山“隐蔽集结”准备夹击敌军的机会，也就表示战役夭折。果然，31日敌军大举前来，其先头部队并非预想的孔、周两师，而是胡部主力精锐第1师第1旅，孔、周两师紧随其后。敌军越过红井子、七百户等地，抵近古西安州。一方面军主力受到严重压迫，不仅不能南下“关门山南北地区”“集结”，相反被迫向东北后撤，战役计划完全被打乱。同时，位于胡敌右翼的王以哲两个师和何柱国两个骑兵师以及驻海原的马鸿宾第35师等部，也乘机出动截击红军。海打战役遂告流产。

毛泽东重点击破南敌决策和“速图之”作战方针是海打战役流产的根本原因

海打战役流产之后的11月3日，彭德怀发布命令，在“关桥堡东西地域”“消灭胡宗南先头纵

队两三个师”。(《长征时期》第1039页)毛泽东称赞：“部署很好！”(《彭德怀年谱》第163页)可是，再一次流产。5日，彭再发命令，在“石峡口、上下于家庄、王家坪、驼厂堡地区”，“以伏击手段坚决消灭孔、周两师”，“胜利后，准备继续消灭胡宗南主力”。(《长征时期》第1040页)结果又一次流产。11日，彭又发命令，“集中最大主力”在“李家套子、丁家塘”地区“消灭王均先头旅”。(《长征时期》第1041页)结果还是流产。

海打战役和这一系列战役流产，其部署当然难辞其咎，它是战役失利的直接原因。同时，也暴露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当时红军面临河东河西两面作战，河西为进攻作战性质，因而徐向前等主张投入主力，迅速进兵。而敌军在河东实行的是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相互紧靠、多路推进的进攻态势，其目的是破坏红军渡河，“聚歼”红军于“黄河东岸”。面对如此情况，河东红军要在敌人重点目标区中短时间内歼敌一两个师是困难的。因而，朱、张认为，河东应“利用天然障碍坚壁清野”，以一部兵力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后发制敌。如果河西“取得物质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长征时期》第849页)可是，毛泽东根本否定这些意见，坚持实行“重点”“击破南敌”决策，(《长征时期》第841页)要求立即“与南敌决战”，(《长征时期》第855页)幻想“一战而胜利，则全局转入佳境矣”。(《长征时期》第856页)他认为“现敌轻我锐进”，“打得好可获大胜”。(《长征时期》第855页)要求“我三个方面军主力”“在数日内坚决突击，消灭胡敌先头一个师至两个师”。并认为胡敌“向打拉池锐进”，是“消灭敌人开展局势最适当之机”，要求“速图之”。(《长征时期》第850页)敌军20多个师20多万人，相互紧靠，压向黄河以东的狭小地域，且敌系新来锐气正盛，当地交通便利，有利于敌大军运动和后勤保障，毛泽东却要弱小的红军在于我不利，却有利于敌的地点、环境和时机下立即与敌“决战”，体现了其战略近视、急功近利和严重轻敌情绪，它是导致海打战役和紧随其后一系列战役流产结局的根本原因。

而此后山城堡战役胜利，则可作另类证明。山城堡战役发生在11月21日，离敌军在河东的全面大举进攻已一月有余。山城堡位于甘肃环

对柯瓦廖夫报告与访谈录的不同评价

○ 李维民

1991年,俄国学者贡恰洛夫(又译为冈察洛夫)对当年苏共中央驻中共代表柯瓦廖夫的访谈录发表后,受到我国学界关注;2004年,柯瓦廖夫1949年写给斯大林的报告原文公布后,又引起反响。今年第7期《炎黄春秋》发表的李洁的文章认为,柯瓦廖夫的报告和访谈录“完全是凭空杜撰”,“均属无稽之谈”。但是许多学者认为,柯氏的报告和访谈录有重要参考价值,不应随便否定。本文提供一些有关资料,供读者鉴别。

柯瓦廖夫是何许人?

柯瓦廖夫是1948年5月被苏联派到中国来的。他不仅是中长铁路苏方的全权代表,更重要的是负责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进行联络的特别代表。

在卫国战争时期,柯瓦廖夫是苏联军事交通部部长,中将军衔,为保障战时铁路运输作出过重要贡献,深受斯大林器重。朱可夫曾称赞他是“胜利的缔造者中的第一名”。柯瓦廖夫和苏联专家,在帮助恢复东北地区铁路,保障人民解放军迅速调动以便歼灭国民党军方面作过很多贡献。1949年1月8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信说:“我们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派来了柯瓦廖夫同志,帮助我们修复铁路和进行其他经济工作。”

县,远离交通方便的西兰大道和彭多次组织打胡敌战役的海原、同心城地区。此时,敌军虽然占领了河东大片地区,但是,由于地域广阔,敌军不得不分兵行动,以致只有胡部跟踪红军主力而进。但是,由于地形、道路、村落、民情、气候等条件限制,胡部又不得不再行分兵。敌人久战兵疲,士气低落,也造成了后勤等方面严重困难,“部队时虞断炊”,“甚至伙夫挑饮水一担,往返山

柯瓦廖夫从东北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后,就住在毛泽东住处附近。作为斯大林亲自任命的特别代表,他参与了两党之间的所有重要活动。1949年1~2月间,他陪同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与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领导人进行会谈。7~8月间,他陪同由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组成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同年12月,又陪毛泽东访苏。

关于柯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

这个报告标注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4日,这应当是最后定稿或上交报告的时间。柯瓦廖夫在1991年的访谈录中说:“访问前夕我开始给斯大林写一份关于中国情况的详细报告,到坐上火车后我才把这个报告写完。”柯瓦廖夫陪同毛泽东于12月6日启程,16日上午到达莫斯科。当晚,斯大林与毛泽东举行了第一次会谈。12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谈。毛泽东2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这次会谈“长谈五小时半,到今晨五时才毕。一面吃饭,一面谈话,极为酣畅。”这时毛泽东还没有感到不满。过了一些时日,因苏方对中方建议签订中苏新约迟迟不表态,毛泽东受到冷遇,一天,他向柯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发了火。李洁说,由于毛泽东向柯瓦廖夫发了火,“促

顶与山沟,常有数十里之遥,其给养困难之程度,可想而知也。”(《第78师战斗详报》,《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784页)然而,这正是河东红军所追求的战机。山城堡战役,红军歼灭胡部第78师一个旅。虽然彭在战役指挥上仍然存有某些粗疏,使作战成果打了折扣,但是由于战略指导趋于合理,战役依然获得了重大胜利。■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使柯瓦廖夫恶从胆边生,编造了这个在中苏两国甚至在整个世界流传了60多年的弥天大谎。”其实,毛泽东发火是在12月25日之后,柯瓦廖夫的报告早已写完,而且已经交上去了。

柯瓦廖夫的报告,共有9000多字(载《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6期),涉及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并非即兴之作。总起来看,他反映的情况虽然非常片面,但多数还不是空穴来风。问题在于他是按照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来观察、评价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初期的政策和实践,因而严重地脱离中国的实际,基本上是极“左”的观点。例如:

关于国家机关,他说:“中央政府机构。其中的22个由共产党人领导,15个由其他党派代表和无党派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包括像原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和程潜这样一些反动分子领导。……中央政府没有实现对全国的统一领导。”

关于军队,他说:“人民解放军中相当一部分官兵是原国民党军人……几乎是保留了他们被俘后的编制形式。委派到原国民党部队的人民解放军政工干部也很少。从武装力量的稳定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这一角度来看,此类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关于经济形势,他说:“批发业和零售业除满洲外几乎全部掌握在私商手中……为投机倒把制造了可乘之机。”“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国家对食盐、烟草制品和酒类制品的垄断,对反动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是满洲和华北一些老解放区实现了土地改革……其他地区不仅没有实行土地改革,甚至没有削减地主至今仍在向农民征收的高额地租。”“目前中国政府无论对国际贸易还是对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进行贸易都未实行任何限制。而且现在正在实行的政策是在讨好外国资本家企业和贸易公司。”

柯瓦廖夫报告中最敏感的内容,也是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批评。他说:

“在部分党员和共产党的领导层中流行着一种错误论调,认为老解放区实现土地改革后出现的新富农是拥护共产党和新政府的革命力量。”“依靠工人阶级发展党的工作至今都不见行动。在吸收工人加入党的队伍方面没有开展任何积

极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党组织中混进了很多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分子……在党的队伍中,包括中央委员中,有些人过去有亲美和反苏情绪,他们现在仍旧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例如,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和中央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中共中央委员、满洲政府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成员林枫,满洲政府副主席李富春,劳动部长和中央人民政府成员李立三,财政部长、中共中央委员和政府一个委员会的副主任薄一波等人。同时,领导满洲经济和文化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的高岗却遭到了毫无根据的批判,在他周围营造了一种不健康的氛围。领导并组织这场批判活动的是中央书记刘少奇。……过去以托派活动著称的劳动部长李立三于1949年6月提议成立企业主联盟,目的是有组织地维护企业主的利益。”“近来在党员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前线的全面胜利阶级斗争将逐渐消失,因为新政府正吸收国内各阶层人士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参与经济合作,这对革命事业和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严重的危险。特别是刘少奇也同意这种观点。实际上,大量事实说明,各方面的阶级斗争正在急剧尖锐化。”

“尽管美英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积极支持蒋介石,但中共中央领导人直到1949年11月以前还在对这两个国家能很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幻想。比如这种情绪的反映表现在,刘少奇和李立三反对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受英美联盟控制或与其有联系的国家参加亚洲国家工会代表会议,为的是不去刺激美国和英国。对南斯拉夫向中国提出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的建议一事保持沉默也可以用此来解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在一次有毛泽东参加的会谈中说:‘如果我们拒绝南斯拉夫的建议并公开指责其政策,那么请问,万一南斯拉夫的主子问起此事,我们该怎么办。’周恩来对向上海和天津派遣苏联专家组持否定态度也是这种情绪的反映,因为美国和英国的巨大的经济利益都集中在这两个地方。”

在毛泽东回国前,斯大林出人意料地把柯瓦廖夫这个报告交给了毛泽东。据师哲讲,斯大林还说:“这是柯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须知,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人员,

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适当的。”一般认为,斯大林做出的这种政治姿态,是想表达他对毛泽东和中共的信任,同时对毛泽东前段受到的冷遇进行安抚。但还不仅如此。斯大林那番话实际上言不由衷,柯瓦廖夫并不是一个不懂政治的技术人员,他主要是苏共中央驻中共的代表,汇报中共领导层的情况,是赋予他的政治任务,他经常直接给斯大林写报告,根本不需要另外授权。

柯瓦廖夫那些极“左”的观点,有的斯大林可能并不赞成,但基本上不违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极“左”理论,斯大林并未完全否定柯瓦廖夫的报告,苏共领导人对当时中共的政策确有怀疑,担心中国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斯大林把柯瓦廖夫的报告交给毛泽东,也是一种提醒或告诫。柯瓦廖夫在1991年的访谈中就曾举例说明,斯大林说的是一套,“但他做的完全是另一套”。

李洁说:“批判高岗的所有中共中央文件中都没有谈到所谓的里通外国问题。”由于高岗一直受斯大林和苏联器重,1954年2月批判高岗时,斯大林去世还不到一年,中苏关系还是很亲密的时期,在公开的文件中,不可能提里通外国问题,但是在党内文件中,这件事是写得很清楚的。1954年2月25日,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结束时的发言提纲中明确指出:“高岗在东北时,未向中央请示,就与个别的苏联同志乱谈党内问题。在去苏回国后的个人谈话中,他亦有不少搬弄是非的话,并借此吹嘘,抬高自己。且有不少言论和观点,显然是不利于中苏团结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也说:“关于中国党内这种情绪的情报,有许多显然是高岗捅给我们的。”

据汪东兴日记记载,1949年12月28日,毛泽东访苏时曾对他说:“最近斯大林同志交给我一份有关中国问题的信。这封信中涉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问题,我看是有人提供材料,让别人写,告洋状。”这说明当时毛的心里就明白,但他并未责备高岗,也没有影响对高岗的信任和重用。在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掌权后的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毛泽东对柯瓦廖夫的报告,并不是“不加理睬”,而是影响了他对当时党内不同意见的认识和处理。对于柯瓦廖夫所说的刘少奇等的反苏亲美倾向,即资本主义倾向,毛泽东也是警惕和反对的。在高岗与刘少奇的争论中,毛是赞同和支持高岗的。例如,高岗公开攻击刘少奇的天津讲话,还把刘的讲话记录搜集起来转给毛泽东,毛也很不赞成刘少奇的讲话。“建国前夕,刘少奇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有‘左’的错误。高岗心怀不满,在当时任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的柯瓦廖夫面前毫无事实根据地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柯瓦廖夫随即写信报告斯大林。高岗还搜集刘少奇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整理成系统材料,并称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错误。”(《毛泽东传》277页)毛泽东对高岗这些行为从未提出过批评。1949年12月,东北局组织部根据高岗的指示规定:对于坚持剥削的党员,应劝其退党;问题严重的,必须开除出党。中央组织部经刘少奇同意,回复的意见是:“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不得加以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1950年3月,高岗在东北地区党代表大会上公开否定中组部的复函。并对张秀山、张明远说:“刘少奇的谈话和对东北局的批复我给毛主席看了,主席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毛主席气得发抖,脸色都变了。”

1951年7月3日,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提出削弱、否定私有基础,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的意见,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并且把高岗关于东北农村生产互助运动的报告转发各地,还代中央起草批语:“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1952年1月10日,高岗在东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右倾思想》的报告,不指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的观点。毛泽东认为高岗这篇讲话很好,批示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

1951年,在关于工会工作方针的争论中,毛泽东赞同高岗的意见,不赞成刘少奇的观点,尖锐批评了李立三和他所领导的全总党组,解除了李立三全国总工会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职务,并对李立三进行了批判。1953年,毛泽东对薄一波

主持搞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新税制,提出严肃批评,高岗借此事件,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批薄射刘”。毛泽东对李立三、薄一波过分的批评和不恰当的处理,很难排除受柯瓦廖夫报告的某些影响。

柯瓦廖夫的报告,并未影响毛泽东对高岗的信任,1949年高岗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一直受到毛的重用。1953年春天,根据毛的提议,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被撤销,高岗以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统管政务院八大工业部(有经济内阁之称),周恩来只分管外交、侨务工作。在这期间,毛泽东还要高岗去查看沈阳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被捕的情况,可见对高岗是何等信任。

在“高饶事件”发生的初期,毛泽东是力保高岗的。1953年12月24日,毛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召开解决高、饶问题的七届四中全会后,当天就离开北京到杭州去了。1954年1月7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和书记处的信中,关于四中全会,提出“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并要求刘少奇在会上同时宣读“自我批评稿”。1月22日又写信给刘少奇,再次强调“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毛没有参加四中全会,他曾提出四中全会开两天,实际开了五天。2月10日通过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虽按毛的指示没有点名,但四天后的2月15日,根据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的高岗问题座谈会,就面对面对高岗进行了尖锐批评。原来毛泽东还想安排高岗回西北工作,听说高岗2月17日自杀未遂后,毛厌恶地对秘书叶子龙说:“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随他去!”叶子龙回忆说,毛泽东“一直认为,对一个人来讲,自杀不是什么本事,而是软骨头的行为,他看不起软骨头”。“从此彻底放弃了挽救高岗的想法”。

关于柯瓦廖夫1991年的访谈录

1991年,柯瓦廖夫接受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C·H·贡恰洛夫的访问,回忆了当年在中国的经历(见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164~200页),涉及的内容很广泛,其中最为

敏感的是以下鲜为人知的内容:

“在1949年7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刘少奇撤销了(请求苏联派空军和潜艇支持攻打)台湾问题。接着,显得十分激动的高岗讲话。他首先完全支持刘少奇的发言,然后说,他想提出一项自己的建议。

高岗说,他建议宣布满洲为苏联的第17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高岗认为,这样做可以保障满洲的安全,使之免遭美国人的进攻,并会使满洲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根据地,以便继续进攻南方,彻底消灭蒋介石。为了论证这样的看法,高岗还建议在青岛部署苏联的舰队,加强大连的苏军,扩大苏军的人数。高岗讲话结束后,与会者响起了一片掌声,但是刘少奇却表现出一脸怒色。

这时斯大林站起身来,向着坐在第一排的高岗说:“张作霖同志!”所有的与会者对这样的称呼都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张作霖是一个土匪,他依靠日本人的支持成了满洲的独裁者,后来当他企图倒向美国人一边时,日本人便消灭了他。

会议结束后,我同高岗和刘少奇坐上汽车去往他们的住地。途中刘少奇立即对高岗的叛国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指责,高岗则予以顶撞。当我们来到他们的住处后,刘少奇立即给毛泽东发去了一封密码电报,要求马上把高岗召回家去,因为他作出了叛国的行为。而高岗则走到我跟前,慢慢地挑选着俄文的字句对我说,他想以秘密的方式,并通过苏联的翻译,把中共领导层的情报告诉我。他认为,毛泽东的很多战友都有右派托洛茨基的倾向。他还说,他想就某些中国领导人对联共(布)中央不真诚的和反苏的行为发表一项重要的声明。

我立刻到二楼,用转盘电话把发生的一切报告给斯大林。斯大林承认,他对高岗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评,但他强调说,这是必要的,因为不然的话,情况就有可能被中国领导人作出错误的理解。斯大林还禁止我听取高岗的情报,其理由是我还要回到中国去工作,因此不能卷入中国领导人的纠纷中去。据我所知,当时曾委托另一位同志来听取高岗的情报,并把谈话记录交给了斯大林。斯大林还说,不要立即放高岗回去,要阻留他几天。

三天之后，斯大林在自己的孔策沃别墅举行了一个专门招待会来欢送高岗。在招待会上，斯大林积极地企图使高岗同刘少奇和解，甚至迫使他们两人为友谊而相互干杯。刘少奇干杯时带着明显的不乐意的心情，他完全是为了满足好客的主人的请求才这样做的。

第二天早晨，高岗乘飞机回国。他表现得心情沮丧，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没有一个人陪他。我清楚，昨天的和解是形式上的，于是立刻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斯大林。当天斯大林同刘少奇谈话时便说：“我对高岗同志的批评有些过分了，您也是这样，请把我的意见报告给毛泽东同志。”

刘少奇显然实现了这个请求，因为不久高岗就在新组成的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了要职。应该指出，这期间毛泽东在同我的谈话中经常强调说，他一向是支持高岗的，尤其是他曾救了高岗，使高岗没有被从前的中共中央书记博古害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笼罩在高岗头上的一切乌云全部消散了。”

柯瓦廖夫还讲到，1949年9月，一个香港的代表团，向毛泽东谈参观东北观感时，提到在东北见不到毛泽东的肖像，只看到斯大林的肖像。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了肖像问题。柯瓦廖夫说：高岗“愤怒地向我讲了会上发言的情况。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刘少奇，他对高岗进行了猛烈的、尖锐的批评，他让大家注意到高岗在莫斯科曾建议使满洲成为第17个苏维埃共和国，他把这个问题同满洲不挂毛泽东像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接着是周恩来发言，他指责高岗背叛了中国人民，力求把满洲送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我记得，高岗当时对于周恩来的这种立场感到特别痛心，因为他认为周恩来是他的好朋友。毛泽东没有发表个人意见，他只是赞成作出的决议。决议中谴责‘高岗路线’，并建议在全国摘下斯大林画像。”

高岗走后，我久久不能入睡，我的心情很坏。最后我决定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莫斯科。

第二天中国几位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在内，到我这里来就肖像问题进行解释。他们说，决定摘下斯大林的像是由于像的质量不好。最后，虽然我不愿意，但我还是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同毛泽东交

换了意见。我们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在苏联的军事机关、中苏合办的机关以及在中国的党委和共青团委员会里，仍然悬挂斯大林的像。

第二天，斯大林发来了电报，他支持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路线，对高岗进行了谴责，当时我对此甚为惊讶。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发生的情况有了更好的理解。因为我根据自己的经验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是用密集的眼光来看待人的，他不是把人们看做一个个的个人，而是把他们看做是自己的仆人，看做是一群蚂蚁。在他看来，人不过是玩弄政治把戏时的手段而已。所以他当时抛弃了对他忠心耿耿的高岗，让其听天由命。此时此刻他认为对自己更重要的是同毛泽东搞好关系。……

高岗受到最后的、致命的打击是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1950年2月，即在毛泽东从莫斯科返回北京之前不久，我得知斯大林把我的报告以及其他一些也是对中共中央提出批评性意见的密码电报都交给了毛泽东。这还不那么要紧，他还同时竟把高岗寄给他本人的几个情报夹亲手交给了毛泽东。

很久之后，米高扬也证实了斯大林把这些文件交给毛泽东这一事实。……我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看到，斯大林这种行为实际上已预先决定了高岗的命运。”

柯瓦廖夫的回忆不一定完全准确，例如，据考证7月27日应为6月27日；斯大林和一些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并不是政治局会议。不过，说他“完全是凭空杜撰”，也不能令人置信。如果说柯瓦廖夫是因为毛泽东向他发过火而恶意编造故事，那么应当是攻击毛泽东，也不会编故事中伤高岗。柯瓦廖夫和高岗的关系一直很亲密。他在1949年的报告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刘少奇、周恩来等7位中共中央委员，唯独表扬高岗“领导满洲经济和文化发展取得令人瞩目成绩”。在1991年接受访问时，柯瓦廖夫还说：“我在中国工作期间同高岗在工作上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信赖的、甚至是友爱的关系。在我的记忆中，高岗是一位超群出众的人，他具有一位重要领导人所应有的素质。”他还说了一些对高岗的遭遇表示同情的话。在几十年后，他似无必要故意编造故事诬蔑高岗。

曾被说成高岗的五虎上将而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张明远,他的女儿张晓霖根据高岗秘书赵家梁口述写的《对〈回忆高饶事件〉的质疑》一文(载于《炎黄春秋》2009年12期),对杨尚昆说高岗与苏联的关系不正常也提出质疑。我查到1959年9月2日张明远在军委扩大会议批彭德怀的第一综合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见会议简报),他讲了这样一段话:

“……还有和外国关系:东北解放不久,东北有个政治顾问叫卡瓦列夫(苏铁道部副部长),高岗把他对中国党的看法向这个人谈了,散布了很多反党言论。卡瓦列夫(注:即柯瓦廖夫)就认为少奇同志、彭真同志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高去过苏联三次,一次是和少奇同志去的,回来散布了不少反对少奇同志的言论,如说斯大林如何重视他,不重视少奇同志。说斯大林说他是东北的张作霖。”

当时张明远有压力,难免说违心的话,但还不至于胡编乱造。斯大林是在什么情况下称高岗张作霖的,张明远可能不清楚,但这可以作为柯瓦廖夫回忆的一个旁证,也说明杨尚昆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曾经为师哲整理过《在历史巨人身边》回忆录,先后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李海文,就柯瓦廖夫访谈录写了一个文字说明,现转引如下:

“1991年第六期《远东研究》登出贡恰洛夫(有的译为冈察洛夫)整理的苏联驻华专家组组长科瓦廖夫回忆录中说高岗当着斯大林的面提出要将中国的东北成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1992年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在《东欧中亚情况》发表了谈话的摘要。龚育之看到这个材料,3月6日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认为科瓦廖夫说的比较确切。(电话记录)。3月9日我到师哲家,向他请教此事,他一口否定科瓦廖夫的说法。(见采访记录)因为我看过刘少奇在苏联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中没有谈到高岗的事情,因而相信了师哲的话,写了《科瓦廖夫回忆的不确之处—师哲访谈录》一文,并请师哲审阅(见原稿)。

1992年夏天,贡恰洛夫调到北京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工作,任政务参赞。1993年9月24日

在中信国际研究所所长皮声浩的安排下,我与彭德怀传记组、研究抗美援朝学者张希同贡恰洛夫及俄驻华经济参赞杰尼索夫会面。而后于10月5日一起看望师哲。同师哲又讨论了这个问题。师哲当场回绝,说高岗没有说过这个话。出来后贡恰洛夫说:师哲、科瓦廖夫,这两位老人家不太合。

我的文章《科瓦廖夫回忆的不确之处—师哲访谈录》于1993年2月15日出版的《国史研究参考资料》第1期发表,后为《人物》(注:改了标题)、美国《历史学者》转载,作为附录收入日本出版的师哲回忆录,影响较大。可是就在我的文章发表之后,师哲在一次接见外宾时,当着我的面,却承认高岗讲过这个话。使我目瞪口呆,哭笑不得。当时我忙于其他工作,也没有想到这件事后来被很多人引用,产生这么大的后果,就没有再写文章更正。研究历史第一要实事求是,现在我郑重地把以上情况写出来,供研究参考。李洁多次引用的就是李海文澄清的这篇文章。■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郑重声明

近日,本刊接到一些读者和发行商的反映,某些地区的有关部门在文化市场执法检查时,说《炎黄春秋》杂志是“禁书”、“非法出版物”。对此,本刊郑重声明:《炎黄春秋》杂志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出版的合法期刊,期刊出版许可证号:京期出版字第2817号;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编号:ISSN 1003-1170,在国内外公开出版发行。

广大读者和发行商若发现有关部门称本刊是禁书、非法出版物并予以查抄或禁止售卖等行为,请及时向本刊反映并提供证据,本刊将依法维护自身、发行商及读者的合法权益。

炎黄春秋杂志社

2012年10月17日

档案记载的苏联饥荒 (1929 - 1934)

○ 李玉贞

一、俄罗斯档案出版情况点滴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摆脱了苏共的桎梏,官方和民间集中优秀学者到档案馆淘宝,三两年后各类档案集大量涌现,势同井喷。本文介绍其中的两个。

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原封闭最为严密、根本不对外国学者开放的位于莫斯科红场附近的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它几经更名,今天叫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笔者多次目睹这里的“世界大战”:档案馆8:30或9:00开门前,操各种语言的学者已在前厅排队,门一开就蜂拥而入。可惜中国人很少。

1919 - 1943年间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关系的档案集已经出版了相当大的部分,按照国别支部的有《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挪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朝鲜》等,与中国直接相关的是《共产国际与台湾》。另外一本是由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方系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联合编辑,用德文和俄文出版,书名:《俄共 -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已经出版5卷计8册,其第一卷有大陆和台湾两个中文译本。

本文拟介绍的《苏联的饥荒》(1929 - 1934年)是另外一套已经出版72册的大型档案资料集中的一种。这套书的总标题是《二十世纪的俄国》,其组织编辑者是国际民主基金会。因发起者系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可夫列夫(А.Н.Яковлев),故又有亚历山大·Н.雅可夫列夫基金之称。

民主基金会的创建和经费。1991年,A.H.雅可夫列夫就开始领导和主持着一个委员会,从事编辑20世纪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生态等领域档案的工作。但是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委员会没有得到官方拨款,雅可夫列夫

为此奔走呼号,争取到东西方一些高等学校和慈善机构的资助,其中突出者是设在日内瓦的橡树基金。1966年,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颁令创立了这个基金。时任总统顾问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任主席。从此基金会得到俄罗斯总统基金和叶利钦总统中心的帮助。

基金会的宗旨:是为研究20世纪的俄国和重新编写这个世纪的历史做准备。按照工作计划,第一步是挖掘和出版长期被封闭的档案,对主要事实不加剪裁特别是不加遮盖、不带偏见地编选和出版。辑录的几乎全是鲜为人知的史料,这个庞大的编辑团队有一个共识,便是希望依据这些原始档案认识俄国社会,彻底反思本国历史,否则就不能摆脱专制制度,无从建设自由民主的新国家,社会发展就呈现停滞,百姓还会遭殃。第二步是写出一部专著。众编者希望这套书能提供充分依据为历次政治运动、为斯大林对本国人民实行恐怖的牺牲者平反。希望通过这一大型文件集一起回顾历史,彻底与斯大林时代切割。

编选班子:雅科夫列夫撒下大网,吸收顶尖的历史学家和熟悉档案业务的人才参与工作。从出版物看,编者队伍确实身手不凡,十分严谨。仅举一例,有时为某个只有三五字文件做出的注释就长达两页,远超过文件本身,编者将某人或某事刨根问底,条分缕析予以交代。编者导言由专家拟定,对问题阐述能鞭辟入里,画龙点睛指出文件要害。若没有深厚的研究功底、广博的知识、对档案的熟稔和雄厚的研究基础,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也是值得中国学者学习的。

已出72册书的分类。这些书按照专题编辑成册。

在外交方面,双边外交关系的文件集中,涉及苏美关系的,占已有72册书的近10%,涵盖的

年份从1917-1990年。其次是苏德关系,计有《苏德关系》《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驻德国的机关(1945-1953)》《法西斯德国军队将领军官讲述战争-德国俘虏侦破案文件》《俄罗斯历史中的德国人(1652-1917)》。涉及苏波关系的《卡廷文件》编辑和出版的动静最大,俄罗斯不仅把这些材料整理出版,而且把原件全部交给波兰,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为斯大林主义在国际上制造的这桩令人发指的惨案向波兰人民道歉。斯大林的罪行与纳粹屠杀犹太人可有一比。

多边关系的文件中有两卷本的《近东冲突(1947-1967)》《‘布拉格之春’与1968年的国际危机》(文件和当事人回忆计2卷)等。

苏联内政方面的档案集在72种出版物中占大多数。粗看这些出版物,读者的第一感觉就是俄罗斯真正在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是对苏联时期历史的大翻案,中国读者会看到,这套书的编者决心全面揭示斯大林主义带给俄罗斯人民的灾难,把一度被视为共产主义运动“圣经”、由斯大林主持,苏共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予以否定。为过去“以革命的名义”被杀害的成千上万的庶民百姓的平反挖掘可靠的文献证据。以修正主义者名义受到批判的赫鲁晓夫,其政治上的浮沉都有专门的档案集出版。而长期被苏联历史称作“反苏”、反革命的“白”色反动将领高尔察克、科尔尼洛夫不仅得到平反昭雪,还在1991年后按照东正教仪式被安葬在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中国读者熟悉甚至教育了一代人的楷模保尔·柯察金这个英雄人物的事迹,也因“白卫军将领”彼得留拉的平反,而将复杂的社会背景显影。中国有位作家说“人家俄罗斯都不‘保尔’了,我们还‘柯察金’呢!”这是因为过去我们不了解钢铁般的英雄保尔·柯察金是在什么社会历史条件下“炼成”的,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革命者。

因民主基金档案丛书的编者旨在还原斯大林的罪恶以摆脱桎梏,求社会健康发展,所以关于苏联国内政策的档案集占绝大多数,如镇压“反苏”分子,实行红色恐怖,从意识形态、文化政策上树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等。

在苏联经济建设模式中,苏联的农业集体化

曾被当作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楷模,被广泛仿效和推广,如中国。但是这一政策究竟是否真的促进了苏联社会的发展,却很少被人提及。据俄罗斯史料记载,它的直接后果是引出了后来1929-1934年的大饥荒。就这个题目的出版物十分引人注目,已经有几个专集出版,如1998-2000年间由俄罗斯社会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全俄肃清反革命特别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会眼中的苏联农村(1918-1938)》《苏联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反富农斗争(1927-1939)》《苏联的大饥荒(1930-1934)》等。

二、《苏联的饥荒》(1929-1934)

《苏联的饥荒》(1929-1934)一书至2011年已经出版第1卷,分上下两册,上册1929-1931年,下册1932-1933年。计四个分册,721个文件,是编者从几千份文件中选择的。第2卷收录的是,为克服大饥荒的恶果而采取的措施。现介绍第1卷。

本卷文件取自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档案馆,以及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门中央档案馆。它是一个跨国项目,参与编辑的有当年受灾最严重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三国的档案工作者。

大饥荒的背景。斯大林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意在把苏联建设成具有苏式特色的最先进的共产主义国家,决定用最短的时间赶超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如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向世界展示苏联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但是,苏联农业的生产能力远远落后于上述计划的需求。为提高农业生产率从1924年起苏联就开始组织农业合作社,建立集体农庄,可是这种大生产成分在“全部农业产值中总共只占百分之二强,在农业商品产值中只占百分之七强。”(《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62页)。斯大林认为苏联工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他们是剥削分子,要“采取一切办法从经济上围攻并排除这些剥削分子,”不让这些“百万富翁”盘剥工人。“应当根据苏维埃法制采取经济上的办法去战胜富农。”(《斯大林

全集》第7卷第266页)。对待富农他有句名言：“脑袋都掉了，还顾及什么头发。”1927年12月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方针。从1928年起开始实行第一个一年计划。当时苏联的情况是：

在世界制造业中，1928年苏联所占比例

苏联	5.30%
美国	39.30%
德国	11.60%
英国	9.90%
法国	6.00%

1930年农业集体化后苏联钢产量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

国别	产量(万吨)
苏联	590
美国	4140
德国	1150
英国	740
法国	940

为赶超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工业化任务的艰巨可见一斑。

但是斯大林对国际形势另有估计，他认为1929年爆发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只有苏联经济表现出少见的活力。但是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使之无法取得国外投资，斯大林决定自力更生解决工业化所需资金的关键问题。

《苏联的饥荒》(1929-1934)一书编者介绍，斯大林认为，要解决苏联农业分散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为农业现代化掣肘的状况，当务之急是“通过改变农业生产组织结构来急剧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书第5页)，于是推出了迅速发展发展农业的新政，这就是继续加强“在苏联的产粮区强力建立集体农庄，建设国营农场，同时消灭小农经济，因小农的低效率，农产品的低商品率，在工业化形势下不能满足工业建设和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书第5页)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实行的全盘农业集体化。而消灭农村的剥削阶级——富农是其主要目的之一，具体做法是让富农多交粮，剥夺他们的财产。但是拥有多少财产的人就是“富农”，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于是在执行中，稍微富裕一些的农民便是富农。他们的财产被剥夺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

苏联广袤的西伯利亚，受地理环境的限制，

农作物生长期很短，斯大林把希望寄托在主要产粮区——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河流域。他要靠农民这个“内部资源”积累工业所需的资金

集体化遇到抵制，斯大林开始整肃。为换取工业设备，1929年8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制定了强硬措施，令各级苏维埃和地方党组织坚决配合政府征粮，严厉禁止私自买卖囤积粮食。安全部门、司法部门要全面介入，密切配合，监督各处执行情况，凡执行不力者，通通予以撤职(书第11号文件)。对于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的个体户，要提高征粮标准，强迫他们加入。这样一来，部分地区缺粮的情况，是年就开始出现了。

1930-1932年苏联决定向西欧出口小麦等谷物，1930年初定额是1200万吨，但是已经建立起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特别是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沿岸等地区的社会组织认为这已经超过他们的能力，开始提出抗议，但是无效。一些基层农村苏维埃干部有人做起粮食投机生意，引起农民强烈不满。农村矛盾开始激化。

由于“反苏分子”的破坏，一系列针对农民的严厉措施也开始实行。斯大林有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于是整肃首先是针对各级干部。1930年12月2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研究粮食和肉类生产。会上认为肉类果蔬公司“充斥了异己分子，敌对分子和破坏分子(已经枪毙了48名)”。至于直接领导这些部门的共产党员，则根本没有直接研究考察果蔬生产，仅仅限于下发官僚主义的文件和一般性指示。故此要把粮食征收部门的经验运用到果蔬生产和征集方面，“要对机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第174号文件)。

干部们是在努力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1930年农民粮食被征收后，已经有百万人缺少口粮，拿不到凭票证分配的定量，饥荒出现。使情况日益加剧的是，干部们没有或不敢说真话，斯大林手中没有确切的粮食产量统计材料，国营农场官僚主义严重，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为了迎合高指标，便高报产量，因为按科学规律办事、从实际出发，那样的产量是根本达不到的。然而，不照上级的意见提供浮夸产量就会被说成“右倾机会主义”“保守”等，从而招致严重的政治后

果。于是浮夸数量变身为“政治任务”，一股脑儿压到农民头上。1932年主要产粮区遭遇灾害，旱涝交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粮食产量，而城市人口增加了400万，又加大了口粮需求。书中称斯大林在1930—1933年出口西欧1200万吨谷物赚回的外汇4.42亿多(442109000)卢布，是用“白骨”换来的。据统计，1932年一年出口量就能养活700万人(书第47页)。

斯大林认为干扰其政策执行的不仅有国内反动势力，还有国外敌对势力，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把工作困难归咎于国外敌对势力的搅局的倾向，从而紧绷阶级斗争的弦，加强了对国外敌对势力的防御和斗争。如摩尔多瓦农民秘密挖掘了许多地窖藏匿粮食，以图自救，有关领导便认为那是当地的敌对势力受邻国罗马尼亚的鼓动进行的破坏活动。对国内，凡是完成上交计划不力的地区，则惟当地领导是问，因他们奉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那些觉悟不高的“贫下中农”没有进行足够引导和教育，致使他们受“富农”蛊惑，对党和苏维埃领导持激烈的对抗情绪，甚至从事破坏活动(书第158、207页)。一系列相当严酷的针对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措施因而出现。

斯大林及其近侍又“找到了”计划不能完成的原因：“富农抵制”，便组织干部对富农斗争，因后者破坏并鼓动阶级界限不清，觉悟不高的贫农、中农不向国家交粮，致使“贫农与中农都反苏。他们脱离我们的控制。挨饿，不向国家交粮”。(书第260页)

《真理报》公开发文，要求把混入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富农和准富农分子清除出党，因他们“破坏党的威信。”要求出现问题的地方立即“组织若干次审判”，以杀一儆百，威慑不参加集体农庄的个体户和部分集体农庄庄员。该报指示，若有必要则以“工作组”形式从上级派遣可靠的人前往领导不力的地区。(书第160—161页)

全民的悲剧，大饥荒。从各地发向中央的关于饥荒情况的文件在书中占绝大多数，大饥荒从粮食主要产区开始，因为国家向那里征粮的数额高于其他地区。

由于斯大林的农业政策，饥荒从1929年就出现了，农村形势动荡，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过进口粮食解除危机

以维稳。但是国家仅有的钱首先要发展重工业。此说遂作罢(第3—9号文件)。斯大林认为不能降低工业发展速度(书第79页)，富农手里有了粮食，他们就筹了筹码，敢向我们施压，所以“征收富农手中的余粮，不仅有利于我们对城市的供应、对红军的供应，而且是打破富农从经济和政治上施加压力的手段”。(书第80页)

然而问题恰恰就出现在什么是富农的问题上。有多少余粮就是富农？界限的模糊性决定了政策的随意性。在落后的农村，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农民只能靠天吃饭，维持温饱而已。政府派遣的征粮队，强行拿走农民的粮食，许多地方不仅口粮无法保证，连种子也被征收，来年播种无望，这才是普遍情况，乃至到1932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年初就专门开会研究保证种粮的问题。

一些征粮队的全权代表以支持国家建设为名，要求当地苏维埃让农民把全部收成一粒不剩地交给国家，然后获得自己的口粮(第123号文件)。然而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口粮。疾病多发，成为普遍现象。许多人的遭遇很是离奇。如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报告里有这样一些文件，称1930年7月29日，25名妇女抱着婴儿到村苏维埃要粮，遭到拒绝。当时的场景是：

“我们只给饿得浮肿的人发粮。”村苏维埃主席宣称。

“你们想干什么？要我们都饿成浮肿才给粮食吗？”众怒吼：“我们帮助国家，交粮食，可现在有些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到市场去卖，一个燕麦小面包就是80—90卢布。”(书第259页)

再如同日30余名妇女到村苏维埃要粮食遭拒，群情激愤：“你们这些王八蛋，把我们的粮食抢走，我们没有饭吃。等着，有收拾你们的时候！”报告称，叫嚷最凶的是富农的女儿。(书第259页)

1930—1931年春季，农民无隔夜之粮，饥饿面前人人平等。他们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对抗这种掠夺式的征集，地方苏维埃的干部也和农民一起抢劫粮仓。严寒的冬季里，农民屠宰牲畜，存栏数急剧下降(书第287—288页)。运粮车遭抢的情况时有发生，当局通过安全部门监督，派遣军队武装押运。

许多人开始退出集体农庄。农民中更加普遍的情绪是什么主义都无所谓，不管你什么农庄，什么主义，不给吃饱饭是不行的，今天饿死



饥荒中的苏联人

了,明天看不到共产主义了。抵触情绪相当强烈,被剥夺基本生存条件的农民不再相信政府。一名《真理报》记者写给编辑部的密信描述目睹的惨状:一些农民用种种办法藏匿粮食,他们用火柴盒、罐头瓶、小口袋、玻璃瓶装起来,挂在桌子底面。万一被发现,后果可想而知。在摩尔多瓦,征粮队到后,为搜粮,几乎把一些村庄里各家的炕炉均予掀翻,脱掉女人的裙子,扒掉男人的靴子,把窗户连框一起拆除,房子无法居住。农民被打伤的情况司空见惯。有时候一辆大车上装满被打伤的农民。需要住院时,医生不敢写某人什么原因致伤残,只写“×××处受伤”。

因无法交足粮食,农村普遍存在私设公堂的现象,某一处村苏维埃的办公室里就关押过120名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户,一般长达七昼夜。这是正式拘留,还有种种“不正式的拘留”。(书第158-159页)但是农民并没有被压服。随着灾情的日益严重,一些地方特别是1932年春季,农民拦截运载种子的车辆成为普遍现象,再后来,牲畜饿毙(书第485、680页),大量农民因饥饿患病丧失劳动能力,无法下地耕种,最后情况恶化到连政府贷予的粮食和种子都无法运到农民手中(第485号文件)。

万户萧疏鬼唱歌!在西西伯利亚,为了生存,农民剥树皮,挖野菜,许多人中毒或患病(第456号文件)。1932年情况更加严重,人们盼望着1932年庄稼快快生长,哪怕不等成熟也能充饥,农民要去“抢收”地里的粮食,从而酝酿着来

年更大的危机。(第721号文件)

现用联共(布)中央收到的1932年3月26日报告中的一个文件,看西西伯利亚波克罗夫区的一个农户家的情况。这家的男主人是一个优秀的集体农庄庄员。

“鲍罗庭·菲力浦挣了650天的工分,家有妻子和五个孩子,最小的一岁半,最大的9岁。妻子卧病在床,两个孩子坐在炕上,面色蜡白,脸浮肿。一岁半的孩子面如土色坐在窗台上,全身浮肿,9岁的孩子衣衫褴褛,躺在地上。鲍罗庭·菲力浦本人坐在长凳上,一刻不停地抽着一种

像烟不是烟的东西,气味十分难闻。哭的像个孩子。”他的家里臭气难闻,桌子放着一些无法下咽的东西。“他骂孩子们‘怎么不死’,懒得看你们。”报告人称“说实话,他有些精神失常,饥饿难耐,再这样下去,他很可能把自己的孩子吃掉”。(第506号文件,下册第105页)

这里的人用种种植物磨碎做成饼,有何营养可谈,最可怕的是中毒现象时有发生。家家户户的窗户框架全被拆除。街上没有牲畜,处处是粪便,偶尔见一个瘦削的狗。(下册第105页)

大饥荒中的苏联人

1932年7月11-16日《消息报》收到的政情报告描述的是一幅十分严重而悲惨的农村画面。

政策使“千百万人在呻吟,”“就因为不加入集体农庄,那一点点可怜的家产全被没收”,把一些“指示和计划强加于我们来提高收成,可这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要去的是贫穷的社会主义。”

“报纸上说得天花乱坠,百姓生活幸福,人人满意,自愿完成所有任务和交税。”处处莺歌燕舞,可是“农民在挨饿,大批大批的人饿死。斯大林和他那些有意无意的帮手(莫洛托夫、加里宁以及其他‘领袖’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他们是工农不共戴天的敌人……党瘫痪了,下有书记们的专政,上有斯大林的独裁”。农民愤怒地呼喊:“到村里来吧,看看农民怎样欢迎刽子手斯大林”

(第474号文件,下册第65、67页)“人们满腔怒火,咒骂斯大林同志本人,是他造成了这场灾难。”(书第218号文件)

书中有30个(第475-484号)文件介绍了各地的形势和反抗。“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然而,令斯大林等担心的,并不是饿死多少人。他更加重视的是握紧钢枪以维稳。因为许多官兵的家在农村,他们的眷属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优惠,但是整个国家经济情况日益恶化时,遍地饿殍中有了他们的亲人。形势严峻,军心动荡,军队不仅粮食奇缺,肉食也一样。1932年主要产粮区遭遇旱灾,更加剧了社会危机。乌克兰军区把保证军队及其眷属的供应作为主要问题提了出来(第670-674号文件)。1932年7月7日苏联供应人民委员部主席米高扬致密信给乌克兰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科西奥尔,称已经决定从6月份起用鱼类代替肉类供应军队(第674号文件)。到这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感到问题的严重,开始“纠偏”(第675-681号文件)。

然而仅仅1932-1933年间(笔者目前没有见到第2卷,1929-1934年间饥民死亡总数还待查找)就有500万-700万人饥饿致死。饿死一个人给国家做出的是10个卢布的贡献(上册第47页)。

难怪学者们在描述编选材料时的心情说,对于神经衰弱者,那些档案令人发指。他们认为斯大林“反农民的农业政策”制造的大饥荒,是他及其“帮手”制造了俄罗斯“全民的悲剧”,斯大林犯下的是“反人类罪”。■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黄钟)

(上接第94页)不容。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土改中,出现所谓“大义灭亲”人性丧尽的举动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浙江龙泉河村农场(温州专区第一劳教所),初期以收容机关、事业企业单位的右派分子为主。1960年6月11日午休时间监舍突然起火,警察子弹上膛不许劳教人员破门逃命,结果烧死200多人。其中死者黄德焕是乐清县公安局一科科长,乐清城北乡里章村人。其父黄庆姆是工商业者兼地主,1951年土改,黄庆姆被土改工作队认定“罪大恶极”必须镇压!身为工作队队员黄德焕立场坚定,面对事态发展决不回避,斗争大会一结束,黄德焕立马拉起父亲黄庆姆带到场外,亲自开枪,父亲顿时脑袋开花。

黄德焕真刀真枪的“大义灭亲”,若不是出于政治投机,假使没有走火入魔的“阶级觉悟”是万万做不到丧心病狂杀父如宰鸡。农场大火中,黄德焕全身烧伤,连阴囊都烧掉了,日夜痛苦号咷,直到死亡,大家都说这是现世报。

三、兴县开明绅士牛友兰备受折磨和侮辱,愤然绝食身亡。新中国成立后,“镇反”“土改”运动,民主人士和开明绅士被迫害致死或被“误杀”,几乎各地皆有,有的死得极冤。

永嘉县著名开明绅士陈达人,永嘉郭溪宋畚人,日本东京帝大毕业。1937年抗战开始积极支持共产党革命,浙南根据地要钱捐钱,要粮筹

粮,要布匹要子弹一一照办。“客人”常年往来,都好菜好饭款待。还鼓励子女参加新四军。1949年5月,温州驻军叶芳起义,陈达人起了极大作用,为温州和平解放创造种种条件。陈达人一贯支持共产党的事迹,原浙南地区党的领导人了如指掌。他长期抚养中共烈士的孤儿。但在1950年镇反运动中,竟没有人征求过原浙南特委或地委了解情况的干部,而将他当作“反革命”枪决了。行刑前,当地数十名群众跪下哀求枪下留人,当局竟视而不见。陈达人冤死距离温州和平解放不到一年时间。

中国长期内忧外患交困,内忧是永远“说不清”的话题。

浙江温州的离休干部 许岳林

更正

本刊2012年第11期第31页左栏倒数第2行中的“何兰楷”,应为“何兰阶”;第37页左栏倒数“江西安国”应为“江西兴国”;第44页右栏第4、5行中的“于再、潘琐”,应为“于冉、潘琰”;第47页右栏第3行中的“本书作”,应为“本书作者”、第8行中“十八良好气氛”,应为“十八大良好气氛”;第57页左栏9行中的“江东兴”,应为“汪东兴”。

本刊2012年第12期第39页左栏底行图片说明中“赵诚”应为“赵域”。

读者来信摘登

《毛泽东怎样指挥三反运动》一文引文多处有误。

贵刊2012年第11期《毛泽东怎样指挥三反运动》一文,多处引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版。下同)第三册中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和批示。可惜多处误引、错引或引用不全:

第28页引用1952年1月14日《对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的批语》(见《文稿》第三册第52页),其中“一个小市,”后漏了“一个县,。”

第28页引用1952年1月15日《转发贵州军区三反运动三日简报第一号的批语》(见《文稿》第三册第62页),其中“只要是大批地管物的”,应为“只要是大批地管钱管物的”。

第28页引用1952年1月30日《对华北局关于山西省打虎数目的指示的批语》(见《文稿》第三册第113页),其中“实际上可能大大超过此数”后漏了“社会上即工商界中的老虎还不算在内。”

第29页引用1952年2月9日《对高岗关于东北打虎计划报告的复电》(见《文稿》第三册第177—178页),其中“第十军的几个师”,应为“个别单位(例如华北第十军的几个师)”;“冤枉了好人”后漏了“(已纠正)”。

第29页引用1952年2月5日《对山东分局打虎报告的批语》(见《文稿》第三册第151—152页),其中“十分之一”、“召开一次打虎会议”中之“一”,应为“一”,当为印刷之误;“严重者撤销职务”中之“撤销”原文为“撤消”。

第29页引用1952年2月8日《对军事学院两份三反报告的批语》(见《文稿》第三册第170页),其中“请注意搜捕”,应为“请他注意搜捕”。

第30页引用1952年2月11日《转发华东打虎预算的批语》(见《文稿》第三册第192页),其中“中小虎二万只”后漏了“不包括区乡,不包括军队,不包括工商界,只是县以上党政群及财经企业的。”

第31页引用1952年2月17日《转发中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见《文稿》第三册第221—222

页),却错引为同日《关于同意西南区打虎新计划的复电》(见《文稿》第三册第224页),复电发给邓小平、贺龙。

云南读者 张仙权

“说不清楚”的内忧话题

拜读贵刊2012年第11期沙尚之女士的《从反右运动看中国特色的政治斗争》与智效民先生的《土改中的蔡家崖“斗牛大会”》二文,感触甚多,我拟补充若干相关的史料。

一、沙文提到浙江省高院副院长邬家箴,因提出审判独立及对被告应先做无罪推定的意见,被批为“为反革命推脱罪责”,而打成右派,开除出党。

从对待温州发生的一起重大案件看来,邬家箴无疑是一位法治观念十分强烈的好干部。1952年全国雷厉风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期间,温州市区五马街美琪绸缎庄发生大火,烧毁了商场、库房及一切生财。老板王国梁跳楼逃生,下肢骨折。温州市市长黄先河为了“轰开五反”,抓个“典型”,将王国梁作为破坏“五反”运动的典型,亲自起草《奸商王国梁五毒俱全罪责难逃》小册子,并指示大量印发。于是《浙南大众报》连日声讨,《浙江日报》转载,轰动全省,乃至全国。一致谴责王国梁蓄意纵火,烧毁账册,妄图蒙混过关……声称对王国梁现行破坏活动严惩不贷。定刑前,时任温州专署公安处处长邬家箴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提出异议,认为没有直接证据,光凭推测,不能定罪。人命关天,应当重新侦查,慎重审理。温州市、市两级党政领导却以少数服从多数,表决对王国梁判处极刑。当场邬家箴表示保留个人意见,并要求将他的不同意见存入档案。最后,温州市公安局执行命令,在温州第一医院外科病房里将两腿打着石膏绷带的王国梁拉去“祭旗”了。当时我正在该医院临床见实,亲眼看到王国梁被架走。

二、智文记述山西兴县开明绅士牛友兰在1947年土改中,被铁丝穿鼻由身任晋西北行署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牵着游斗。事后牛荫冠还得到高层领导人李井泉、李佩芝及刘少奇等多人直接或间接的肯定和勉励。这种人性遭受严重扭曲的现象,为当今文明社会所(下转第93页)

人生留书 精神长存

——三千元五十本起编印文集自传、家史家谱



出版著作
传承文化

服务热线: 010-6892 0114

6252 5116

编辑出版: 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邮编: 100080

展示接待: 北京海淀图书城25号“家史·家谱·传记书店”

网 址: 《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w.net)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代理出版:

- 个人出书: 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传记、学术著作等。
- 老人出书: 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 家庭出书: 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 学生出书: 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 学校出书: 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 博客出书: 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 旧书翻印: 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 电子音像: 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 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 A类: 国内出版社出版, 国家标准书号, 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 B类: 无书号出版, 用于交流与赠送, 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 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 大32开本: 封面用250克铜版纸, 赠送勒口, 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版纸。200页印刷100本三千元, 300页印刷100本四千元; 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16开本: 封面用250克铜版纸, 赠送勒口, 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版纸。200页印刷100本5千元, 300页印刷100本6千元; 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注: 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 1000册起印; 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 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 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 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 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 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 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 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 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 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服务热线: 010-58608407 82057551 58608409
 传 真: 010-58608409 投稿邮箱: 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 (老人出版网) www.lrchuban.com (学校出版网) www.xxchuban.com
 (人人出版网) www.rrchuban.com (出版发行网) www.51isbn.com
 公司名称: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 102218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A类出版套餐优惠
(新华书店发行销售)

32开1000册23800元起
16开1000册27800元起

A类出版作品展示



B类出版作品展示



独立 权威 真实 厚重

欢迎订阅 炎黄春秋 杂志

邮发代号：82-507



www.yhcqw.com

《炎黄春秋》杂志合订本

2010年简装	95元	免邮费
2011年简装	110元	免邮费
2011年简装上下册	120元	免邮费

		邮费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炎黄春秋》经典文章	36元	6元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炎黄春秋》经典文章	36元	6元
《亲历记》走向1949	《炎黄春秋》精华本	29元	6元
《亲历记》1978纪事	《炎黄春秋》精华本	29元	6元

购书热线：010-68532048 68539058

更多图书请见本刊内页图书目录

邮局汇款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银行汇款 开户名：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传真：010-68522852

收款地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帐号：01090324900120109064325

电子信箱：yhcqfxb01@126.com

邮政编码：100045

开户行：北京银行复兴支行

中原突围：四位女性的人生

我反对神化和特权的代价

1950，晏阳初在去留之间

张玺一生的几件大事

江青八次到天津

元宝山牧场的“挖肃”灾难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8.00 元